

21

SHI JI ZHONG DA HUA TI

世紀重大話題



高齡化社會

四十歲開始探討老年

(日) 上野千鶴子 著
公克 曉華編譯

遼寧大學



21

世纪重大话题

062494

高龄化社会
四十岁开始探讨老年

(日) 上野千鹤子著

公克

晓华编译

(辽) 第 9 号

高龄化社会

——40岁开始探讨老年

[日] 上野千鹤子 著

公克 晓华 编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字数: 130千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责任编辑: 刘雪枫 封面设计: 吴光前

责任校对: 华文

ISBN 7-5610-1460-0

Z.032 定价: 3.50元

对未来二十一世纪的思考

代序

“公元2001年1月1日，即21世纪第一年的元旦，恰逢星期一，这是一个推行新历法的千载难逢（真正的千载）的好机会。从现在到那一天还有十年，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通过研究、讨论、试行，做好种种准备。”

“只有一个地球，共有一个世界”的人类就要在公元2001年1月1日星期一进入新的世纪了。如果说一个仅仅以百年为计的单元，竟然要用十年时间提前议论它的曲直长短，是不是也太超前、太过份了？那么不妨稍稍翻一翻关于本世纪的一些记录——

1901年 俄国巴甫洛夫开始研究条件反射。

1903年 美国莱特兄弟发明

第一架飞机。

- 1905年 德国爱因斯坦发表特殊相对论。
- 1907年 发现人的血液有四种类型。
- 1909年 美国人发明塑料（电木塑料）。
- 1920年 世界上开始第一次无线广播（美国）
- 1928年 第一部有声电影在美国诞生。
- 1940年 世界上开始第一次放送电视（美国）。
- 1946年 第一台真空管计算机在美国诞生。
- 1948年 发明晶体管。
- 1957年 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苏联）。
- 1966年 第一只宇宙飞船到达金星（苏联）。
- 1969年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美国）
- 1975年 日本生产出第一台家庭用录像机。
- 1982年 日本生产出第一台液晶电视机。
- 1990年 日本研制出第一台使用超导元件的计算机，其运算速度是晶体管的10倍。

.....

从这张可以一直开列下去的表中，你一定已经注意到，在20世纪，人类有着太多的“第一次”，而这些“第一次”，似乎越到本世纪后叶，越不容易列下去了。然而，即便你环顾科技并不领先于世界的我们国家的四周，也同样感到深处于“科学爆炸”，“技术爆炸”的氛围中。之所以感到不太容易再往下列这张表了，不是因为新的内容在减少，恰恰相反，是因为多得比比皆是——小至国内，国际

通用的磁性信用卡，大至宇航员可以在宇宙中停留数月的空间航天站；普通到运用模拟人脑的模糊思维的自动电饭锅、自动蛋糕烘烤机，特殊到帮助人战胜心脏病的可以植入皮下的心脏跳动调节器，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新产品、新发明推出。每天沉浸在新发明的海洋中，难免熟视无睹。

尽管在定量上是不可比的，但是对科学家们做出的如下结论大概不会有人感到不可思议——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之多，进步之大，超过以前人类有史以来一切发明与进步的总和。难怪各方有识之人异口同声地称本世纪为“科学技术的世纪”。

站在本世纪之末，面对这日新月异的世界，是欣喜，还是该忧？是该为现代科学技术拍手，还是该为之反思？

站在本世纪之末，如数家珍地开出上面一张人类功绩表之后，不难发现构成这些“爆炸性”进步的主要支柱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即现代科技理论却并非诞生于本世纪。要查阅构成本世纪发明与进步的理论基础都是在何时建立起来的，必须追溯到上一个世纪，而且主要是上世纪后半叶。

站在本世纪之末，顾后瞻前，人类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纪？将把什么带入这个新世纪？如果可以贸然说20世纪的进步差不多标志了人类有史以来的90%的进步（是否都是真正的进步，另当别

论)，那么2001年就真有可能象本文最初的引文所隐含的意义那样——它不仅是一个百年世纪的开始，还是一个结束人类2000年有公历记载的现秩序时代，跨入一个以“千载”为单位的新纪元的起点。所以我们太有必要思索这个新的纪元了，十年不是太多，反而似乎太少了。

“共有一个地球，共有一个世界”的我们，将对这个我们共有的新纪元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其中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有可能的，也有必然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但有一个共同主题已被太多太多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们所认识，这就是——地球的自然资源是有极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有极限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人们开始反身自问：

如此消耗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所换来的科技进步，如果长此下去，人类还会延续多久（参看《地球的去向》）？

在重视高效益，重视大生产的20世纪，人类榨取自然，换得科技发达和生活现代化的同时，也脱离了自然，远离了自然。不论是因为受到物极必反自然规律的惩罚后的醒悟，还是因为人类尚未丧失殆尽的本能的欲求，本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自然人，研究人本身，返朴归真，返回自然的呼声，已由最初的涓水细流，汇成了一股宏大潮流。这是一股逆20世纪的科学技术潮流而动的新潮

流，它以重新看待和反思近代与现代科学技术为潮流，所以相对于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世纪”，有人称下一个世纪为“科学技术的反思世纪”。

在这个在反思中争取真正意义的进步的“新世纪”，人们将思索——

人类以全部历史创造出来的科学与艺术这两个对立物为什么能与人类长期共存（参看《灵魂的本能——死亡》）？

与自然科学几乎同时诞生的哲学，在把人类当作客体来议论上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好象只活在哲学家的书架上，已经不再被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需要了。这种状态将继续下去吗？在新的世纪里哲学也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来吗？如果回来，那将是什么样的新哲学呢（参看《活着——思考——知识》）？

人类第一部解释生物界的存在规律及其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后，犹如一锤定音，半个多世纪无反驳，无辩论，异乎寻常。生物界顺应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人，果真如达尔文所创立的物种起源论那样吗？如果有新的学说，它能增加人的聪明吗（参看《人为什么成为人》）？

20世纪人类的科技发明和进步，从总体上说，不外乎以消耗能源为代价来代替人的机械性动作和机械思维。如果说下个世纪还要让科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不是该在突破机械思维，以智能机械（运

用模糊思维)代替人的自然思维的道路上开拓下去呢(参看《模糊工程学》)?

在科技进步、文明发展的20世纪渡过自己峥嵘岁月的中青年人,将随21世纪一起步入老年。在人类前所未有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可能占五分之一以上的未来世纪(据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18年的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达22.2%),银色可能成为世纪的标志。这样的银色世纪将给现有状态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家庭生活带来些什么变化呢(参看《高龄化社会》)?

.....

人类进入21世纪必然碰到许多新问题,正如入冬前准备棉衣,看到烧红的晚霞就忙去筹划第二天春游的路线一样,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已经不远的未来世界的一些重大话题。这些话题必然直接关系到如何构筑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这里向您介绍的几本书也可能会为您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启示。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难免在编译制作中有疏误。倘若它们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原谅,我们将由衷地感激。

《二十一世纪重大话题译丛》编委会

1991年春

目
录

1. 高峰期人口老龄化的明天——人多势众的银发阶层

- 老年经济状况——资产持有者丰裕，领养老金者贫困… 1
- “生孩子热”时代产生的“新银发阶层” …… 5
- “银发市场”的近期前景 …… 9
- 宗教在老人中起些什么作用 …… 19
- 男人不能护理老人吗 …… 22
- 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差别 …… 27
- 人多势众的银发阶层 …… 33

2. “潮湿落叶族”倾向与对策——老龄化社会的人际维系

- “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 …… 35
- 男人退休后向何处去 …… 40
- 日本男人的“浮余负债” …… 44

- “所有的儿媳都不好，事情反而好办了”……………47
- 自己的老年生活，自己决定……………53
- 老龄化社会的人际维系……………59

3. “老年文学”的可能性

——女人从“白秋”到“玄冬”

- 《情事》发表之后……………61
- 作家·评论家·读者……………66
- 描写“老年”的新鲜手法……………69
- 女人也会找岁数小的情人吗？……………72
- 对成熟的老年文学的期待……………74
- 女人从“白秋”到“玄冬”……………78

4. 日本的老龄社会与美国的老龄社会

——老年文化蓝本

- 老人希望一个人生活……………80
- 让男子承担老人看护工作……………83
- 帮助老人的各种方式……………88
- 老人的自我意识……………92
- 衰老中的“依存”与“独立”……………95
- 老年文化蓝本……………98

5. 独身者的老年

——独身者的终生事业

○无子女的老人·····	100
○日本第一代妇女独身者——战争未亡人·····	103
○弱点很大的独身女人·····	106
○超越血缘关系的互助组织·····	110
○住房与经济保障·····	112
○独身者与“墓碑”·····	117
○独身者的终生事业·····	120

6. 老年婚姻的积极意义

——老年婚姻革命

○得到公众理解的老年婚姻介绍所·····	122
○老年之恋的“纯真”·····	127
○中老年男人比女人更想结婚·····	133
○老年婚姻的表面理由与实际背景·····	140
○老年婚姻革命的倡导者和多田峰·····	143

7. 北欧老人福利社会

——福利事业的现场报道

○丹麦的老人福利事业·····	145
○老人护理与家庭纽带·····	152
○看护人员的社会地位·····	157
○家庭内部福利的局限性·····	163
○福利事业的现场报道·····	168

8. 老人之家的生活

——跑在老年生活前面的人

- “京都老人之家”的生活……………171
- 终生研究《源氏物语》……………175
- 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177
- 老人之家的适合规模……………181
- 公寓生活与公寓共同管理……………184
- 跑在老年生活前面的清水夫妇……………189

写在后面 ……………192

高峰期人口老龄化的明天——人多势众的银发阶层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1948年生于日本富山县。京都大学社会学博士，京都精华大学副教授。

关泽英彦。1946年生。庆应大学法学系毕业，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老年经济状况——资产持有者丰裕 养老金者贫困

上野：关泽先生是市场问题专家，专门从事市场调查。按我的理解，要想做好这种工作，抽样调查的对象必须是人口集中的地区。而且，要想做近期预测的话，必须作为经常性工作，不间断地进行。

今天和您谈谈老人问题。

一谈起老人这个话题，人们的言谈中难免夹入一股暗淡的色彩，不是议论老人的无情打采，就是谈论老人的经济拮据。但是，看看我们身边大部分老人的实际情况，他们不仅没有衰颓潦倒，反而顽强地活着。今天我想和关泽先生探讨一下这样的可能——能不能把目前的市场对象的重点之一放在这些“新银发阶层”上？这将是一股很有潜力的购买力。

另一方面，现在的老人在他们进入老年之前，多未对老龄化社会没有做好必要的各种准备。而根据最近的预测，今后的老人们将以与现在的老人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他们将从上一代老人的举止动向中得到启发和借鉴，学到经验和教训。

关泽：说起这个“新银发阶层”，我们也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例如对“你感到幸福吗？”这个问题，从被调查者的回答来看，回答“幸福”的比率基本上没有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相反，年龄越大，回答“幸福”的人的比率反而越高。我们还在欧洲一些国家做过同样的抽样调查，结果却是上年纪人对幸福的满足感下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富裕程度较高，而且社会也比较安定的缘故。但是这种社会条件又从另一方面造成人们理想和抱负的缺乏。所以，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没有理想和抱负也就没有那么多忧虑。

前面谈的调查实例是90岁以上70岁以下老人。

他们的感情生活，整个来说没什么大问题。倒是50来岁的人对老年生活怀有这样那样的忧虑和不安；待他们一过了60岁，反而又安定下来。对50来岁的人，特别是男性的这种特征，我们称为“退休前忧虑。”

上野：从生活方面来看，对于50来岁的人来说，为退休以后生活有保证，他们必须做最后努力，以工作到退休年龄。

关泽：的确如此。最近，对退休后老人的经济保证，很多金融部门发明了不少新办法。例如东京一带的老人一般都多多少少拥有一定的固定资产，象住宅、土地等等。金融部门以分期购入的办法，向老人们按月提供抵押金，直至老人过世后才占有这些资产。以这种办法保证老人在世期间有优裕的经济条件。

上野：这种将固定资产变成可流通的货币的办法，有成功的，也有不大成功的。例如京都市。

关泽：什么原因不成功？是不是因为孩子们反对？

上野：正是如此。孩子们当然反对自己的父母将家产提前出售，因为父母在生之年享用了变卖家产的现金，将使他们丧失对这些家产的继承权。所以这种面向老人的以固定资产作抵押现金提前流通的办法，不适合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东京市做的人的固定资产无不是经几代积累下来的，所以代代

相传的意识很强。子女有很强的继承意识，父母也生怕祖传家业在自己手上败落。据说京都市政府首先就不同意这种做法，以“不符合当地的习惯”为由拒绝实施。

关泽：换句话说，象这样家族传统制度保留较好的地方，一般也保留着晚辈照看长辈的习惯，所以老人也就不必将自己的资产抵押成钱来补足老年时期的特别用度了。

上野：如果都能那样当然是最好的了。只怕有一些家庭里的子女，既想要父母的资产，又不肯负担老人的日常开销。

况且，如果老人们将他们的资产现金流通化，他们的下一代就不能成为拥有资产的富裕者了。这样一来，不用很久，很可能就会出现两代人之间的深刻矛盾——父母将自己的有限财产在自己有生之年全部吃光用光；子女想方设法阻止他们，以便能够继承到一点遗产。

关泽：现在子女反对上了年纪的父母结婚，恐怕就有这种原因在作怪。当然要是不登记注册，只是同居就平安无事了。

上野：是的。资产量越大，家庭的凝聚力越大。倒是那种不大不小的中产家庭似乎矛盾最多。

关泽：这就是所谓“家庭内部的两代之争”。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是负担老人退休金的一方，与领受退休金的老人一方之间的矛盾。

上野：根据调查的数据来看，现在实行“固定资产现流通化”做法的东京及东京周围的县市，主要的方式是提前支付房屋售款。

关泽：可是住在东京一带的年轻人今后很难买得起房子了呀！

上野：今天暂且不谈下一代的危机问题，只管我们这一代进入老年以后怎么办……（笑）。

○“生孩子热”时代产生的“新银发阶层”

关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多势众，往往比一般的世代更迭碰到更多的新问题，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能够产生出某些效果的话，很可能使他们的下一代直到老年都会受到这些效果的影响。

上野：从这个意义上说，“银发新人”可能就是这些效果之一。关泽先生的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不是就做过一份很有趣的报告，叫“银发新潮流”吗？

关泽：是很有趣。譬如，按一般规律，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是越来越怀乡恋旧。但是这一趋势恐怕今后就保不住了。越来越多的日本老人直到高年仍保持洋式生活方式，而不愿恢复日本传统生活方式。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东京一带过洋式生活的老人已占12%。更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批40岁

的“银发预备队”中，有一部分人比年青人更主张过洋式生活，认为洋式生活比日本传统式生活更好。早晨一杯咖啡加烤面包既简单又潇洒。反而是20几岁的人，特别是女性反对这些主张，而是从健康着想，每天早晨吃米饭，喝酱汤，喜欢日本饭菜的比例更高些。

也许这些现在40来岁的人，当年生育高峰期的婴儿，即使到了70岁，也照样如痴如醉地听四重奏，喝咖啡就面包。

上野：这也和妇女的效率主义有关。咖啡和烤面包，谁都可以自己做，家庭主妇大可省去做早饭的工夫，何乐而不为。

而日本式的早餐，什么米饭呀，酱汤呀，如同家庭菜谱规范一样煞费工夫，若说顽固坚持这些规范的，无非是丈夫。不过，他们嘴上虽然那么说“我还是想吃米饭”，但是实际上还是顺从妻子的“效率主义”，每天喝咖啡就面包。

关泽：我们曾经做过调查，60来岁的被调查者中约半数每早吃面包，喝咖啡或红茶。不过还有些人，特别是男性，说他们心里还是想吃米饭喝酱汤。

上野：话虽如此，如果让他们自己去做，绝没有一个人肯亲自动手。

关泽：若说今天的60来岁的人的话，的确如此。

上野：40多岁的人还是把米饭、酱汤当家庭菜谱规范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中的男性，一般在家庭里属“传统型人”，我对他们不抱什么期望。

关泽：女性确实保留着某些还未受到家庭传统影响的部分，而男性往往习惯按上一代的老规范去做，走父辈的老路。

上野：不过，在公司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按不断更新的公司章法去做。所以象我们这些40来岁以上的人在公司里属于没前途的阶层。

关泽：当不上组长、科长呀。

上野：是呀。甚至可以说这些40岁以上的职员所得到的报酬与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极不相称的。而且现在还有一种趋势，即只分派他们去干一些出差之类的不关紧要的工作，或者有意无意地拍着他们肩膀，嘟囔些“你该准备退休了”之类的话，无形中使退休年龄变相低龄化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40多岁的一代人中的确存在着男性“婆婆妈妈化”的倾向。说到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心也确实不足称道——虽然不过40岁左右，他们却已经在心理上准备退休，把目标放在“早日离开公司”上。这种人越来越多。

关泽：还有更糟糕的呢——有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全力以赴。

上野：的确不假。从年青时就开始过老年式生

活的“过早衰老的一代”（笑）。

现在我们谈到的这一代出生于二次大战后生育高峰期、40来岁的人，可称之为“高峰期代。”尽管我们不无戏谑地说他们是“过早衰老的一代”，但是等他们果真到了退休，进入老人行列的年龄时，或许会比现在这些常常苦于失去生活目标的老年人的情况要好得多。

关泽：这些人有多方面的兴趣，而且都颇有造诣。可以说，40岁以下的人，今后都不会发愁无法打发闲暇时间。

上野：男女都如此；战后出生的人，都不再把娱乐和游玩当坏事了。

关泽：哲学家中村雄二郎教授在他的近著中指出，他们这一代人把孩子时代的特征带到了成年，又将把这些特征原封不动地带入老年。他们没有经验过成年人应负有责任的体会，却很可能顺利地过渡到老年。

上野：如果按旧的观点来看，这大概算不上一件光采的事。

关泽：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无论什么事情，如果社会上的同龄人都如此，就没什么可怕的了（笑）。

上野：这些现在40来岁的“高峰期代”人进入60岁以后，会不会成为“问题老人”啊？

关泽：很有可能。这些人曾经创办了《平凡势力》杂志。早就有人开玩笑说：“等他们到了一定

年龄，还会创办《老人势力》杂志的”。不过，我所谓“问题老人”，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现在的一般的老人问题解决后而产生新的问题。那种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苦恼现象会减少，代之以什么都想干，干起来不顾一切的精力充沛的新型老年人。年轻人很可能把他们看成“顽童式老人”。

○“银发市场”的近期前景

上野：最近日本政府做了这样一个判断，认为今后社会性福利服务设施的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还是需要老人们自助。

关泽：是的。关于“银发市场”的定义，现在很难下。我们暂且把它分为三部分。首先是老衰老龄者市场。“老衰老龄者”指生理上的老齡者或实际上的衰老者。他们的“市场”指“护理服务”、“护理商品”、“生活辅助商品”、“解除忧虑商品”一类的商品市场。所谓“生活辅助商品”例如假牙、老花镜、自动对焦照相机等等。还有象“假发髻”、“无纽扣内衣”等等勿须他人协助、老人可以自助使用的日常用品。今后的市场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上野：还有省力性的商品。不要太费力气就可以使用的商品。

关泽：总之是可以代替人力的商品。另外还有诸如宗教之类的商品也可能进入“银发市场”。

上野：这可是个不小的市场啊！

关泽：还有个大市场，就是满足要求记录自己的晚年的欲望的商品市场。例如录像摄像机之类，它能满足老人想留下自己晚年生活记录，或者想重温和儿孙们在一起的欢乐情景的愿望。

此外，还有消遣时间的服务设施。老人们除了手中多多少少都有些钱之外，还是时间的“富翁”。所以，各地的休养场所今后最重要的营业方针也应该是面向“银发阶层”。以现有的休养、娱乐业的状况来说，我看是很难满足这些需求的。例如，现在一对夫妇在休养地住一夜，差不多要花掉10万日元。虽然说老人的休养旅行一般不是急匆匆的，有充分的时间多住些日子，但是他们交不起那么贵的旅馆费。今后，肯定会有一些企业经过努力创建出既便宜又舒适的老人休假胜地。不是年青人招待所，而是老人招待所。

老人们刚刚从一个集体（例如公司）中出来，还会有再一次与他人结成新的群体的欲望。对这种或称“社交欲望”，或称“联系欲望”的愿望，市场如何去满足呢？实际上，这无非是要提供或者谁都可以自愿参加，或者和朋友们交往的各种场合，企业完全可能帮助实现这个愿望。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始筹划和实施这类事业了，例如修建老人公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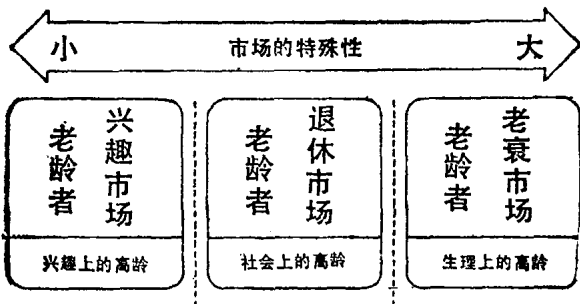
在老人公寓里定期举办联欢会之类的社交活动。至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能成为地方自治体的一项重大工作。这种工作不依靠增加设备和设施，不用花费多少钱。

上野：其实还是要花钱的，不仅要花钱，还得有好技巧，有好办法。

关泽：总的来说，银发市场是一个购买力很强的市场。按美国的统计，买得起豪华型小汽车的平均年龄57岁。实际上，类似的只有达到相当年龄才能买得起的豪华商品越来越多。但是在退休老龄者中间，经济状况的差别相当悬殊，应该特别细致地调查这一部分人的市场。最有趣的是，在对这部分市场做广告宣传时，如果说哪种商品：“这是为你们老人特备的商品，”那么那一定会成为最滞销的产品。但是如果说“这是卖给深知这种商品用途的有商品知识的用户”，或者说“专卖给象你这样富有的顾客”的话，它们就会毫不费劲地被推销出去。这种推销心理学今后恐怕会很起作用。

最后一部分银发市场是面向兴趣老龄者的。老年人都有返朴归真的倾向，他们一般不会对那种一时流行、转眼即逝的商品伸手。另外是饮食的变化。今后的老人也一样会是喜清淡，忌油腻。老人还喜欢怀旧。他们兴趣范围也比年轻人广。总之，市场在如何迎合这些需求特点、开辟新商品和新服务业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银发市场”的三部分



- 自立困难 ——— 护理服务设施（与福利部门有关）
 ~ ——— 护理商品（轮椅、护理床等）
- 老人院 ——— 辅助商品（老花镜、无纽扣内衣、假发等）
 ~ ——— 代理服务
- 自立可能 ——— 解除忧虑商品，服务性业务
- 空闲时间少 ——— 抱有宗教信仰
- 有时间 ——— 每天或星期天娱乐服务、消遣时间的服务设施记
 录欲望（录像摄像机）
- 离开团体 ——— 社交欲望，联系欲望
- 经济宽裕 ——— 差别明显（在美国购买最豪华型轿车的平均
 年龄为57岁）
- 喜欢真实的东西 ——— 与流行背道而驰
- 食品的变化 ——— 喜欢清淡食品，有益健康的食品
- 怀旧 ——— 怀旧、复旧服务设施
- 多样化 ——— 喜好多样，东西方传统与现代均有所好

那种高费用老人之家，总有很多人因为付不起钱而住不进去。在有差别的社会里，最显著的差别恐怕就是老人的社会处境的差别了。

上野：我对此也有强烈的同感。随着老人产业的发达，购买层也会有分化。根据商品质量的不同，老人市场也会出现等级市场——阔老人的市场和穷老人的市场。现在因为还没有把老人市场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一谈到老人，总把他们不加区分地看成一群又穷又凄惨的人。其实不然，他们之间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刚才的一些例子中谈到老人疗养地、老人公寓等，今后会不会是具有同样生活经历、学历，或者经济条件相近的老人结成某种集体，大家联合起来兴办呢？

关泽：完全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由同一企业的退休者联合兴办的公司。

上野：很多人都想加入这种公司吧？

关泽：没错。他们称公司里的领导“终生部长”，“终生专务”（笑）。

上野：这就不会脱离原来已经熟悉的人际关系了。

这样一来，以往被称为“混居社会”的日本社会可能就会变样了。相对于美国等级差别十分明显的社会形态，日本的比较均质的“混居”特征可能会从老人阶层开始消失。

在这场变动中，那些零落的老人可能沦入更悲

惨的境地。

关泽：还有一种可能，同一个企业团体里的人在退休后进入老人公寓时，并非按他们退休前的经济状况决定他们住房的等级。退休前工资高的人，这时突然会被审查财产的拥有量。于是意想不到的大颠倒将可能发生——原来一直是平头职员的小人物，因为继承的财产雄厚，突然搬进了豪华公寓，而工资优厚，一直在公司里趾高气扬的要员，退休后因为固定财产的拥有量不多，不得不住简陋的住宅，或者必须到原来的普通职员的公寓里打扫卫生以补助日常用度（笑）。

上野：真有这种颠倒就好了（笑）。

还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学历差别。现在60岁左右的人，从4年制大学毕业生不足10%。我们40来岁的一代人是最早被称为高中教育普及化的一代。上大学是在60年代后期，当时升大学率也不过30%。男女合计30%，所以女生的比例还不到30%。再加上短期大学也不过40%。现有的市场也考虑到了这种差别，所以在结构上有所区分：或面向大学学历顾客，或面向低学历顾客。如果将这种学历差别也运用到老人市场，得出来的预测怕就不那么乐观了；而且一旦这样区别对待以后，再想缩小其中的落差，恐怕就会问题重生。

关泽：恐怕这种学历上的等级差别是抹不平

的。只有依靠民间市场来解决。

所以，对那些实质上出于金钱的原因买得起或买不起的问题，只好任其误认为是因“兴趣不同”才买或不买。“因为我们情趣高雅别致，所以愿意过这种简朴的生活——住简朴的老人之家而不住豪华的公寓。”利用这样的顾客心理，老人之家很有可能成为市场销路看好的“没有商标的畅销货。”如果这一市场获得成功，那么企业的老人联合团体就会和刚才谈到的低收费老人疗养地一样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因为从少数有钱人手里赚钱比较容易，所以一般人都习惯于面向少数人，而忽视对大多数人的薄利多销的努力。

上野：所谓多样化、个性化的提法正是粉饰这种差距的思想体系。

关泽：是的，是抹煞纵向差距，而让人只看到横向差距。

上野：日本生活科学研究所的权威人士曾经指出，兴办老人之家的最大障碍是土地问题。如果不能从开始就投入巨额资金，那么购买土地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而没有土地一切都将成为空谈。所以必须在土地尚未成为各大公司竞相争购的对象之前抢先购进，否则只会成为空中楼阁。

关泽：这说明日本还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遗憾的是在日本开发老人新市场的计划一直难产。今后恐怕还是模仿美国市场的形式，引进美国

市场的创新成功部分。

上野：我倒不这么看。虽然那些大型企业或许对退休老人事业不那么感兴趣，但是那些中小零散产业却可能产生许多新发明、新想法。就连主妇经营的小买卖也可以加入老人市场。

我和我的邻居有很多交往，她们大多参加了某个联系网。为了争论需不需要把一个月的会费从300日元升到500日元，她们会吵个不亦乐乎。她们都是些闲人，一个人消磨时间要花很多钱，大家一起来消磨时间就无须那么破费了——这是她们联系聚会的重要理由。她们虽然在花钱上斤斤计较，但是对提供自己的智慧和帮助却很大方——难道她们不能做些超越金钱来往的事情吗？

关泽：不过，在给自己买衣服和鞋子的时候她们却从不在乎200或300日元的。

上野：的确不错，她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

关泽：我想她们在自己的团体里之所以那么小气，可能是厌倦消费和消费者的活动，想自己创造出点什么。我觉得她们对银发市场很可能会有所作为。

上野：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她们已经做了10多年的消费者，对消费活动厌倦透了。这回她们想做生产者，索取自己劳动的报酬。这种报酬指的是社会评价，被他人承认的社会评价。她们想要的是听到人家对她们说上一句“谢谢”，“你干得真不

错！”

今后象这样的颠倒——原来的生产者，男人们，对生产厌倦，退休成了消费者，而原来的消费者、女人们，则取而代之，成了服务业的生产者，抚养起男人来——我看这是大有可能的。

关泽：很有可能。半是消费者半是生产者，将自己掌握的技巧和知识教给他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人际维系。这种新的老年生活方式大有可能。而一些民间企业可以介入或协助这些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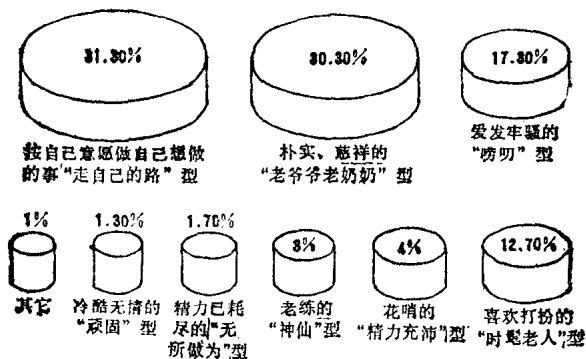
由民间企业协助组成的这样的活动团体可以少量收一点钱。也方便了自己。既可以说它是消费场所，又可以说是生产场所；组织形式近似于“私塾”之类。今后想必这种团体会越来越多。

这种带有半消费半生产性的“私塾”式团体中还可能有些人能力不高，这对老人是很适合的。每次活动都是按步就班，今天有作业，明天有要做的事情，一步一步地进步，使每个人都有切实的“完成感”，每天都有收获，这种方式非常宜于从根本上解除老人的各种忧虑。

上野：这么说来，所谓“等级差别大”并非只指金钱，还有创造良好人际关系的人格力量的差别，这也将对老年生活带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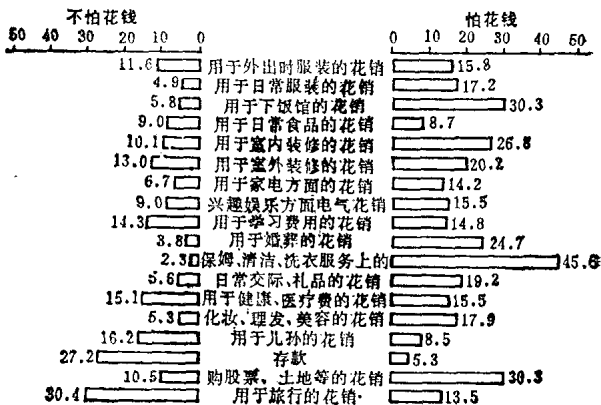
我认为，这种建立新的人际维系的技巧和动力将来自民间，各种团体、自治体，而不是企业。在民间，在自己的居住区域中，本来就蓄积有这样的

向今天40来岁的“高峰时代”提问“你会成为什么样的老人？”



银发者的消费倾向

—根据对2250名怕花钱和不怕花钱的老人的调查—



力量，问题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自己。

○宗教在老人中起些什么作用

上野：我觉得宗教在老人阶层中也有广大的市场。

关泽：根据我们的社会调查，对“你信奉宗教吗？”的肯定回答者所占比例完全取决于年龄——年龄越大做肯定回答的人越多；60多岁的人信教比例明显地高于20多岁的人。但是有趣的是，卜卦算命、或相信特异功能的，却是年龄越大，比例越小。只有信教率随年龄而增长，

上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教人们如何正确地走向死亡的缘故。

关泽：是的，所有的产业社会都提供不出正确对待死亡的方法。

上野：当前，唯有宗教掌握着对待死的技巧，所以它必将继续发展。如果能自觉地认识到老人的这种想找到对待死亡的正确方法的心态，那么找到更好的代替宗教的办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关泽：不过，那种并不顾虑如何对待死，而盼望自己有朝一日突然一死了之的人也很可能不断增多。

上野：不，日本人不会这样。因为日本是重礼仪的国家，不管本人生前怎么想，活着的死者家属总是要为他举行宗教葬礼，为他超度亡灵，所以“一

死了之”是不可能的。

关泽：要说葬礼，的确如此，哪个日本人都会恪守这种风俗习惯。不过我指的是那些生前不拜神的人。他们得了病，或有了什么忧虑的时候，并不到上帝那里去寻求解除疾病和痛苦的办法，而是任其自然，连死都不在乎——我想今后这种人很可能多起来。

目前，在青年人中也兴起了宗教热。传统佛教和其他传统宗教可能在下一个世纪重新兴盛起来，而人们信仰与否也将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上野：还有一些新宗教团体是在经济高度发展期的现代刚刚兴起的，它们的教义和教系完全是现代“高度发展期”型的。所以，这些新兴宗教不是传统的关于“如何死”的宗教，而是关于“如何活”的宗教。但是，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新新宗教”，它们吃掉了一些新宗教，使新宗教很难征集教徒。

关泽：这就象超级市场吞掉小商店一样。

上野：是的。这中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看教义中是否包含与现实利益无关的超自然现象或超度性的内容。那些和日本经济高度发展阶段同期兴起的“高度发展期”型新宗教，从教义的创立上就排除了关于死的超度，是以“世俗宗教”为宗旨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早期入教的信徒现在都已经三四十岁，而且据说主要是以主妇阶层为骨

干。对于这样的一批人，一方面应该让她们加入当地老人护理服务性组织，例如生活福利协会，发挥她们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教给她们对待死的正确方法。

象这样以女性为主体的服务性组织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有趣的。

关泽：这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

上野：对。但是，即使说这种关系到女性的问题也都和一些大城市的现实生活问题密切相联，而一旦面临各种老年的问题，这些组织和宗教一样不能帮助成员们解脱困境——因为这些民间团体，“福利生活协会”也好，“护理互助网”也好，“劳动力银行”也好，也还是只解决“活的方式”问题，不涉及“死的方法”。所以，它们竞争不过宗教团体说到“世俗宗教”也有办法解决“死”的问题，无非是等到你已经濒临死亡、不省人事的时候，对你说一声“安心地去吧！”他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笑)。

关泽：从我们这一代“高峰期代”人开始，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老人思想体系呢？

上野：我想是可能的。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作为佛教的僧侣，或基督教的牧师，活跃在各地的群众间的人才相当可观。

关泽：是的。不过也有不少是当年大学神学系里不肯安分读书的人。

上野：还有一些寺院的修行者。他们是一批非

常有趣的人，多为寺院的后嗣，却在寺院正殿里放爵士音乐，按着现代风格规划着寺院的前景。这些人不少是当地居民区的领袖。

关泽： 等我们这些40来岁人到70来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思想家，写出一部象宗教《圣经》一样的巨著来呢？

上野： 这其中还有文化问题。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就不难明白——日本这个民族缺乏超脱现实的思想方法（笑）。

关泽：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缺乏这种超脱现实的远见性，日本人才曾经是那么狂妄自大（笑）。不过，在我们的下一代，说不定可能出乎意料地出现一些能够超脱现实的人。

上野： 那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男人不能护理老人吗？

上野： 我们询问过一些40来岁的男人“对自己的老年怎么考虑”，发现他们多抱有极不现实的想法。实际上，只能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回避这个问题。而女人，当听我说：“女性还是比较现实的，对老年生活有一些考虑”，一个个象是见到了什么怪物似的，脸上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不知这是不是因为她们早已细致入微地思索过老年的一切，并且自认为满可以健康长寿，不必忧愁晚年的缘故。

关泽：不过，能不能面对现实，适应现实的能力则是另一个问题。

上野：从统计的比例来看，老年夫妇多半是男方先卧床不起，而女方则默默地忍耐着，担负起护理丈夫的责任，或者是对父母的护理责任。

在妇女们对老年的考虑中，理所当然地包含这种对丈夫，对父母的护理责任的考虑。

关泽：这只是一种预想。现实很可能与预想相距甚远。如果现实中真发生了那样的情况，我看她们虽然有可能真心实意地坚持长期护理卧床不起的老人，但也有可能并非真心实意，只是强忍着干下去。后一种人很可能在心里的想法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服务员”，多半出于经济目的而坚持护理工作。这种“服务员”式的护理存在不少问题——作为一个体力和精力都有限度的活人，究竟能否长期忍受繁重的护理工作，而且她们以这样的态度能不能与老人亲人般相处，这都值得怀疑。如果单从繁重的护理“工作”这一个角度来说，我看倒是男的比女的更合适。

上野：话虽如此，若是看看现实中40来岁的男性们，可就没法乐观了。当然关泽先生的想法是再妙不过的了。

而且，男人做护理工作还有一个理由。现在实际护理老人的，多半是家庭里的女儿或儿媳。女儿照顾老人时，往往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常常毫

不在乎地发牢骚，结果使关系变得很糟。女儿毫不理会的直率批评，常在被护理者心上留下深深的伤痕。反而倒是并不那么亲近、也未必真心实意的儿媳——因为视被护理者为与己无关的人，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工作”，所以一直克制、忍耐自己的不满，可以坚持长期作战。类似儿媳的这个特点，男人也有他们容易把护理老人当作一件工作。

关泽：不过，如果只是一味地装出一副笑脸，客客气气的，很可能形成彼此连十分重大的事情也不交谈的局面，这样是不是好事啊？

上野：这就是所谓“家庭内部有距离的人际关系”的结果。一般称其为个人主义。问题是当以保持距离的姿态处理家庭关系的儿媳自己碰到不得不求家里人帮助的时候，她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不是还能维持得和原来一样和气呢？

也有的妇女在考虑老年问题时，不希望丈夫护理自己，而盼望自己能先死。也有的不指望自己的孩子照料自己。当她们卧床不起的时候，只有靠妇女们互相帮助了。这种理想能否实现还是个问号。这些妇女的想法归根到底是把丈夫、儿女都视为无关的他人，一直保持一定的相处距离，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自然产生要表示感谢的心情，所以她们象是永远的客人住在他人的世界里。从这个角度说来，她们在未来的老年人世纪里，似乎很可能有所作为。

关泽：如果男人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改变，那么现在妇女们所设想的互相帮助的某种形式说不定也会出现在男人们中间。

上野：关于这一点，我看若不先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男孩子的办法，恐怕是办不到的。

关泽：我不认为完全办不到。我本人就打算今后努力去照顾自己的同性老年亲戚和朋友，为他们擦洗身体，护理他们。

我倒是觉得靠妇女去为男人擦洗身体，搀扶他们散步、走路，对这种两性之间的肌肤接触，她们能不能完全接受得了还是问题。男人们能不能护理互助关键是等待男人们自己的觉悟。当然也不能说，只要男人们觉悟到了有男性互相护理的必要，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上野：可能最关键的还不是男人们的觉悟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

关泽：你是说文化上有性别差别？

上野：也可以这么说吧。例如，就拿女性来说，美国和日本在女性用身体接触来表示亲密关系的方式上大不相同。日本的女性同伴之间可以相当亲密地手挽手，身贴身地走在一起。若在美国，一定会被认为是同性恋者。

关泽：是这样。在日本男人中，象妇女这样大方地用身体相互接触，虽说也不犯禁，但多半还是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拼命用理性克制自己想用身

体接触表示友情的感情冲动。

上野：男人多不会这样做。

关译：的确。看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日本男人能不能真正做到互相搀扶着散步，给男性同伴擦拭身体，的确是问题。

上野：我之所以强调这一层因素，并不是认为个人主义的老年蓝图是对的。我想当我们这一代妇女到了老年，一定会深深地感到：“我能生为一个女人太好了”，“我能生为一个日本人太好了！”不会成为彼此无关的他人，能够相互照应，这是我们的幸运。日本家庭中那种扶老的习俗还将继续保留；而在家庭以外的保持一定协调距离的人际关系中，也可以相互救助。象这样每个人都能在某种社会或家庭维系中度过晚年，而不是孤独无援的老年社会，每一位为之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妇女，都应倍受尊崇。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妇女开怀大笑的时候。

关译：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前景。但是有些妇女虽然也向往成为这样助人为乐的人，实际行动却怎么也做不到。

男人在老龄世纪里该怎么做才好呢？

上野：等到男人们觉悟起来，也许同样会互相扶助，丢掉男人的架子，和妇女们一样组织起老人救援会，这不是很好吗？

关译：让男人们都象“老大妈”似的吗？日本

妇女们在好朋友之间，经常亲密得脸贴脸，肩擦肩，手挽手。日本的男人即使是放下自尊心，恐怕也很难达到那样的程度。

上野：怎么没有呢？那些年轻的同性恋男孩子不是就那么亲密吗？

关泽：不是同性恋能不能做到满不在乎地相互搀扶着在大街上散步呢（笑）？说句笑话，日本今天40多岁的“高峰期代”人在进入老人世纪以后，如果真是全体都成为“同性恋者”，互相搀扶，互相救助，互相照顾的话，说不定将会非常幸福度过晚年呢（笑）。

○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差别

上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除了性别差别以外，还有“年龄差别”问题。今后的老人中，身体健康者会越来越多，将这些人完全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将会产生不良后果。

关泽：从发展来说，恐怕也排除不了。今后，很可能退休年龄是70岁。

上野：我对此不太乐观。因为今天日本的退休制还有限定工资的最高额的作用。如果推迟退休年龄，即使工资不再上升，对于企业来说，也还是等于以高成本购买低水平劳动力。上了年纪的人虽然工资高，但工作效率毕竟比不上年轻人。

关泽：但是，能不能就说他们是低水平劳动力呢？我看也不能一概而论。

上野：一个高龄职员的工资差不多可以雇佣两到三个年轻人了。当然，招收满意的年轻新雇员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关泽：日本目前的劳动力状况，基本上是全面不足，所以妇女劳动力、外国人劳动力都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目标。由于国家法律的限制，雇佣妇女和外国人的障碍很多。在有关的国家限制没有解除之前，我认为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能性很大。

上野：即使日本特有的雇佣体系崩溃，恐怕现有的按工龄确定工资额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转变为按职务确定工资额制度。因为这样一来，现有的劳动秩序可能全面崩溃，职员的工作动机，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况且，从发挥企业的活力来说，延长退休年龄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所以对那种“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将带来退休高龄化的结果”的颇欠考虑的预测，我持相当怀疑的态度。我认为，企业的体系、宗旨不变，退休制也不会变。

关泽：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产业结构不断向信息化、高科技化发展，如果不能成为跟得上这种技术革新步伐的人，就是制度允许留在企业里，你也不能胜任。

上野：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按年龄划线，一旦超出这个年龄线，就只有请你离开主要劳动力市场。

关泽：还可以进入次劳动力市场——创办子公司，负责派遣技术人才的工作，或者参加老龄服务行业的工作，等等。

上野：可以办类似老人公司的企业，把老人们集中起来做些社会事业，工作可以比较轻松，工资可以低一些。

关泽：这是在退休金之外的收入。老年人会有积极性的。

上野：这就好象让老人去做冒险事业一样，在主劳动力市场周围建立次劳动力市场。我觉得这是可能的。虽然这是一种以年龄差别区分劳动力的形式，未必尽善尽美，但无论如何确立老人的劳动力市场是必要的。

最近已经出现了叫“老龄人才中心”的组织。但是，那里招募的竟然都是些杂务员、警备员之类。但愿今后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不仅按年龄段分别录用，还能注意到发挥老人的智慧和技能。我现在常常想象一种象日本过去村落社会的那样年龄阶梯制社会，即各种年龄各尽其责，年高者起长老的特殊作用的社会。

我觉得，现代社会再向前发展的“超现代”社会倒可能与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不无相似之处。象按性别或年龄等要素而“分别面向”的市场机制，就含有再一次将社会分成阶层的意味。当然，这和近代等级社会的不平等性有本质区别。

老人社会过去，今天与未来

20世纪以前	20世纪	21世纪以后
敬老社会	轻老社会	明老社会
		
依存型共同生存 (互相依赖共同生存)	依存型孤立生存 (依赖而又孤傲)	自立型共同生存 (自立而共同生存)
农村型老人 (一生生活在农村)	混合型老人 (生于农村长于城市)	城市型老人 (一生生活在城市)
平均百分之几的比例 (婴儿死亡率高, 多生, 短寿)	10%的比例 (婴儿死亡率低, 少生, 较长寿)	百分之几十的比例 (长寿者多, 有势力的阶层)
老人为贤者 (农业、礼仪的智慧者)	老人为弱者 (由于工业化和非礼仪化, 老人的智慧无意义)	老人为强者 (在知识集约型社会, 老人的知识和人际关系有效)
贫穷的生活 (全社会贫穷)	优厚的收入 (年轻者收入优厚)	富裕的资产 (有积蓄的老年者富裕)
老化早 (医疗落后, 营养不良)	老化晚 (医疗改进, 营养改善)	战胜老化 (战胜各种成年病)
循环的时间概念 (新旧东西同等价值)	进步的时间概念 (新东西, 年轻者有价值)	超脱进步的时间概念 (旧东西, 老龄者得到公正评价)

续图

<p>家庭劳动社会 (老人在家庭内作用有保证)</p> <p>前民主主义 (特权阶级政治)</p> <p>男尊女卑 (男性优位社会)</p> <p>弃老 (不敬老的一面)</p>	<p>劳动中心社会 (老人被排除在劳动之外)</p> <p>年青人民民主主义 (年青人影响力大)</p> <p>男女平等 (妇女社会地位上升)</p> <p>孤老 (比轻视老人更糟的情况)</p>	<p>余暇中心社会 (老人是余暇社会的先导)</p> <p>老人民民主主义 (老龄者发言权大)</p> <p>女性优位 (女老龄者比例大)</p> <p>? (如果使老人地位明确化的社会进步运动失败的话)</p>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超工业时代

今后日本终将从“家庭社会”转变为“村落社会”。迄今为止，一直是“纵向家庭社会。”

关泽：兴办老人产业虽然是冒险的尝试，但在现实中已经破土冒芽。如果抱着不怕失败的决心，说不定就能成功。

上野：是的。老人们都有退休金，可以不指望这种投资吃饭。这正是老人力量之所在，风险再大，他们也不在乎。

关泽：另外，这些老人中可能有些是有一技之长的。按一般规律，年龄越大，技艺越高明。也许这是一个过份理想化的设想——譬如有些老人从年轻时喜欢某种工艺，并且一直坚持业余时间从事这种工艺，能否到上了年纪离开自己的本职时，开始专事这种工艺创作，也即“第二次人生”？

上野：这是一种手工艺劳动者、技能劳动者。我觉得是可能的。这种工艺性工作，既有益于身心健康，又可以通过手的活动防止大脑僵化。有的老人退休离开公司后开始办起面馆，卖自己擀的面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泽：这是一个人的第二次人生，象农家种稻，一年收获两次；一生从事两件事业，实在令人向往。这一类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象“文化中心”、“趣味市场”一类的场所，都可以向老人们提供条件。40多岁的人，若想为自己的第二次人生做些准备，可以象大学生读两个学校——一面上大学，一面读一个专科学校——一样，也读一个业余专科学校。

上野：现在，那些原以启发式教育讲座为主的成人教育，都已经变成有实际目的性、实用性很强的就业准备讲座。我想那些面向老人的社会教育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不光有教育讲座之类的内容，还会有实用性强的，和生产实践直接相关的技术技巧讲座之类的内容。无论原来的学历、经验有多丰富，一旦走入一个新的领域，谁都得从零开始。那些在本职上一味用脑、精神高度紧张的人，在这种业余学校里从事只动手、脚的手艺创造，他们将从中获得多大的喜悦，可想而知。

关泽：一定会非常快活的。例如，可以请那些有20多年工艺经验的妇女向中年男子讲授彩色玻璃

工艺的制做技巧。在学习中，平时很少请教别人的中年男人会非常自然地展开与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的交流，这是很好的事情。我看今后这一类的工艺讲座，手艺人的传统技艺很可能因此而复兴起来。

上野：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能换一个行业，到一个新的领域里从头学起，那一定会使我心里充满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有人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一直只钻研学问而不去试一试呢？”我会回答他“因为我反正现在也死不了，为了消磨自己漫长的人生，我只好钻到学问里去喽！”

现在常说“人生八十年”，活得腻味的时间太长了。对一件事情腻味了该怎么办呢？我常常深深地为此而苦恼。所以，如果能变换一项工作，换一个行业，做一个初学者，从头做起，这真是度过“人生八十年”的再好不过的方法了。

○人多势众的银发阶层——上野

一谈起“老人”这个话题，便离不了“痴呆”或“卧床不起”的灰暗印象，我早就对此感到不满。当然的确有些极端的情况，正象电影戏剧中经常出现的那些关于老人的各种社会和家庭问题的情节一样。但是这种极端情况只占老人人口的不过百分之几。大部分老人既未陷入贫困的泥沼，也没有被逼得除自杀无别路，他们大多这样或那样地顽强

生活着。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一下这些占老人大多数的“一般老人”的生活情况。

关泽先生几年前曾经采访过我。他的采访方法一开始就很不一般，四面出击，左右盘问，给我留下了“很干练的采访者”的印象。他是与日本最大的广告代理公司“电通”相抗衡的“博报堂”广告代理公司所属生活综合研究所主席。广告公司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它的广告宣传对象在老人中只限于有钱者。根据预测，今后在老人阶层中，有钱者将不断递增，贫困者会越来越少。基于这一肯定的老人阶层的基本形象，广告公司正在将自己的重点宣传对象瞄向老人。

关泽先生与我同样出生在“生育热”的时代。他相信不同年龄段的同龄人具有同样的流行倾向，所以他认为可以将我们这些40来岁的同龄人成为老人以后称为“银发新人”我们这一代人是“平凡的一代”，如果要适应今后成为“强势的银发阶层”而世对21纪社会以相当影响的未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准备做为一代新的老人，献给社会全新的老人形象。我与关泽先生以这种共同的心情向读者献上前面的对话。

“潮湿落叶族” 倾向与对策 ——老龄化社会 的人际维系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

樋口惠子。1932年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女评论家。

○“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

上野：听说您是“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的代表，不愧是一位实干家。这个协会建立多久了？

樋口：1990年9月我们召开了第九届大会。1982年9月召开第一次讨论会的时候，我只是临时搞个运动；虽然当时参加者很多，还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并把我推为委员长，但是我打算至少1983年、1984年以后再成立经常性组织。我这个人很懒，很想找个机会退下来，结果都是大家积极行动，推

着我走。1983年13月我们正式成立了会议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还是因为时机已经成熟的缘故。我想做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于到1993年——创立10周年的时候。

上野：樋口老师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而丰富多采，有时候问起“您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简直没法儿用一两句话回答得了。但是细想您所干的那许多工作，最近好象对老龄化社会问题表现出比较集中的兴趣。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意识地决定这样去做的？

樋口：并不是那么明确而有意识。老人问题本身是一个长期问题，而且还不断地出现新的动向，新的问题，可以说是想摆脱也摆脱不了的问题。况且，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还会出现社会结构变化之类的问题，象这样包罗万象的老人问题实在是不断勾起人无限的兴趣。

我们这个组织的成员一方面都是个人成员，无论是专家、普通自愿参加者，还是家庭主妇，都是以个人名义入会，一律平等，一视同仁。除此以外，凡是活跃在当地居民中的妇女团体，无论是学习团体，还是食堂之类的服务团体，也都可以做为一个会员加入协会。这些原来独立的团体入会以后并不变成支部，而只是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即形成一个人际联系网。

上野：我觉得的确是时机成熟了。但从另一个

角度说，尽管时机成熟了，如果没有一个事先有准备的组织引导这些活动——象果熟蒂落，却没有接果子的托盘，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樋口老师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在别人都没有意识到有准备“托盘”的必要的时候，您“买”了“托盘”，还把大家都吸引了过来，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您为核心的人际联系网。

据报道说，1989年的第八次全体会议曾动员了两千多人。

樋口：那个报道不准确，只是租用的会场可以盛下2100人，而实际到会者达到2700多人，结果惊动了消防署，成了轰动事件。

上野：现在关于妇女问题的聚会，能够召集300人以上的参加者就相当轰动了。很难有什么妇女会议能够有千人以上出席。而您主持的1989年的会议竟然有2700人到会，而且会场还设在远离东京的偏僻的高松市。这是一次意义相当深远的会议。

樋口：可以这样说。在急速老龄化的现代社会中，大家都感到不知所措，都在苦苦思索。

上野：樋口老师在概括实际特征、归纳命名上非常有造诣，这是众所周知的。您最近又发明了“潮湿落叶族”的说法……

樋口：不是“发明”，而是对我身边确实存在的一类人的形容。一些退了休的男人，每天无所事事，就围在妻子身边转，象是秋天的落叶被霜打

湿，贴在游人的衣裤上很难脱落一样。有不少人向我抱怨，“本来是妻子的活动，丈夫却象‘潮湿落叶’一样，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真是没办法”。我引用了她们的话，想不到竟成了当前的流行用语。这本身也说明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老年现象是有问题的，该引起社会关注了。1973年时，我曾使用过关于老人的“托老所”这个词儿，就没有引起大家的注目，在当时一点儿也没流行起来。

我在很多地方都碰到中老年家庭主妇因为退休老伴扯后腿而不能经常出门的情况。所以，我就开玩笑似地提议兴办类似托儿所那样的“托老所”的机构。我很欣赏自己发明的这个新名词，也曾使用过若干次。但是听到“托老所”一词儿的人都只一笑了之，没有把它延用下去。这也是因为当时退休阶层人数还不多，没有成为社会问题。

1981年，我说过有种倾向把老人看成象电视、电冰箱一样的“笨重垃圾”，扔又没处扔，用又不好用，虽然受到一些批评，但却一下子流行起来。这就象你曾经也说过的“产业废弃物”一样，深深触痛了当事者。

最近“潮湿落叶”流行起来。我使用这个词儿是因为感到退休后男人的变化，是对他们抱有期望的。男人们只有对妻子的活动怀有好奇心才会妻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退休之前，企业的水份是吸附力，企业的水源断了，树叶就会干枯落地。其实干

透的树叶身轻体灵，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自由飞舞。我闲时常把自己对“人生八十年”的期待写成歌词来唱着玩，其中就有一句是“潮湿落叶快快干，自己飞起来”（笑）。

附：“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简介

以1982年召开的“妇女老人问题讨论会”为契机，到会妇女踊跃发表各种建议，并随后开展了多种活动，次年成为经常性固定组织。

目前有个人会员757名。会员分布从北海道到冲绳，年龄包括从20几岁到80多岁各年龄层，职业也多种多样。在各地地方活跃的团体参加者也很多，达56个。

协会通过发表论文集、召开演讲会、出版双月协会报等等传达和交流信息的办法，促进各种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人际交流，向社会提出各种忠告和建议，以促进更理想的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1987年，该协会实施了“关于家庭老人福利设施”的社会调查。以调查结果为基础该协会向厚生省等有关部门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书。1988年组织了“欧洲老人福利措施考察团”，并将考察到的状况与日本老人社会福利状况相比较，制出关于今后老人福利事业的设想，提交给政府有关部门。

老龄化社会将面临的各种问题，不仅有妇女问题，也有男子的自立问题，还有在充分发挥个人和公共机关作用的条件下，应该创办什么样的老人福利事业，等等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靠我们自己——妇女协会的宗旨即在于此。

○男人退休后向何处去

上野：我想“潮湿落叶族”的说法之所以那么快就成了流行语，背景就在企业的退休男子剧增，他们的不幸状况突然变成社会上的明显事实。我曾用“产业废弃物”来形容他们的不幸状况。但是那些一直在自己的居住地附近经营个体事业的老人，情况相对好得多。

有些企业的退休者申请加入了当地的老人会，但是他们和那些当地老人总是油和水似地溶不到一块儿。大部分地方老人会都是当地个体经营者掌握实权。突然加入进来的企业退休者，生活经验不同，学历也不一样，待人接物的态度更不能相提并论——企业里的人一向是高人一等的（笑）。一般来说，做小买卖的总是低着头。所以他们之间总搞不好关系，常常不欢而散。

也许是上述原因，现在各大企业也开始认真地考虑应该如何照顾自己企业的退休职工了。现在的企业退休者俱乐部就是一种这样的机构。这种情况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失望——好容易到了可以脱离几十年来的公司社会关系的时刻，又被公司的纽带重新缠上，不到死不能脱开。

这种退休者俱乐部做事常常不考虑退休者的心情，有时还会出人意料地做出一些相当冷酷的事

情。例如，有的把退休者纪念俱乐部设在公司的办公大楼里。这样的地方，谁肯去呢？昔日自己奋战几十年的战场，如今自己的同事和年轻新职员仍在那里繁忙地奔波着，而自己、一个闲人，没事儿去那里看他们怎么忙碌工作？！谁的自尊心也容忍不了这样的挖苦。

另外还有的地方政府正在考虑兴办老人大学的计划。学生是那些学历很高的老爷爷们，他们一辈子都喜欢读书学习。这种机构是男人的世界，是一种变相的“托老所”，“男子保育院”。

樋口：我常常应邀去老年人学习会或老人大学，见到的参加者多半是经济上比较富裕的。

目前日本最兴盛的老人活动场所要属文部省办的老人大学、厚生省有关部门办的老人俱乐部，参加者之多在全国属一属二；其次是劳动省办的老年人才中心，高龄者事业团；还有劳动工会也办了一些老龄组织，剩下的都是民间兴办的各种老人团体。

我觉得能去这些团体参加一定活动比不去好。与其在家里做“笨重垃圾”，不如去参加有一定目的的活动。不过，类似这样有组织的团体常常是男性社会，尽管有可能妇女占多数，但是多半被选中的大学班长是男的，老人俱乐部的部长也是男的，代表发言的还是男的。

上野：虽然在老人大学里是男女同学，但是我认为不能就此而奢望老年人的大学会比年轻人的大

学有重大的突破，可以从现在的男女分学变成男女共学。有不少妇女在自己的居住区里参加了几十年的妇女活动，对女人世界里别有情趣之处深有体会，但是老了以后，不知为何偏要参加老人大学之类的活动，不得不为了男人的面子在男人面前低头鞠躬的。

樋口：是有这种情况。不过我还看到另一种情况——70岁以上的妇女，特别是在大城市以外，她们差不多没有出门的自由。

最近我参加了总理办公厅主办的一个关于中老年人计划的工作，这个计划旨在发掘“长青树”式的老人典型，他们不断开辟自己的第二次人生，第三次人生，对老龄社会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当把全国有关资料收集起来以后，我们发现其中男性占压倒多数。那些在暮年里做出惊人成绩的男人令人赞叹不已——70岁以后开始学骑马，或者画的版画被入选，还有考上研究生；80岁开始学画画儿，88岁开个人画展……等等。但是，也因为这样，他们的妻子必须守在家里协助他们。丈夫开辟第二人生是以妻子牺牲社会活动，专在家里为其服务为代价的……

还是我们这些60岁以下的妇女，比较敢于按自己的意愿去做。

上野：妇女活动的活跃时代也就在50岁上下的时期。

例如50岁以后才开办个人画展的妇女不乏其人。用不着打什么旗，呼来唤去，甚至刚刚表示一点要办个什么“妇女活动中心”的打算，前来报名要求参加的妇女就会挤破门。目前日本妇女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的积极性实在是高得异乎寻常。

男人开辟第二次人生的最大转折点就是退休。但是我们这一些“高峰期代”人，在企业里受到“提前退休”的冷遇，这个转折点差不多提前了10年。且不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无论为公司做出多少贡献，也再得不到地位和工资升迁的相应报酬了。这些为数可观的40多岁的人恰可以适时地看清这种现实，以早日开辟自己的第二人生的态度主动地迎接这个“企业内退休期”的到来。

妇女的这个时期到来的更早，比男人还早10年甚至20年。我曾经对女人们说过非常冷酷的话：“你们已经是被社会忘掉的人，社会的任何一个角度都不会呼唤你们。”“因为孩子们曾经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辞去社会工作，回到家里专门照顾他们。但是，不过10年的转瞬间，这些孩子也不再需要呼唤你们了。”“到孩子们不再呼唤你们的时候，若还要介入孩子们的生活，你们只能让孩子感到多余和讨厌。”“所以，总有一天你们会进入一个谁都不会呼唤你们的人生阶段——社会不会，公司不会，丈夫不会，孩子也不会。”

所以，我觉得妇女最好能认为自己的老年从35

岁以后就开始了。这样，你就可以比男人早一步来考虑“自己为了‘老年’生活更丰富多彩而要学点什么本领和技能。”

樋口：妇女从什么年龄开始“坐冷板凳”呢？一般是最小的孩子进小学以后，也就是35岁前后开始成了家庭不折不扣的“坐冷板凳”的人。每天一早站在门口送走丈夫和孩子，晚上做好饭再到门口接丈夫和孩子。35岁的年龄正是精力旺盛时期，在这个年龄，只要一开自家的窗户，就会注意到邻居的窗户开没开。男人若在公司里“坐冷板凳”，马上就会无精打采地回避他人，妇女在家里“坐冷板凳”，却会自己跑出门去和邻家妇女聊闲天。这些在家里“坐冷板凳”的妇女打开窗户，从“缺氧”的家里跑出来，互相呼唤，结社组会，寻找自己的新人生天地。

所以，日本的夫妇从意识与行动上说，差不多好象有20岁左右的年龄差。夫妇“坐冷板凳”的时间差给日本的夫妇关系带来各种各样的矛盾。

○日本男人的“浮余负债”

上野：一谈到老龄问题，男人的问题总是很突出。而妇女们本身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倒十分切合实际，这是很令人高兴的（笑）。

樋口：从老龄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最清楚地看

到男女在社会上按性别分工所造成的矛盾。

上野：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应该让家庭里的男孩子学看照看男性长辈，从中体会没有生活自立能力的男人，那些一味依赖女人——或者依赖妈妈，或者依赖妻子的男人老了以后多么不幸。

樋口：不管怎么说，照看老人基本上还是属于体力劳动，是较比适于男人的工作。

日本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中有关于妇女不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具体规定——断续作业负重量不超过30公斤，连续作业负重量不超过20公斤。这是根据医学方面的科学测定——超过此重量限，妇女身体机能就会受损——而规定的照看老人的工作常常有可能超过30公斤负重量。

上野：这么说生育期的妇女从生理上看尤其不适于照看老人啰？

樋口：应该说这种规定适于所有妇女，与能否生育无关。因为重体力劳动会造成子宫脱垂。我想也许还因为女性的肌肉缺乏爆发力。总之，在日本雇佣劳动力必须按劳动基准法办事，如果从雇佣劳动的角度来说，妇女是不能从事看护老人的工作的。

上野：这是个很有趣的逻辑。不过最近男人们也都柔弱起来，干一点活儿就会闪了腰（笑）。

樋口：我有两个朋友是一对70多岁的夫妇。有一次老头住了院，老太太马上也住到医院里不分昼

夜地护理老伴。等到老头病好出院，老太太又躺下了。结果不得不找保姆同时照顾他们两人。因为老头不会照看病倒的老伴，也不会管理自己的日常起居。从那以后，即使老头不病，他们也一直坚持请一位保姆帮忙，以备万一。

上野：的确，是有这样一些老人，他们一生都象“病人”一样需要别人照顾却不能照顾别人（笑）。

樋口：大平任总理大臣期间（1978年~1980年）日本曾发表过《厚生白皮书》，规定同居家族属浮余资产。这种规定的出发点是“一般家庭照料老人的都是女儿或儿媳，这就相当于省下了请外部劳动力帮忙的费用”。真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如果女儿和儿媳都参加其他社会劳动的话，不是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吗？所以，这种以牺牲社会劳动力为代价换取照料老人的劳动力的作法，对社会来说，不是“浮余资产”，而是“浮余负债”。

上野：有道理。算成“浮余资产”是把这部分劳动价值加在社会劳动价值上。而实际上应该是从社会劳动价值里减去才对，所以应该算“浮余负债”。日本的“浮余负债”值相当之大呢！

樋口：所以，至少应该使“浮余负债”减至“零”。也就是说老爷爷们应该争取能自立，这种自立本身就是对社会做贡献。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要做到这种不依赖他人的自立是很不容易的。

即便如此，男人们还是要努力改变自己，包括60、70岁的老人都应该努力学习自立。

○“所有的儿媳都不好，事情反而好办了”

上野：我想日本政府的“老人护理靠家庭”政策显然是以依靠家族中的年轻妇女劳动力为前提的。但是被置于照料他人的地位的妇女们，一旦承担不起那么繁重的劳动，发出紧急求援的悲鸣时，谁来援助她们呢？看不出政府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而且即使给出一定的援助，怕也是无济于事了。现在，“跨出家庭，互帮互助”式的地区性互助团体之所以在各地纷纷成立起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樋口：参加我们“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的团体会员中有很多是这种互助小组，有的“生活联合小组”已经开展了互助活动，有的准备开展互助活动。但是这还是一种按性别分工的形式。

我一直强调：“是日本家庭里的儿媳太能忍耐，才造成了日本社会福利事业的落后。”

上野：我也屡屡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还说过“日本妇女的‘忍耐’使日本社会无法进步”之类的话。所以很多人对我不满，说我站在女子大学的讲台上，把女大学生们都教成了“厉害、任性的时髦姑娘”。

樋口：我看要是说“所有的儿媳都不好、事情反而好办了”呢？（笑）

上野：要说地方性福利事业也按性别分工的话，那么那些“护理者联系网”、“劳动力银行”“社会福利活动组织”等等都是妇女援助妇女的形式。男人是根本不在这些组织中露面的。

要想打破这种现状，可以利用关于家庭关系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譬如让丈夫为婴儿换尿布，他们多不情愿；但是如果让他们去给父亲换尿湿的裤子，相对就比较容易办得到了，因为从道德观念上说，他们会觉得那是自己的生身之父，应该去做。

还有一点，就是日本社会“长幼有序”的传统影响很深。你要向公司里请假说“我要在家照料孩子”，那风言风语的议论简直会让人受不了。但是要是向工会请假照顾老人，你会相当顺利地得到带薪休假的许可。“我们家的老太太病倒了，我得送她上医院，所以今天要早退”——你把这话一说，同情的话语立即就传出来：“你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好好照顾老太太！”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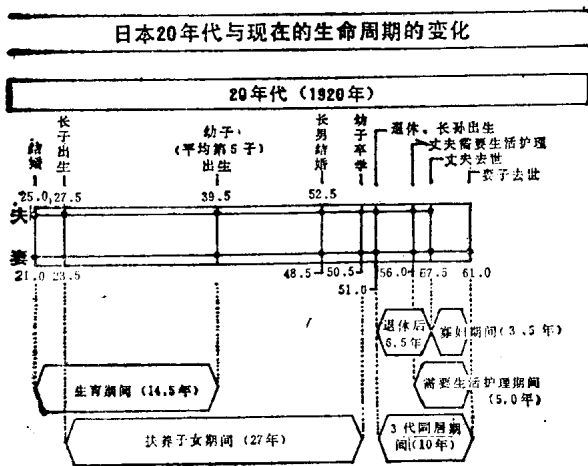
若说在家里养老，其实今天的妇女并不希望过北欧流行的那种独身晚年式的生活。在调查“高峰时代”人“对自己晚年生活方式有什么希望”时，36%的人希望和自己的家族一起度过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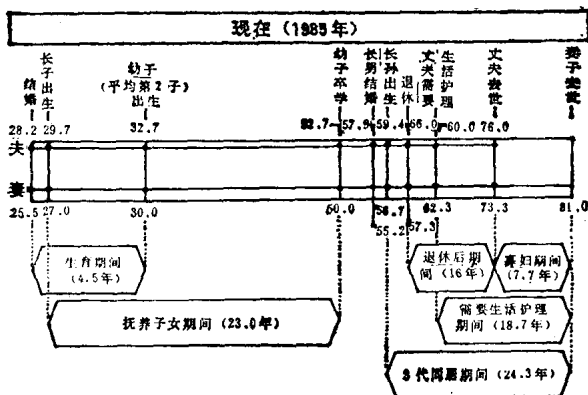
樋口：“高峰时代”人是不是都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呀？

上野：住在一起。“高峰时代”的上一代，因为长子离开乡土外出求职的较多，不得和父母分居两地。而我们这些“高峰时代”的40多岁的人多半和父母住在一地。这也是因为40多岁的人大都孩子不多，牵挂少，所以很多人离开乡土工作一段又返回老家。

樋口：婆媳关系一般相处得好吗？

上野：“高峰时代”的40来岁的妻子们是最可能半途而废的妻子了（笑）——又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又不愿放弃自己做妻子的宝座。所以，虽然现在还能和婆婆相处，但很快就将面临照料公婆的老人护理问题。她们现在的和平生活如履薄冰。一旦公婆躺倒，她们怎么办？实在是将面临包括离婚危机在内的严重问题。





● 根据日本厚生省1986年《厚生白皮书整理》

日本20年代与现在的生命周期的变化

(左图注解) 20年代 (1920年)

①结婚②长子出生③幼子 (平均第5子) 出生④长男结婚⑤幼子卒学⑥退休、长孙出生⑦丈夫需要生活护理⑧丈夫去世⑨妻子去世⑩生育期间 (14.5年) ⑪抚养子女期间 (27年) ⑫退休后期间 (6.5年) ⑬寡妇期间 (3.5年) ⑭3代同居期间 (10年) ⑮需要生活护理期间 (5.0年)

(上图注解) 现在 (1985年)

①结婚②长子出生③幼子 (平均第2子) 出生④幼子卒学⑤长男结婚⑥长孙出生⑦退休⑧丈夫需要生活护理⑨丈夫去世⑩妻子去世⑪生育期间 (4.5年) ⑫抚养子女期间 (23年) ⑬3代同居期间 (24.5年) ⑭退休后期间 (16年) ⑮寡妇期间 (7.7年) ⑯需要生活护理期间 (18.7年)

——根据日本厚生省1986年《厚生白皮书》整理

40岁左右的妇女，对照顾丈夫的双亲感到腻味的时候，就想到唯有离婚才能解脱，她们毫不犹豫地提出离婚。而50岁以上的妇女一般不会迈出离婚的一步。

樋口：是的。从50岁过渡到40岁一代人的过程中，是因为男的变化，还是女的变化造成了上述区别呢？——关键还是因为妇女们变了。例如最近对30岁到70岁以下的男女进行了一次关于与父母同居情况的调查……

上野：明确表示赞成与父母同居的，男的占46.3%，女的却占39.0%。

樋口：而赞成与父母分居的女的占10%。

上野：这个统计是不分年龄段的。总之，男方对家庭还是抱有很多希望的。

樋口：是的，尽管他们一个个家庭关系未必都美满。

当问到“当你卧床不起时，谁来照顾你”时，回答“靠社会福利机构”的男人只有25.8%，而女人却占33.5%。可见开辟社会性老人互助道路多要靠妇女的力量。

上野：妇女对家庭之所以幻想少，因为她们对家庭有丰富的实践体验，象相处不好的婆媳关系。而这些现实往往男人是看不见的。

樋口：这也就是我当年有勇气负责起妇女协会工作的原因——为了创造理想的老齡化社会，我们

妇女应该勇敢地挑起先导的重担，把那些不争气的男人带动起来。

上野：怎么样，您把他们带动起来了么？

樋口：我是比较乐观的。我想把1988年到1989年称为“男人自立元年”。

1988年日本神奈川县政府为了响应妇女们的挑战悬挂起了一幅“不能自立非男子”的匾额以教育县政府职员。这事影响很大。他们还做了一个测验表，让职员回答“yes”或“NO”。出的问题有“你会做饭吗？”“你知道家里的内衣和袜子都放在什么地方吗？”等等，共有15条，给答案评分以判断你今后会不会成为家里的“笨重垃圾”和“产业废弃物”。为了男人们能有这样觉悟的一天，我们已经唠叨了十几年，这一天终于到了——男人社会第一次接受了妇女们投过来的挑战的“球”，并在男人们中间传递起来了。此外，现在来听我的演讲会的退休男子多起来了。根据各地方的报道，政府开办的面向男性老年人的烹饪讲习班也兴盛起来。

最有力的证明是老人护理学习班的变化。这种地方的学员向来只是中年家庭主妇，可以称为妇女世界，而千叶市社会福利协议会1988年办的护理学习班的50名学员中，第一次出现了5名男学员。由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长，男人退休以后父母往往仍在世，所以男人也可能要做照料老父老母的工作。

原来一直是妻子一个人承担一切，现在妻子身体已不如从前，“自己不能全依靠妻子一人”，“自己也可以完成这项工作”，“这应该是我的工作”——这样想的男人会渐渐多起来。

上野：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原来完全依赖别人是不幸的事情。

○自己的老年生活，自己决定

上野：我觉得“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主要面向的是可以完成老人护理工作的儿媳、妻子、女儿一类身份的人。但是对妇女本身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他人护理的问题，包括您自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樋口：最近经常可以听到“正常生活化”、“正常人化”的说法，提倡所有人——老年人也好，残废人也好——都要象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一起。日本人大多都已经从概念上对“正常生活化”、“正常人化”的意义有了理解，但实际上和欧洲的情况相比，还存在根本性差异。欧洲流行的是“自己决定权”，“自己决定自己的老年生活”，其基础在于欧洲发达的社会福利服务事业。日本的情况则相去甚远。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希望住在自己家里，上了年纪以后，甚至出入坐着轮椅，也想尽量住在家里，

自始至终一个人过日子。我想我们妇女协会今后的目标之一，就是研究如何能保证一个人生活的妇女在社会上、生理上、经济上都能有幸福的老年，并向政府和社会提出我们的建议。在我们1989年召开的大会的4次会议中，有一个议题是“援助老龄人的福利与医疗网”。这个问题就与“一个人生活的妇女必须将自己的自立生活维护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有关。

上野：行动不便或生病的时候也坚持一个人生活吗？

樋口：是的。当然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得住院。

总之，到自己动不了的时候，至少不是在“去老人福利机构养老”还是“在家里养老”二者之间可以任意选择的问题，只有听凭他人处理。在一个人生活的老人中，妇女占80%，所以扶助那些一个人生活的老人问题和妇女的关系极密切。所谓“在家养老”是有限度的。如果在老人居住地的附近没有“尽可能近便的”老人救助设施，“在家里养老”便没有保障。

归根结底，要改变现有的关于老人设施的社会机构。100多年前的日本明治政府，在1872年那样的贫穷落后时期，就在全日本拉起了“小学校网”，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就近入学。象这样居住区内配置的小学校，老年人也可以步行前去。我前不

久曾提过关于建立类似“小学校网”的“老龄服务设施网”的建议。因为东京地价太高，不可能另外设立，所以可以在现有各小学校里增设老人设施。附近的老年人可以象小学生一样白天到这些小学校去，在那里吃饭，或者接受其他针对老人的服务。也可以一周，或十天去那里一次。总之，应该建立起这一类老年人居住区内的服务设施。建立居民区内小规模老人寄居设施也很必要；虽然都愿意在家里养老，但是到了病情严重、不能生活自理的情况下，进入离家最近的有老人护理设施的医疗机构还是最理想的。我认为帮助独居老人的两种途径——可以自理时的活动场所和不能自理时的护理场所都必须加以认真考虑。

另外，我对子女对待老辈人的态度想得也比较多。我不赞成子女们根本不照看父母。我觉得子女一般都有在可能情况下照看父母的责任感。如果父母与子女关系融洽，这种责任感的表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倘若超出自觉自愿的范围，变成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压力，“这事就该媳妇干”，“这是你们家属自己的事”，“你们不做就是不孝顺”，等等，那就会造成本人的不满。我认为，可以保证子女能自始至终照料老人的最好办法应该是既要考虑到父母与子女的感情，又要考虑物质上的保证。

但是今后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到了下一个世纪，“父母九十几七十”的现象会比比皆是。要完

全靠70岁子女照看父母是不可能的。况且今后不乏父母反而比子女更健康长寿的可能。就算70岁的儿子身体还好，也背不动自己的老父老母了。

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有一首诗，把当时母子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母子嬉戏子背母，老母身轻似未负，举腿三步双膝软，儿忧母衰伏案哭。”这诗所描写的上一个世纪，还是“人生五十年”，50岁便属长寿的时代。以50年为一生，儿子20岁以后依赖关系就该转换了——20岁以前是父母照料儿子，20岁以后是儿女照料父母。

而现在是“人生八十年”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象那首诗写的，再以儿子背老子的例子来比喻，很可能有人会写出这样的诗句——“父子嬉戏子背父，老父体重不胜负，半步未举腰骨折，双双住院求人助”。（笑）

上野：说得妙极了。

樋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上述情况，今后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如果只靠子女照看父母，一旦出现“两代老齡并存现象”时，“双双跌倒”、“双双住院”的情况或许还好办些，如果儿女反而先父母而去世的话——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怎么办？家庭里失去了中间承上启下的一代，很可能失去原有的协调。

所以我认为在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的今天，

辅助家庭护理的地区性横向老人福利设施网，对于老龄社会如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

上野：我很怀疑政府是不是真正打算这样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象我这样没有孩子的人；而且就是生，我也只想生一个，若是生的孩子有什么意外，那就又剩我一个人了。所以今后独居老人决不会是少数。

一方面，象这种情况，独居成为势所必行的老人的生活不能没有保障；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一直在家庭里和子女同居的父母，老年以后愿意自己独自生活，这个愿望有没有可能实现。

樋口：我看这是最成疑问的问题。瑞典的男女老人在儿女成年以后都毅然决然地选择独居生活的道路。虽然同是人类，说起来日本人也应该具备瑞典人那样忍耐孤独的毅力；但是真要实行起来，说不定从现在开始还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日本人才会有那么强的独立性。

上野：我的一位住在瑞典的朋友曾说过：“不培养个人奋斗精神的地方，公众福利事业就不可能发达。”所以在未来世纪里，日本人将面临能不能抛开对家庭的依附，能不能摆脱家庭的束缚的考验。

樋口：首先教育方法就成问题。日本的教育是抹杀个性、只强调将个人融入于集体的教育。这种教育与单个老人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孩子可以过

集体生活，成人可以按公司规定行动，老人怎么可能人人都一样？！要想让日本人的观念改变，必须经过一段从一切角度反复坚持宣传说服的过程，才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座标轴移动。这种工作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上野：现在的孩子，父母为养育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但是大了以后却往往与父母的期望背道而驰——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原因之一在于父母有将孩子私有化的倾向。

只要少年、青年们接触一下，就会发现他们视父母为沉重的负担。我问：“这么可怕——是不是好象背在背上的魔鬼，越走越沉？”他们目光暗淡地深深点点头。看到他们那受到沉重打击似的表情，难免使我想到了这种“花钱费力养逆子”的现象的根源。正是当前的家庭结构。

樋口。正是如此。在“孩子私有化”的另一面是“父母的财产私有化。”

现在可以自由结婚的只有年轻一代。他们可以不顾任何人的反对自由结婚。

老年人就不行了，现在想再婚的老年人没有不遭到子女反对的——因为有财产继承的利害关系，孩子们都自认为对父母的财产有绝对继承权。

对于日本的这种阻止老婚的现状，我一直觉得存在一个日本民族性、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问题。在西方国家，孩子成人以后，父母与子女的良好关

系长则可以保持两、三代。这种关系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内。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不管有没有钱，都要独立。这种处理有距离的父母和子女间关系的智慧是碰了许多钉子以后才积累形成的。我认为这是很明智的。日本的父母总不愿孩子对自己有恶感，总希望孩子们称赞自己是“慈父慈母”，结果他们总是助长着财产继承的传统。

上野：财产继承制度也应该改变。日本的遗嘱只起一半效力，家属对死者遗产可以自动保留其中一半。这样的制度还是没有的好。

樋口：我也赞成以遗嘱为根据，取消自动保留的那一部分。即使允许保留也应该大大少于一半。

上野：如果不建立起财产只属于个人而不属于家庭的观念，就不能培养出个人奋斗精神。就不可能使每一代人都能够有“让我们从头干起来吧！”的创业精神。

○老龄化社会的人际维系——上野

才华横溢的樋口惠子老师近10余年来以罕见的热情，投身于“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的妇女活动。她从南走到北，不厌其烦地宣讲面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妇女所苦恼的共同问题，苦口婆心地说服那些七嘴八舌的妇女组织起来，一起向惰性十足的政府发出倡议。如今已经组成了近800人的队伍，她

本人成为这个妇女组织的总负责人。

樋口老师针对目前老人问题的现状发明了很多载入辞典的流行语，象“笨重垃圾”、“潮湿落叶族。”她的比喻形容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让人拍掌称绝——“妇女的一生3次活在老年中(父母的老年，丈夫的老年，自己的老年)”、“托老所”、“候补委员(形容照料父母的孩子们，长子死后，次子替补；次子死后，三子替补……)。等等。

“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的诞生有着一定的背景，这便是当前负担着全部老人护理责任的40几岁、50几岁的儿媳及女儿们的状况，以及苦于缺少稳定经济收入的老龄妇女状况。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促使她们寄希望于妇女协会组织。政府所提倡的“在家养老”基本上是基于料理老人的工作都分派给家庭里的人手(主要是妇女)的考虑，所以政府是依赖不上的。妇女们只好自己创办老人护理服务网，互帮互助。妇女们面临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不能等待政府慢悠悠地制定新政策，充实社会福利设施。

虽然不能说樋口老师所领导的协会是女权主义团体，但是从妇女的立场看待老人问题的结果难免是维护女权的。樋口老师使那些在陈旧礼教下呻吟的长媳们无意中投身到女权主义的旗帜下。

“老年文学”的可能性 —— 女人从“白秋”到“玄冬”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

森瑤子。1940年生。196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器乐系，作家，1978年因小说《情事》获日本星座文学奖。

○《情事》发表之后

上野：我觉得作家的处女作是非常重要的，而大部分作家都是青春期结束以后，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素材开始动笔写作。

但是您的情况不一样，是经历过结婚、生孩子的成年人的体验以后才萌生创作的欲望。如果说人生可以分为青春、朱夏、白秋和玄冬的话，您是在朱夏的季节——成熟的季节快结束的时候才拿起笔来的。这是很少见的。

森：我是“晚播农作物”（笑）。

我写第一部小说时35岁。当时我是个生过孩子的普通家庭主妇，不如说是为了逃脱近在眼前的老年生活，我才动起笔写东西的。那时候，无论男女都只关心年轻妇女的问题。自己象是被扔到了一边儿，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十分苦恼。

当我今天——写了十几年东西以后再回头看我当时的第一部小说《情事》时，感到那是我当时发自自我的一次呐喊——“请注意我在这里，请向我这里看看！”“希望你们承认这个现实！”至于现在，我已经不象先前那么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了。现在我所看重的是我对我自己怎么看，我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所以我对“老”的恐惧感也淡薄多了。

上野：在日本，女人的价值一向和“年轻与否”联结在一起。即使除了年轻一无所长，她作为女人的价值也不会有动摇。但是无论哪个女人，总有不再被当做女人看待的那一天。我周围有些近40岁的女人，不少都陷在热恋之中。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她们都处于被承认为女人的最后年龄，她们想在自己丈夫以外的男人那里得到证实——“自己还是一个女人”、“哪怕一生只有这么一次也好。”她们无法摆脱“女人的人生与年轻是不可分”的观念。

最近我周围抱怨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行了的妇女越来越多，所以我很想听听从发表处女作以后

10余年，您的观念是怎么转变的？现在几乎还没有一位作家把自己在肉体上和心理上的这个转变过程写出来，使其他女人得到借鉴。就我所知，60多岁以上的作家中也许还有个别写过女人上了年纪的变化的，但是真实地写出中年妇女随年龄变老的各种变化的，我觉得只有森老师一人。

我并不认为您的作品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记录，但是能够那么真实地写出女人对“老”的恐惧，写出自己变化的真实体会的真是独一无二。

森：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写小说的技巧问题。但总的来说，写这种内容，自己没有切身体验是写不出来的。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非常害怕“老”。如果当初不是那么害怕，恐怕自己也就不会找到摆脱“老”的新天地。这也正如你所说的，我在青春时代什么也没有写，而在感到“老”的恐惧之后，我才开始了写作事业。

上野：刚才您说，您从关心“他人怎么看自己”转变到只关心“我怎么看我自己”，这就是说，您并没有抛弃自己作为女人的立场，相反，始终以女人的立场为核心，不停地写作了10余年……

森：对这么刨根问底的问题，我也说不明白。

你知道我曾经接受过心理分析治疗吗？

上野：听说过。

森：我在接受了心理咨询的劝告之后写了一本

书，叫《夜间摇篮·船·战场》。其中写了这样的情节——心理分析医生问我：“你觉得自己是女的，还是男的”。当时，那位为我咨询的女心理医生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我一直在纳闷。

最近有种粗俗的流行说法，说“女人是用子宫思考问题”，第一次听到这么形容女人的时候曾经非常愤愤不平。但是，使用这类粗俗语言的作品很容易赢得众多男读者，所以自己也渐渐用起来。久而久之，思维里就有了一部分男性的成份。这样自己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现实，写现实了。不是只看到正面的自己，就疯狂地写，而是从背面、侧面、正面都看到自己，才放开来写。也许可以冒昧地称这是一种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看女人的写法，总之我觉得这样更客观一些。

精神上男性化以后，生理上的女性部分特征也从35岁开始削弱。不仅体力上，精神上也随之削弱了。

上野：我最近一直注意观察那些比我年长的人，她们是怎样以肯定的态度接受自己随年龄而变化的体验的。因为这些事情与我眼下直接相关（笑）。

例如有一种称谓，叫“绝育妇女”，这是一种很残酷的说法，在一定意义上，近似于说“无用妇女”。这些妇女在今后人生中，无论是超越作为女性的人生，还是仅仅摆脱作为女性的人生，将存在

一种与之适应的文化结构。也就是说她们的个人价值不一定非与性别特征和生育能力相关不可。

日本著名女作家濑户内寂听50岁时出家为尼，如今已有10多年了。她出家那年我才20几岁，曾想：“大概人一过50岁就会有这种心境吧”。到我过了40，向50岁走的时候，才知道并非如此。如果要我下决心出家还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森：也许她当年出家时也并不容易，说不定是为了割断自己与女性的尘缘才采取了出家的强硬手段。“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为了描写这个问题有意识地使自己与“性”的问题拉开距离，这样可以造成一种对“性”的紧张状态或者精神发泄状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写作手段。

上野：这大概属于“作家的修行”吧？

森：真是如此。希望你能读读我的小说《二重奏》，读了以后就可以对“作家的修行”了解得更深了。例如，如果我计划写一部关于情人的小说，为了写好，我真的去恋爱，然后把整个过程写下来。这种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经常如此，有意图地或者故意疏忽地去做。

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我这个人，无论从作家的角度说，还是从个人的角度说，都是一个无法结交良好人际关系的女人。因为作家之所以称之为作家，就在于其天职是从一切角度把自己写出来。所以，我常常搞不清楚究竟哪一个“自己”是我真正

的自己。

○作家·评论家·读者

上野：‘我也有很多与您相似的地方。我选择的职业应当叫社会学研究者。在我的人生价值中，应该说作为“女人”的成份占了很大比重。社会学这门学问并没有解决我在价值观上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作为女人只能在与职业无关的方面努力挣扎，经过无数次失败和碰壁，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无意中竟然不战自胜，不知不觉地写了不少东西……。不过，这种方法论仍属学问上的方法论，所以，与其只限于说自己的事情，不如同时尽可能也借用些他人的经验和他人的说法，以便写出更有相对性、普遍性的东西。我大概受习惯上的研究学问方法影响太深了。

这好象正是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区别所在：作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出“自己”的经历，而评论家却是通过他人的经验，寻求更普遍的意义，然后再回到自己身上印证，采取一种迂回的工作方式。

森：我认为写小说要具备三种素质，这三种素质各占1/3，缺一不可；其一是作家的素质；其二是评论家的素质——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两种素质，那么写出来的只能是絮絮叨叨的自述体小说；其三是要有读者素质。也就是说，要写一部好小说，需要自己

身上的“作家”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过滤后，再经过“评论家”转变成别人的语言，并以普遍的意义探索过之后写给自己心里的“读者”。

上野：是的。归根结底最后着眼的还是自己。所以我觉得我走的是一条迂回的路。

森：我很理解。从作家的角度看，每个人对“老”都有自己的态度，每种态度都应无可非议。而你是社会学家，你只能允许一种普遍的态度存在。

上野：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看，一方面要尽量沟通他人的经验，同时又要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我对您从发表处女作十几年来的变化特别感兴趣。我想您今后也不会采取那种超脱女性的姿态吧？

森：和12年前相比，我依然如故——还是以一个人“女人”的感觉在写东西。同时，我现在有时还会钻到我的男主人公的心里去。这12年来，我基本上都在写女人的快乐和苦恼。当初我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曾感到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好象男人是另外的人种。而随着写作生活的积累，不停地写，寻找确切的言词，探讨真谛，亲身实验，我终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男人与女人基本上是一样的。这大致是在40岁以后。

上野：可不可以这样唐突地说——女人要想是女人，一个承认她是女人的男人的存在就是决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按刚才您所说的，男的也好，女的

也好，并不是都区别那么分明的话，不就等于说“女人要想是女人，未必要有男人的存在”吗？

森：的确是这样，不仅是男人，还有女人和孩子，无论谁需要我，或者我需要他（她），其中都有我存在的价值。那种“女人要成为女人男人是必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许和男人曾经有过令人极度失望的时期有关，对男人的极度失望激起了极大愤怒。

上野：是不是正因为过于期待了，才会有那么大的愤怒？

森：当明白了自己寄予过份的期待的时候，虽然不见得怒气顿消，但至少是能理解了。“丈夫是无法象自己的父亲那么完美，那么伟大的”，“父亲在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到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而已”。象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是我们自己当初错了，本来就不必要对他们抱以过高的期望，我们是弱者，他们也是弱者。这样一想，就会很自然地采取“彼此都需要时，就合在一起”，“老了时，不愿在一起，分开也可以”的态度了。

上野：看看我周围的妇女，也确实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不少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产生对男人的失望，甚至绝望，从而渐渐地从“自己是相对于男人来说的女人”的观念中摆脱出来，达到一种“自己就是自己”，“并不需要男人来证明”的自我肯定的境界。随着这种新观念的增长，“男人无用

论”、“女人世界”等等将出现……。

森：但是和你以前曾提到的“妇女同盟”还是有区别的。

上野：我觉得女权主义者都曾对男人抱有过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所以当失望后对男人特别感到愤怒和憎恶。她们的怒火不断积蓄，结果以反抗男权的形式爆发出来。

森：我并不排斥男人。还是男女在一起的好。——只要双方不感到不愉快。而且，我也不赞成只由妇女组成老龄问题的组织。我认为“老”是一个个人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人如果接受“孤独的现实”的问题。

○描写“老年”的新鲜手法

上野：您的新作《砂垒的家》很有意思。书中把母女关系描写得非常成功。整个矛盾围绕着母亲把自己的情人让给女儿这件事而发展。仅以上了一些年纪的女人，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让给年轻的下一代来说，这是不常有的，您把这其中复杂的男女关系和两代母女关系之间的矛盾描写得维妙维肖。

森：起初是母亲夺了女儿之爱。当然到后来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送还的问题。

我想这部小说描写的内容除上述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来看待一个人。例如当我们看一个东

西的时候，从你的角度看，可能可以看到它的正面，从我的角度看则可能只看到它的一个角——从不同角度得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从某个角度描写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描写站在这个角度看不见的那一面。我们平时看到的极可能是不全面的情况。有时候，可能突然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一面，

“怎么，这个人还会有这样一副面孔！”——我在这部小说里就想把这种情景描写出来。

如果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罕见的女强人”，那么她一定曾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被认为非常天真可爱的10岁小姑娘，其实是比什么人都难理解的大怪物——我一开始是想写这么一部小说的。但是在一年的写作期间，我越写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完全照顾到所有登场人物间的关系，最后只好缩小原来的计划。

另外，当时我正处于对男人很绝望的心境中，所以把男主角的结局写成“没有一个人肯要他”。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后悔。如果今天写这部小说，我就不会把男主角推到那样的绝境，我会想办法接受他的存在了。

上野：您所描写的优柔寡断的男主角实在太逼真了，简直就象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作品的内容——年长的女人把情人让给年轻的女人，这本身就很新奇。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年长女人知道自己已经年

老色衰，承认这个现实，自动退出舞台；另一种解释是年长女人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更高的“自我承认”，或者说有了不靠男人也可以生活下去的自信心。

森：我想两个因素都有。不过，并不是那么宽宏大量地一下子就让了，而是经过了很 多 矛 盾 斗 争。当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我的心境变为——老兵总是要退役离去的……

上野：您今后还将怎样塑造那些走向衰老的女人呢？——我对此非常兴趣。

森：按我目前的心境来说，写这个主题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但是，我想我今后还是会回过头来再写这个主题的。一浪卷过又一浪再来的时候，说不定会再一次悟出使自己或读者更信服的写法。

上野：作品出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的深浅，以及作品的可信程度。

例如法国著名女作家波伏瓦写的《老齡》就是她本人上了年纪以后的切身体会。不知森老师的小说主题今后将如何变化，如何向我们展现老年女人的内心世界。我翘首以待。

森：怎么写出美好的老年，而不是悲苦的老年——这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就连波伏瓦在《老齡》中写的老年也没有跳出“丑恶的嫉妒”，也还是丑的，而不是美的老年。所以，我又感到是不是应该允许老年人表现出

他们自己各方面的素质，而不必加以指责呢？

森：应该让他们表现。只是从心境上说，还没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

○女人也会找岁数小的情人吗？

上野：森老师的小说里还出现过年长的女主人公和年轻男子恋爱的情节。这位女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老”，但她能持超脱的态度。下面我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吉行淳之介曾写过一部小说叫《黄昏》，写的是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的恋爱故事。我们曾对书中只看重年轻女人的男人们感到愤怒。实际上，那些面临老年的中年男子不过是想假托精力旺盛的年轻女人以使自己还阳。对这个现实，既不能一笑了之，也不能用“男的嘛，总是喜欢年轻女人，这是性差别”而一言蔽之。应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女人过了中年，会怎么样呢？根据调查的数据来看，40岁以上的妇女所希望的情人的特征是：第一是比自己年长的人，第二是有社会地位的人，第三是溺爱子女的人。

森：没搞错吗？真的是喜欢溺爱子女的人吗？

上野：我也觉得好笑，但调查数据的确如此。和选丈夫的条件相同。“选溺爱子女的男人做情人”，真是怪有趣的（笑）。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女人总是脱不开对男人

的依赖，总是追求比自己年长的男人。

森：这样有安全感。

上野：是的，无论是20岁的姑娘，还是40岁的主妇，都是如此。女人真是一种不争气的生物。还有一个例子，京都有一个老龄婚姻介绍机构，叫“无限之会”，这个机构介绍成婚的事例百分之百是男长女幼，有的70多岁的男人找到50多岁的妇女。总之，男人愿找比自己年轻的女人，哪怕只年轻一点也好；女人总是愿找年长的、有地位的、有金钱的男人。

森：这真让人不愉快。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有自己满意的工作，也深有自知之明的女人就不会追求有金钱有地位的男人。人到了快老的时候，和美的而不是丑的、年轻健康的人接触，显然是一件心情愉快的事情，而且还可以使自己的自尊心从各种意义上得到满足。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是否处于能够自由选择的位置。

上野：是的，如果女人处于可以选择的位置……

森：会不会也选择比自己年轻的男人？

上野：象中年男人一样，中年女人也找年轻的情人？

森：不知会是什么情景。中年男人找的年轻女人，只要活蹦乱跳就行，头脑迟钝也没有关系。可是要我找一个20岁的男孩子做情人，我可太不情愿了。至少也要35岁以上。我不喜欢不象成年人的男

人。精神上不能平等相待的交往是无聊的；因为对中年妇女来说，男女之间不能只是身体关系。要是处于可以选择年轻情人的地位，我的选择会十分挑剔。

上野：这一类涉及中老年与青年恋爱的小说，都隐含着一种“救济愿望”，走向晚年的中老年人想从年轻异性那里得到“救济”，一些作家的作品满足了这愿望，这种“救济”意识稍一发展就能成为宗教意识。因为这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题材，所以在读者中很能引起共鸣。

森：我大概写不出这种作品。

上野：是不是对老年问题的考虑还觉得不够深？

森：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救济”，而是正处要和年轻人竞争、要追求平等的爱情等竞争的最后较量阶段。我还打算象年轻人那样东碰西撞地摸索一阵子呢……

○对成熟的老年文学的期待

上野：日本文学总是青春文学，或追忆逝去的青春的文学。就象盼望日本文化成熟起来一样，我们也希望日本文学快快成熟起来。所以我对从“朱夏将尽”的时候开始写东西的森老师寄以很大的期望，不知您将如何把自己的体验表现在今后从“白

秋”走向“玄冬”的时期。现在有写老年文学的男作家，却好象没有女作家，这真令人遗憾。

现在那些描写女人的作品，把女人写得个个都只知道恋爱，什么时候都在恋爱，而且往往正当生命力旺盛的时候，“扑嗵”一声倒地而死。日本文学中还有些人描写的老年男子是性欲狂。

森：靠写老人的性生活赚钱？太过份了。

你的话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我曾收到一位五六十岁左右的女读者的来信。信中说：“50多岁、60多岁的人也是有性生活的，希望您能看到这个现实，写写这个现实——因为我知道您的年龄，虽说可能这个要求有些无理，但还是提出这个愿望供您参考吧。”我给她回信说：“等我到了您那样的年龄，自然会对此有所体会，那时候我说不定就会写老年人的性生活了。”这个对未来的诺言，现在还无法实现，但是我自己已经有切实感受的创作欲望，我是不会放过的，一定要写在书里的。

上野：森老师一直是边亲身体验妇女的生活，边描写这些亲身经历，这从另一个意义上也说明您是忠实于现实的正直作家。

森：“忠实于现实”也许是残酷的。

上野：正直有时就是残酷的。

森：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无顾忌的正直”，不是愚蠢的正直、可爱的正直，而是经过思考的，经过创作的“正直”。也可以说是“忠实于现实的

创作”。

上野：这就是艺术。

森：如果无顾忌地写，就有可能伤人。伤害自己的丈夫，甚至所有和我有关的人。在我的小说里，很多男人都是以我丈夫为模特儿的。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如果他阅读这部作品，如果他看到书中细节，甚至男主人公说话的语气，必须让他能相信我写的不是他，必须一点不伤害他，……”

上野：难道他不真的读吗？

森：他不读我的书。只是常常从别人那里听到我写了什么东西的消息，他心里很不愉快。他的想象力极强。

上野：我写《深夜自语》（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第一次尝试用自言自语的形式漫谈身边的各种事情。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女作家曾对我说：

“你的文章功底很不够”，“一般写文章必须有‘二层’、‘三层’的文字功底，而你最多不过‘一层’、‘两层’，穿你的‘鞋子’，没几天就会‘漏底儿’的。”听了这话，我痛心地反思了很久（笑）。

因为那本书是把《朝日新闻》连载的随笔合编成册出版的，最后随意起了《深夜自语》的书名。后来才知道森老师有部小说也叫《深夜自语》，真太巧了。说不定我们在潜意识的冥冥世界里心灵在

这一点上相通了。

森：说起文字功底的“二层、三层”问题，我看无论功底的深浅都首先要有保护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的指导思想。换句话说，有些作品下笔貌似肆无忌惮，但实际谈起来却不伤害任何人，这也是一种文字功底。

总之，我还是希望写东西要把自己的所想所感忠实地传达给读者。要是我的小说被评价为“写的都是森瑶子经历过的事”，“写的就是森瑶子本人”，那一定是最成功的作品。

上野：其实读者所读到的是您经过加工的生活现实中最本质的东西。

森：不仅如此，还因为作品和她们本人的实际情况吻合，尽管我并非有意为之。所以我觉得描写具体某一对夫妇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在进行男性与女性的对话。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的读者阶层从年轻人到老年人，非常广泛，我今后的课题是如何使自己笔下的世界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

假如我的作品中有关于老人的性生活的描述，让年轻读者惊叫：“什么？——真恶心！”那就是我的失败。

上野：我既不是男的，也没到那么老的年龄，但是我还是相信老年人也有他们的性生活。

森：作为一个作家，我今后的作品一定会与自

己的生活有着极密切关连。今后10年，我可能会更加努力去写，然后，象老兵退役一样，从文坛上消失。

上野：读者们也许不会那么轻易地让您“消失”，他们还想知道您更以后的情况。

○女人从“白秋”到“玄冬”——上野

我曾以为在日本没有一个女作家在描写老年女性生活上可以和法国女作家波伏瓦的作品《老龄》媲美，如果说今后有可能出现的话，那就只能是森瑶子。我之所以这样想，是有一定原因的。森瑶子以处女作《情事》初入文坛时，已是算不上年轻的35岁，在日本这片“青春文学”的国土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她的处女作给人留下“夏日将尽”的强烈印象，反映出深知自己已经处于从“朱夏”走向“白秋”的女人如何痛切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可以说，有了森瑶子，我们有了不“年轻”的“中年”妇女也值得阅读的成熟文学。

从处女作发表已经过去10余年，森瑶子今年50岁。她30几岁时描写了30几岁人的爱情婚姻，40几岁时又描写了40几岁人的爱情婚姻。我想今后她还会在50几岁时描写50几岁人，60几岁时描写60几岁人吧。希望她能一如既往，把从“白秋”走向“玄冬”的女人那些一个又一个曲折经历维妙维肖地写出来。如果说日本有老年文学的话，也只数得

出一两位男作家的作品。希望今后能够有女作家写出女人老了以后的真实生活，写出她们的爱、她们的精力渐渐衰灭的真实过程，结果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永远是年轻妇女的单调局面。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土地。要想毫不退缩地朝向这个目标挺进，必须有面对冷酷人生的清醒和对全部人生的爱——作家森瑶子恰恰具备这两种素质。

日本的老龄社会 与美国的老龄社会 —— 老年文化 蓝本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

艾米里·艾贝尔。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副教授，妇女问题专家。曾进行对全美老人护理状况的调查。

○老人希望一个人生活

上野：艾贝尔先生是专门从事老人护理研究工作的专家，您的研究成果打破了流传在日本人中关于美国老人看护事业的神话。日本人原以为美国人大多都在社会福利设施中度过自己的老年。而根据艾贝尔先生的调查，实际上，美国在社会老人福利机构中生活的65岁以上老人只有5%（约为日本的3倍），其余95%的老人仍然在自己原有的居住地或家庭里生活。

艾贝尔：的确只有5%的65岁以上老人进入老人福利设施。不过这里有个问题——65岁这个年龄限未必妥当。不知你是否清楚老人的定义为什么从65岁开始？

这要追溯到1883年，德国最早规定老人退休金，或称老人福利年金的时候，当时以65岁为领取老人年金的起始年龄。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注意到的——即当时德国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而现在已经延长到73岁到75岁左右。所以，以65岁为老年的起点未必得当。

上野：日本情况也类似。终身雇佣制是日本式经营的显著特点。55岁退休制度从100多年前的明治时代初期就开始实施了。当时日本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以55岁为退休年龄，恰与“终身雇佣”的意义相符。由此可见，日本最早的退休制与老年福利年金制在历史上是同期开始实施的。日本政府现在也规定了“65岁以上”为老人定义的基准，而这个定义的根据却不知何在。

艾贝尔：正是这样。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健康的老人不断增多，以65岁来界定老人的定义也越来越失去意义。

上野：根据您的了解，95%的美国老人仍然在自己原来的居住地或家庭里生活，这些人都是单身生活吗？

艾贝尔：老人中的独居家庭越来越多。配偶尚

在的时候，夫妻一起生活。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再选择和孩子们一起生活。

上野：那么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艾贝尔：甚至连生病的时候也愿意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了。我看日本老人挺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的，美国老人则未必愿意。只要经济条件允许，老人倒情愿不和孩子们一起生活。

上野：我也认为如此。根据日本的统计，经济条件越好，老人与子女分居的比例越高。所以，经济上富裕的话，大概老人都不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

不过，日本人还有一个关于老人的固定观念，就是“老人要单身生活，肯定非常孤独”。而且，老人要独居的话，家属就会受到谴责。如果一个人上了年纪自己搬出去独居，那么日本人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被家庭抛弃的。

艾贝尔：我不认为老人独居就意味着被抛弃。虽然美国老人愿意一个人生活，但是孩子们经常去看望老人，而且老人都愿意孩子们住在自己的近处。

这样单身生活的老人中3/4是妇女。也就是说，男人的大多数只要妻子在世，还是夫妻一块儿生活。尽管如此，当再年老体弱一些的时候，大部分老人还是依赖于家属的帮助照料。所以，决不能说美国的家庭是抛弃老人的。

○让男子承担老人看护工作

上野：如果和子女同居初期，老人不算老，而且身体不错，还可以帮助子女照顾小孩或者做家务劳动；但若到了身体衰弱时才与子女同居，那不就成了子女的包袱了吗？

艾贝尔：美国老人即使是这种时候搬来与儿女同居，也不至于成为单纯的包袱。首先，他们有退休金，有收入来源；而且在他们搬来以前，一直与子女保持着相互援助的密切接触，类似一种一家居两地的形式。

由于美国的离婚率非常高，如果父母能够再次和女儿住在一起，那将给离婚的女儿和孩子以相当大帮助。至于年龄太老，或生病的时候，那就差不多都和子女同居了。

上野：上了年纪或生病以后搬来和儿女同住的情况，在日本也渐渐多起来。但是，这种情况的老人往往会被视为包袱。所以，如果找那些老人问题专家们咨询这个问题时，他们大致上都劝你“既然早晚要同住一起，还是从一开始就住在一起好”。

还有这样的情况——孙子长大成人以后，老人才搬来同住，那时候出现在孩子面前的老人已蹒跚，老态龙钟了，孩子都不愿接近从未照看过自己的老人，甚至于还会嫌弃他们。

日本与美国的“银发阶层”

——根据日本总理办公厅调查报告

	日本		美国	
	一直参加	有时参加	一直参加	有时参加
• 参加集体活动情况				
政治活动	1.5%	3.6%	6.0%	16.0%
宗教活动	5.0	6.1	43.1	21.2
学习活动	2.8	5.1	8.3	14.4
社交聚会	1.9	3.2	40.5	32.3
兴趣聚会	5.6	8.1	26.4	17.2
体育活动	4.1	4.8	14.9	7.7
社会福利活动	7.2	7.8	16.8	17.4
老人团体活动	11.0	10.7	20.1	12.3
• 有无亲密朋友				
有亲密朋友	66.3%		93.3%	
(只有同性朋友)	54.1		24.9	
(只有异性朋友)	1.4		1.4	
(同性、异性朋友都有)	10.8		67.0	
没有亲密朋友	33.4		6.6	
• 与子孙的关系				
最好永远在一起生活	58.0%		2.7%	
最好有时在一起吃饭或说话	33.7		65.0	
偶而说说话就可以了	5.8		30.5	
最好根本不来往	1.5		0.3	
• 同居者				
配偶者	69.5%		49.0%	
已婚儿子	40.4		0.7	
已婚女儿	10.2		2.0	
儿女的配偶者	34.8		0.8	
未婚儿女	16.0		10.6	
孙	38.0		2.3	
无同居者	6.7		39.6	
• 与分居子女见面频度				
几乎每天见面	14.4%		15.3%	
每周1次以上	19.1		35.7	
每月1~2次	33.2		18.6	
每年几次	30.0		20.6	
几乎不见面	3.3		9.6	
• 到住得最近的子女家所需时间				
10分钟以内	25.3%		34.9%	
30分钟以内	23.1		26.4	
1小时以内	26.1		9.6	
3小时以内	14.4		8.6	
3小时以上	10.8		19.7	

日本大多数中途加入子女家庭的老人是丈夫先去世、自己又生了病的老年妇女，这样的老太婆是最招人讨厌的，就象是“捣蛋鬼”，“侵略者”，打乱了一个家庭的和平生活。

艾贝尔：日本与美国老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老人要和子女同居的话，大多数不是象日本那样和儿子一家而是和女儿一家住到一起。几乎没有和儿媳同居的情况。

上野：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经济上依存丈夫的妻子怎么能把自己的父母领到家里去呢？她能有这样的决定权吗？

艾贝尔：这正是十分微妙的地方。我曾经访问过一些照料着老人的妇女。我问：“你们是怎样开始和老人同住的？”在回答中她们都提到丈夫从未反对这件事，而且有的还说，“是我丈夫让老人搬过来的”。丈夫也并非不想照料自己的双亲，不过从女方来说，当然是照料自己的父母要比照料公婆容易些。

上野：在这方面，日本女人就非常为难了——自己在经济上依存于丈夫，所以无法张口要求自己的父母搬过来住，而那些经济上有收入的妇女，虽然对丈夫有相当的发言权，但即使和父母住在一起也没有看护照料他们的时间，除非辞掉工作。而工作一辞，经济地位丧失，对丈夫的发言权也就没有了。

艾贝尔：美国的情况是有些不同。近20年来，美国的老人福利年金制度发展得相当之快，可以确保

退休老人得到相当可观的收入。所以，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来住几乎不可能造成经济上的负担。

上野：这么说，和老人同住的话，老人的收入也可以算在家庭的总收入里了。这倒不错。

艾贝尔：还有老年妇女的问题。丈夫去世以后，虽然她们不能和丈夫在世时分毫不差，但是足以使她们丰衣足食的收入一般还是有保障的。况且还有健康保险。所以我认为父母与子女同住，对子女不会成为经济负担。

上野：根据您的调查，您认为“与‘儿子照料自己父母时很容易得到妻子的帮助’的情况相反，女儿照料自己的父母时，自己的丈夫几乎不予协助”，这不就意味着“在象美国那样的以和妻子的双亲同住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只是单方面地减轻了做儿子的负担”吗？也就是说，在女儿担负着看护老人的主要责任的时候，男人们——首先是儿子，其次是女婿——儿子也好，女婿也好，都被免除了看护老人的责任。

艾贝尔：可以这么说。不过男人还要照料自己的父母。其中除了经济援助外，修理房子、开车接送、整修庭院等等，还是要男人们来干。而且当妻子病倒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由丈夫来照料。

上野：在日本，要是老年妻子病倒了，情况就很悲惨。因为一般日本男人不做家务，也不会照看病人，面对病倒的妻子，老头子会一筹莫展。到走

投无路的时候，甚至发展到杀死自己妻子的地步。这类事件时有发生。由儿媳妇来承担照料老人的责任，这当然反映了日本社会严重的男女差别，但是反过来，这又可以用来做为强调妇女们对家庭的贡献的依据。妻子们可以向丈夫们理直气壮地表示“我照料不是我的父母，是你的父母！”

艾贝尔：言之有理。日本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是就这样做的？

上野：当然。我们要求丈夫也一起来照料自己的父母。在日本社会里，除了性别差别，还有长幼之序的年龄差别。所以让男人介入看护老人的工作，比让他们照料孩子要容易一些。

艾贝尔：就女人的天性来说，母爱的自然天性决定了她们能胜任照料孩子的工作；但是照料老人则是另一个问题，必然与男女双方都有关系。

上野：最近日本的工会运动有一个内容，就是要求公司给男职工照料老人的带薪休假。

艾贝尔：“给男职工照料老人的带薪休假”？真有趣。美国也有要求“带薪育儿假”、“带薪照料老人假”的运动，但那都是针对女职工的，还没有对男职工的这种要求。这是一个好想法。

上野：这实际上是一种物极必反的文化逆反现象。我们必须把一切不利条件都转化为有利条件。

○帮助老人的各种方式

上野：听了您的介绍，对美国相当多的老人和子女同居的情况有所了解。但是还有一些老人是独居的，他们住地周围有没有帮助他们的“互助网呢”？

艾贝尔：美国有地方性退休者团体。这是一种民间的带有土地房屋开发性质的组织，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到那里去。美国很多州，如纽约州，加星弗尼亚州等等都有这种组织。老人们在那里买房子，住进去养老。所以这种团体也可以说是一种“老龄国度”。

但是，美国的老人问题中最严重的是那些上了年纪，又很贫穷的老年妇女。她们连生存下去都很困难。

上野：象这样的退休者团体中是否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

艾贝尔：是的。美国60%以上的黑人老年妇女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独居的黑人老年妇女的60%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上野：听说黑人有大家族生活的传统，老人都愿意和家里人住在一起。

艾贝尔：第一，他们从习惯上对进入地区性退休者团体不感兴趣；第二，在老人福利设施中，一

般都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那些设施的所有者一般都不欢迎少数民族老人住进去。

上野：还有这种情况吗？听说日籍美国人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叫“和平阳台”的老人设施。

艾贝尔：有些亚洲血统的美国人为了自己的今后着想，正在建设适于他们的生活习惯的老人设施。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是公众老人福利设施，是不允许有种族隔离的。

上野：听说“和平阳台”为了得到政府和公众的援助，制定了对入居者不允许有种族限制的条件。

艾贝尔：所以肯定可以得到政府机构的援助。你听说过“低收入者医疗补助”吗？这是美国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美国40%的公众老人设施是靠这笔钱建起来的。但是，这项政策的用款只限于少数贫困阶层，所以其他阶层只能致力于发展私人 and 民间合营设施。这样一来，随着私人设施越建越多，种族隔离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是很遗憾的。

上野：有一位叫威格纳的英国妇女对英国的北威尔士地区的老人状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她总结出老人得到的5种援助形式：一是家庭依存型，二是当地综合型，三是当地自给型，四是广域活动型，五是私人限制型。她用了5年时间，反复两次对现状进行上述调查，不仅总结归纳出5种援助老人形式，并且一一调查了各种形式下的

“长寿率”。

在5种形式中“长寿率”居首位的是“家庭依存型”，其次是“广域活动型”；“当地综合型”和“当地自给型”的“长寿率”相当，处第三位。最“短命”的就是将生活限制在私人活动的封闭圈子里的“私人限制型”。这也是合乎一般情理的。如果让我们来选择怎样度过老年的方式，很可能会选择“广域活动型”的互助方式，这样可以对当地邻居和自己家庭都不依赖。但看到威格纳的调查结果是在家庭里养老最长寿，这真让人有些扫兴。我对社会性老人互助网的作用的估计，要比调查结论乐观一些。

艾贝尔：在美国，目前正在实施一项老人建设计划。这项计划包括建设一批可以使老人和子孙住在一起的“分户住宅”，并使老人在那里可以有些事做；或者在一些城市里成立老人协会之类的组织。

旧金山正在实行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老人住宅计划。实施区域在旧金山的贫民区内——用低价买下那些贫民区的甚至连厨房都没有的旧旅馆，用做老人住宅。让老人集体生活，互相帮助。这个计划的组织者是一些大学的老师，是应贫民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这个地区原来是一个犯罪率极高的治安危险地区，但是自从这个住宅改建工程完成后，老人们竟可以安心地自由出入，变成了一个治

安安全全地区。

还有一些计划，例如有的“分户住宅”适于老年妇女把自己的姐妹或朋友邀来和自己同住。总之美国各地都在实施一些老人住宅计划。

上野：真遗憾，日本的住宅都特别狭小，无法让别人搬进来同住。不过偶而也有些住房宽裕的妇女，她们会和朋友谈笑时说，“等丈夫死了，我要请要好的女友们来和我同住。”实际上，是时刻盼望着丈夫早一天死呢！（笑）。

分户住宅也好，与家族同居也好，一个人独居也好，总之，最好老人对自己老年的生活方式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实行起来却有文化制约问题。例如依日本人的老年文化理想，最理想的还是和家族生活在一起，看身边的孙子长大成人。然而，现在两代间的文化鸿沟越来越大，要实现这种理想必须老人强迫年青人和自己住在一起。与其如此，倒不如和那些同龄人，同文化层次者们在一起生活，反而要好得多。

艾贝尔：美国的代际文化鸿沟也深得很。所以多数老人还是愿和自己的老年朋友在一起。

上野：不过，如果美国的老人住宅区，老人福利设施多起来，按年龄分成不同的集团，那么，今后各年龄代的集团之间的相互联系会不会很困难呢？

艾贝尔：有这样的可能。美国按年龄代建设的

住宅区一般都非常大，如果哪个成员去世了，会有其他人搬进来补充。

还有一个问题，在开始实施这种老人分户住宅工程计划阶段，一般成员都是些60来岁的人，不久他们就近80岁了。那时整个老人区就会面临全面超老龄化的问题。

○老人的自我意识

上野：我还想和您探讨一下“老人的自我意识”问题。一旦到了年老体弱不得不依存他人的时候，本人对此能不能接受呢？美国的文化理想一向是特别推崇个人独立性的。当一个人失去了独立性进入依存状态，要从思想上接受这个事实会不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呢？

艾贝尔：这的确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自觉地接受对死的认识、承认自己失去了独立性，我认为这对美国老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曾采访过一些担负老人护理工作的美国妇女，她们说为使老人们尽量感觉不到自己在接受别人的帮助简直伤透了脑筋。不少老人在极需帮助的时候也不求人。在今后的世纪里，向老人提供援助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但是，伸出援助之手的一方必须考虑到尽可能避免老人由此产生思想问题。

上野：在这方面，我也深感到日本和美国在老

年文化、价值观上的对照。日本存在着一种关于老年的文化理想，或者应该称“文化谋略”的价值观，那就是老人应为“可爱的老奶奶”。这当然是一种适于妇女的“谋略”。相形之下，男人就更难忍受自己的老年生活了。在日本，男人好不容易达到有一定实力的人生峰巅，却突然失之一旦，这种痛苦是够让老年男人们品味的。而女人们因为原来就是一种软弱的存在，所以她们的落差并不那么大，变成“可爱的老奶奶”，以求得子女们同情和照料就不那么困难了。这当然也是男女差别的产物。

艾贝尔：如果这些老年妇女再上了年纪，卧床不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怎么做“可爱的老奶奶”呢？

上野：的确是问题。根据统计资料，日本的老人死亡前平均有半年时间卧床不起。要在那样的状态下仍然保持个人尊严，可是太困难的了。

您知道日本人有一种信仰叫“珀牟利”吗？到一个叫“地藏”的小神仙面前，祈祷自己“暴死”——死得没有痛苦，又不给家属来带麻烦。老人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到寺庙里去参拜地藏，有些旅游公司甚至还专设了团体旅游客车。

不过我想说的是，在日本文化传统中，虽然有过这一类的忍受老年生活的思想方法，但是现在它们正在迅速地消失。而比如象“人老了就会返回孩童时代”，或者“变成象神仙一样”，即“老小

孩”、“老神仙”的一些想法就是为了使老年人的依存性比较容易被接受而渐渐形成的解释，这些解释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内容。

艾贝尔：这是很有趣的。我们国家也有人认为人老了就会返回孩童时代。不过这对老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老年人怎么会是孩子呢！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老年人的一种歧视。

上野：关于“年龄歧视”问题，我曾听过一位叫巴巴拉·麦克唐纳的美国妇女的演讲，当时大受震动，获益匪浅。

72岁的巴巴拉在演讲里说：“年轻人常常把我们老人都看成弱者、依存者，和孩子一样。其实我们不仅不是孩子，而且还在保持着一个人的全部尊严。”

在听她演讲之前，我还以为日本文化传统中那些“做可爱的老奶奶”之类的传统思想是帮助老人们延续生命的文化智慧，她的话给了我当头一击。

艾贝尔：她是在向我们这一代妇女发出呼吁，不要把自己仅仅看成是母亲，而首先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

上野：她主张在承认自己的弱、承认自己的依存性的同时，还要具备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我们女人尽管弱，尽管有依存性，但这不能说我们就因此而有理由必须丢掉做人的尊严。弱是事实，但这并不成其为必须从属于比自己强的人的理由。巴

巴拉的这些观点迫使我们以往的女权运动的宗旨——为了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努力做出反思。

艾贝尔：虽说在妇女运动中有这样肯承认自己弱点的代表，但是我还是认为妇女有妇女强的一面。妇女有体贴照顾老弱病残者的经验，还有生儿育女的经验，通过这些经验，通过自己体内的变化，她们最能理解上了年龄是怎么一回事。

○衰老中的“依存”与“独立”

上野：我有个问题还是搞不明白——一方面是维护个人的独立与尊严的愿望，一方面又要接受依存性的现实和使自己能继续活下去的“文化传统”，怎么样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呢？

艾贝尔：在美国，独立是被绝对肯定的，所以，问题多出在老人不实际地一味坚持独立的同时，出现痴呆或瘫痪的情况。老人们怎样接受这样的现实——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日本的文化传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上野：在日本的民俗习惯中，把60岁称为“还历”，即“返回孩子的起始日”。所以60岁一过，老人就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了。

艾贝尔：现在美国研究老年学的科学家都在探求老人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所在。老年也是人生中颇有意义的阶段。老年阶段一定存在某种特殊的意

义，人类必须找到发挥这部分意义以渡过老年阶段的方法。

上野：我以为日本的文化传统曾赋予老年一定的意义，但是它现在正在崩溃。失去了文化传统，我们日本人就好像要被赤条条地送进老年阶段。

艾贝尔：在我们美国社会，实际上是回避“死”和“老年”之类的课题的，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由于社会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立，所以当一个人突然必须正视自己的老年的时候，他就象是突然被社会抛弃了一样。他还不知道怎样面对老年的实现，就被推到“老年”面前，不得不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根据我的调查，这种状态的形成当然绝不是因为美国的家庭都抛弃了老人，问题的症结在于老人本身如何能够接受必要的援助。

美国那些处于照料老人位置的妇女，很多人都说要让自己年老的父母在不能自立的时候主动要求她们帮助“实在是件难极了的事情”。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了，已经不能不接受别人的帮助了。为了不让他们感到失望，援助者都对自己的援助方式特别谨慎小心。

上野：这不是又要出现新难题吗？一面实际上在接受帮助，另一面又在否定这个事实。

艾贝尔：是这样。所以现在子女们在帮助父母的时候都不想得到父母的感谢。

上野：在日本，因为都认为儿媳妇怎么照顾公

婆都是理所应当，所以也从不想得到公婆的感激。那些曾经对儿媳颐指气使的人，即使老了，也不愿承认自己已经衰弱到不得不处于接受儿媳帮助的地位了。

艾贝尔：我所接触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女儿而不是儿媳在照顾老人，女儿都愿意帮助自己的父母，但是父母却不愿接受帮助。或者是犹豫不决，或者是让女儿难堪。总之是女儿处于一种很为难的位置。一般女儿们都认为，如果父母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已经处于必须接受帮助的地步，那么情况就更糟，所以她们都尽可能地做到不让父母明白这一点。女儿们尝尽了其中酸苦。既要帮助老人，又要注意不要让老人意识到自己在接受帮助，这给照顾者造成了不小的心理负担。

上野：在美国有没有反对“老年社会差别”的全面性老年人组织？

艾贝尔：一直都有。在华盛顿有这类组织的总部，经常在国会接待大厅里举行一些活动。还有叫“灰豹”的过激组织。还有个组织叫OWL，就是猫头鹰的意思。现在60来岁的老人和过去我们印象中的60岁老人可不是一回事，他们健康得很，精力充沛得很，他们为捍卫自己的权利，开展“不要把我们当老人”的运动。

上野：但是象“灰豹”组织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只能是用年轻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否定自己已经

进入老年的事实，而起不了什么其他作用。我觉得，完全不必死抱住年轻人的标准不放，也可以提出老人应该有老人自己应有的地位的主张。

艾贝尔：有一点是必须注意到的——就是“老人的依存性”之中，多多少少有一点社会制造出来的成分。对此很难离开生物学的事实进行论述。

例如，当老人退休以后，如果还有合适的就业机会，老人在经济上的依存性就不存在了。因为不能使老人有适当的就业机会，所以造成许多严重问题。很多人虽然年龄老了，但实际上身体还很健康。对这些老人来说，投身于反对不给老人为社会发挥作用的场所的社会体制的活动，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老年文化蓝本——上野

当听说美国也存在老人护理问题，我既感到吃惊，又感到新鲜。艾米里·艾贝尔先生是加里弗尼亚大学路易安斯分校社会系副教授。他通过采访大量照料老人的美国妇女，写了本题为《仅有爱是不够的》的书，深刻揭示了美国的老人问题现状。

在日本人印象中曾有个“神话”——“美国老人都生活在老人设施里”，“美国老人都是自立的，总不依赖儿女”……。艾贝尔用调查到的事实打破了这个“神话”——“美国65岁以上老人的

95%在自己家里居住”，“在他们的生活需要照料的时候，主要是女儿来帮助他们”。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照顾老人的都是妇女，所不同的是美国靠女儿，而日本靠儿媳。

从美国老人问题的思索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个人奋斗主义的陷阱。在把一个人的独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社会里，很难接受在自己老了之后，已经不再是“独立性的存在”而成了“依存性的存在”的事实。由于无视这一事实，当现实中到了不得不接受他人援助的状态时就否认现实。照料父母的女儿们为了不使自己父母感到失望想出种种策略，真可谓使尽了心机，却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感激，她们在心理上承受的压力越积越多。独立和自尊，似乎成了老年人多余的东西。

日本是个相反的写照。日本文化勾画出的老人形象是个粘粘糊糊依存他人的“可爱的老奶奶”。如果深入思索的话，这种说法也许出于人生经验的总结，但是也反映出对老人的不敬。

在今后的老龄化社会里，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失去为人的尊严，又能够接受衰老的事实呢？

独身者的老年 ——独身者的终 生事业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

吉广纪代子。1940年生，日本女子大学文学系毕业。新闻记者。

○无子女的老年

上野：我是前年满40岁的，但是心情上已经觉得是进入老年了。您曾写过《非婚时代》，后来又写了《男人的非婚时代》，您对独身主义看来很有兴趣，您自己就是一位独身者吧？

吉广：是的。

上野：我是研究社会学的，一直在研究我以外的人。我之所以开始具体地关心老年问题，和自己的生理状况有一定关系。我想，无论如何10年前我是无法对老年问题感兴趣的。那个时候我正聚精会神地考虑着一个女人的普遍问题——如何生儿育女

的问题——尽管我自己没有孩子。10年间同龄妇女的孩子已经都长大了，眼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不是自己父母的护理问题，就是自己本身的老年问题。

那些讨论妇女问题的团体，无论哪一个都处于“一年长一岁”的状况，都在“老龄化”。有些团体甚至正在进行自我批评，“这样下去，我们这一代的妇女思想就无法传到下一代，也出不了下一代的妇女领袖了。”我曾向她们建议过是不是应该考虑象“同龄会”之类的新活动方式——人毕竟是要和周围的好友们一起变老的，同龄人常常抱有同样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同龄会”中开展讨论不是很好吗？因为青年人青年人特有的问题，要想解决就只有靠他们自己，所以我已经不研究他们的问题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明确的研究课题就摆到了面前——没有子女的老人如何度过老年？在这之前，我所考虑的老人问题都是以整个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在今天多样化的世界上，那些没有家庭的人们怎样度过老年？通过思考这个问题，还可从反面发现现代家庭的可怕的一面。

吉广：只谈谈独身者的问题也好，否则，一谈到家庭，又要涉及到“小家庭模式的崩溃期正在来临”的问题了。日本的家庭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变是很突出的。50年代以4人小家庭为主，即父母加两

个孩子。30年后的今天，变成孩子另立炉灶，夫妇两人生活。

上野：是这样。

吉广：最近有一种倾向，有没有孩子已经似乎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我感到不仅是我们这样独身妇女的问题，那些原来两代的家庭在儿女搬出去以后，也同样面临夫妇两人过没有子女的生活的问题。

象我这样从未结过婚的独身者老年以后是非常自由的。这所谓的“自由”，一方面指家庭牵挂意义上的自由；另一方面，还因为一直是独身，为了生活就必须工作，所以付出了额外多的时间，精力和体力，到了60岁、65岁以后，可以退休，有了不必工作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问题虽然和年轻人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是不是可以间接地通过我们的亲身体会，把我们的感受留给年轻一代象我们这样没有孩子、没生过孩子、或者失去了孩子的女人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老年姿态？在我们这一代以前，在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代妇女，她们也对此做过各种各样的摸索，而现在是该军国主义时代的下一代，该我们去摸索了。

上野：言之有理。过去，从未结过婚、从未生过孩子的女人在家庭是“食客”，那些还没出嫁就死了未婚夫，或出了嫁又回娘家的女人，在家庭里

只能站墙角，吃剩饭，凄凄惨惨地了却一生。而如今，这样的女人从家庭里走出来，开始组织起自己的团体。她们通过这样那样的亲身生活实践，在日本文化的历史上书写着前所未有的一页。

○日本第一代妇女独身者——战争未亡人

上野：日本第一代独身者的局限性，或者说历史的不幸在于她们仅仅是因为战争造成了男性人口锐减，才不得已放弃了结婚的念头，而她们的基本观念还是和社会认识一致认为女人是理应结婚的。所以可以说她们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才不得已成了独身者的，她们的内在价值观和非独身者并没什么两样。当然，她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做过这样或那样的尝试性努力，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单个人的孤立的奋斗。

和上一代相比，如今新一代独身者们终于产生了肯定自己的新价值观，并且开始着前所未有的新尝试。

吉广：我觉得第一代独身者也还是有一定的结婚机会的，只是对那些被介绍给自己的“对象”太不中意才没有结婚，所以还是因为有独立心才可能一直坚持终生独身的。

两三年前，我曾访问过一位那个时代坚持过来的人，她说自己60岁以后，给她介绍对象的人多

极了。

上野：有趣。60岁后是第二个结婚适龄期。

吉广：实际上男人要的不过是护理员，或者说生活帮手。50岁的独身者一般在心里都暗藏着一把“想尝试一次结婚”的熄不灭的火。“找个离婚的”或者“找个丧偶的”？但是过了60岁以后，自己的老年生活摆在面前，结婚一类的劝告就再也不能引起兴致了。

第一代独身者们也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这使我们这一代在很多方面感到轻松多了。

上野：这就象自行车比赛中骑在第二位的选手一样。骑在最前面的最顶风，最费劲，而第二位的选手就可以躲在第一位身后不受迎面风了，轻松多了。

吉广：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比起来，在能够持续就业方面有很大改善。我1963年就业，当时正值经济高度发展期开始不久，工资非常低。3年后，工资直线上升。而且，一旦结婚，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还可以辞职一段后再就业。比起即使有能力也只能做辅助性劳动的上一代的情况来有很大不同，我们工作的范围很广，而且每个人都有钱。

上野：从社会整体来说，上一代的社会也没有能力为独身妇女提供持续工作的场所。

吉广纪代子的一代遇到的是战后复兴已经达到

相当程度的时代，全社会都进入安定化和保守化的时期。当时有一种“女学生亡国论”的观点曾引起轰动，其中的论点之一就是“女孩子早晚要回到家庭里，没必要对她们进行学校教育”。您大概就是在那时候毕业的吧？当时您的同学中是不是大多数后来都回到了家庭？

吉广：是的。在日本女子大学的同班同学中，有一半以上就了业，但是一年以后，其中一多半又都辞去了工作。

上野：是因为结婚吗？

吉广：未必。就业本身还有学习社会的一层意义，所以即使很快就要结婚，也要稍许做些工作。辞去工作以后，有的很快结婚；有的在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期间做些家务事。总之，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一直坚持工作到今天的同学屈指可数。

上野：我想也是如此。您那时的结婚适龄期比现在要早些，是多少岁？

吉广：二十四五岁吧。在我快30岁的时候，有几个朋友曾问我：“你难道还打算坚持独身吗？”我说：“不错。”她们说：“那我就离婚和你作伴吧。”所以还有些人是后来进入独身者队伍的。

上野：这么说，象您这样的独身者的生活形象起了鼓励家庭中的妇女选择摆脱家庭的道路的作用。

吉广：什么？“鼓励作用”？（笑）

上野：一个人面前要是没有另一种可选择的形式，就无法丢开自己现有的形式，因为离开现有形式就不知道该向何处去了。如果有“那个人虽然独身，不是也活得很好吗？”一类的认识，那么走出现有的形式就会变得容易多了。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吉广：从这个意义来说，上一代独身者们的存在也给了我的选择以很大影响。

○弱点很大的独身女人

上野：正如您也说过的，如今是否和儿女共度老年的老人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现在我们讨论没有子女的老年问题，那些有家庭的人是不是也要凑过来，“我们的孩子也都不在身边，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呀（笑）。

吉广：是的，就是那些只有一两个孩子的父母，特别是只有一个孩子的。

上野：现在是一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的时代，孩子独立后一走，家家都象没子女一样。听到一个个为老年护理问题担忧的诉说，不免想到：“为什么当初不生上5个、6个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连那些有家庭生活经历的同龄人也都感到了盼望和儿女们一起在家里度过老年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吉广：是的。

上野：由此看来，那些比较早就开始切实地考虑独身者、无子女者的老年问题的人，他们的实践经验很可能给那些今后无论有还是没有家庭的人提供一个可选择的老年生活模式。

吉广：现在所描绘的超老龄化社会的情景是根据农村地区已经看得到的高龄化状况推测的。

上野：整个地区都是上年纪的人吗？

吉广：是的。报纸上偶然也可以见到，例如一个儿媳妇进入老年之前必须要照料三位老人。这就是说，一个女人差不多半辈子都在服侍老人。以她后来的话说：“老人长生一年，就等于自己减寿一年。”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要想把自己的老年托付给儿女，就会想到“生上4个5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孝顺孩子就行”。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只想要孩子照顾自己，这很可能无论给自己，还是给孩子都带来不幸。

上野：从现在的繁重负担来看，很可能是双双都躺倒。

吉广：这是一个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的问题，其余的问题都是次要的。现在还可以说是父子和睦的时代，但是以后可能会疲倦，说不定会同时病倒。我现在说的话，能够被比较广泛的接受、领悟，恐怕要到10年以后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更早一些，更具体一些认识这个问题。

上野：虽然家庭的形式从外表上并未改变，但是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前不久我读了一篇记述为父亲送终前后的情景的文章。作者的父亲患了癌症而入院抢救。因为担心父亲临死前独自一人，儿女们商议了一个轮流在医院陪床的值班表，这个值班表一次也没有变更地忠实地执行了半年，父亲终于没有孤零零一人离开人世。作者写道“能这样毫无遗憾地送走父亲，真感到欣慰。”但是读到文章的最后，我才有些释疑——原来作者是兄弟姐妹5人！一个人的负担只有1/5。若是独生子女，每日每夜都在医院陪床，那不把子女的生活也搞得七零八碎才怪呢！

您的书《非婚时代》对和您处于同样状况的人们寄与了深切的关心，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根据您的调查，这些人老年以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吉广：我进行关于《非婚时代》的社会调查起始于1984年，距今已经6年了。那个时候民间公寓模式正流行，很多人表示希望自己今后能住进带有医疗设施的别墅式公寓住宅。

上野：即配备有老人护理服务的出租公寓？

吉广：是的。那时候，被采访者差不多总是整日工作缠身，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考虑那些问题。只有四、五个独身女人表示希望和几位独身女人共同住进一套大点的房子一起生活。

我还问过“你将怎样对待自己的父母”。那些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很多都说自己在到老年以前就考虑一些关于老年的切实问题了。

上野：独身者是有很大弱点的。从前普遍认为长男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是家庭里主要的晚辈。而如今妇女都强硬起来了，她们未必遵从长媳照看父母理所应当的老传统。于是，照看老人的责任不断地被推来推去，一直被推到最软弱的人——家庭里的最后一位成员，独身女儿身上。独身女儿在家里处于最容易受害的地位。

吉广：男人大都是躲到一边去。男独身者更是以自己独身为理由溜到别处去。

上野：现在是女儿时代，而不是儿子时代了。例如现在多起来的“倒插门现象”，就是不和丈夫父母同居，而是和妻子父母同居。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得出“这是对妇女有很大好处的家庭方式”，或者“是妇女地位上升了的结果”之类的结论。从父母的角度看，对自己老年的照料，与其从儿子那里要钱，不如从女儿那里得到实惠的帮助和照顾更有价值和意义。所以父母改变了态度，从“钱”转向了“帮手”。我认为这完完全全是父母利己主义的考虑。是从索取儿子转为索取女儿，是变换方式加重妇女的负担。所以当很多人听到说“还是生女儿的好”的话时，都耸肩摇头，连连表示不以为然。

○超越血缘关系的互助组织

吉广：我认为为了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子女们的思想意识也必须进行一场变革。我有兄弟姐妹5人，大学4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当时母亲51岁，家里有两幢房子。大哥因为继承家业，全家住在后面的一幢房子里，前面的一幢大些的房子是父母及我们弟妹回去时住。父亲死后，母亲说：“我想一个人住后面那幢房子。”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放心不下，也许是害怕舆论，大哥表示“希望和母亲住在一起”。而我们4个弟妹当时还没有成熟到足以理解母亲心情的程度，所以也都一起劝说母亲：“还是住在一起好”。

上野：这么说母亲的意愿终于被压制下去，没能实现？

吉广：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母亲的真正希望是什么。

从此以后近30年来，母亲差不多每隔四、五年就要重复一次“我还是想一个人过过试试”的话。我一直也没有意识到自从父亲去世那天起，母亲就真心想一个人过。如今我十分后悔，倘若早点能理解母亲，就可以说服兄弟姐妹们帮她实现心愿。

所以，从我自己的母亲身上也可以看到，就

是生有5个儿女的老人也有人愿意一个人度过晚年。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感到儿女们对父母要求“一个人过”的愿望最好不要武断地下结论——不要认为“一个人生活不寂寞吗”就不听老人的意见。还是应该花点时间听听老人说明自己的全部想法。

上野：日本人有种固定观念，认为怎么也是“和家里人在一起最幸福”，实际上已经不尽如此了。在日本谁想一个人生活，立即就会被“孤独”之类的短浅观念压在身上。但是在美国和欧洲，一个人悠然自得地生活着的单身老人比比皆是。

还有一家只有母亲和一个孩子的情况。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母亲因为脑血栓而病倒了，全身瘫痪，失去语言功能。经抢救虽然恢复了意识，但只能表示“是”或“不是”。这位母亲唯一的女儿把她送人一个可以24小时给予治疗的医院。但是如何照料自己的母亲呢？一开始她就想到，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自己也不能辞退工作，那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情景出现了——她通过朋友的帮助，把朋友们的女儿们请来帮忙。她知道要她们完全义务服务恐怕太难为她们了，就想出了按时间付少量报酬的办法。就这样，她竟然请到了30个女孩子轮班负责看护自己的母亲。

这个轮班看护组织非常有秩序，床头上挂着看护日记，每个人当班时都做上记录再传给下一班。做了什么处置，有什么异常都写在上面。后来，手

头上稍有些空闲的家庭主妇、失业妇女，甚至对学校失望的逃学女孩子，都通过“你传我，我传你”的途径得到信息，前来请求参加看护轮班。这些完全没有护理病人经验的女孩子们竟然能和躺在那里不能说话的老奶奶进行各种交流。她们从老奶奶那里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从照料别人的过程中，学会怎样更加珍惜生命。后来那位逃学的女孩子有很大的转变。

吉广：这是很可能的。

上野：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所有的人都从看护老人中得到启发和感动。有一本书专门记录了这件真实的事情，叫《安江奶奶和30位好朋友》。这样一种轮班看护的组织是超越血缘关系的互助组织。如果仅靠血缘关系，恐怕就不会出现这么感人的情景了。这对一母一子的家庭来说，是被绝境逼出来的突破。没有受到绝境逼迫的人，总想抱着老办法不放。而那些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就会绞尽脑汁寻找出突破性的解救办法。所以退一步说，似乎是困难越大越有希望。

○住房与经济保障

上野：下面谈谈我们自己的老年吧。关于老年的互助组织，包括住房问题，现在有很多种设想。您也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即有看护服务的租用公

寓。这基本上是一个靠钱才能实现的设想。所以今后必须尽早考虑储备一些钱财。在日本要想能终生居住，房租总得3000万日元左右。要再便宜就得到非常偏僻的地方去了。

吉广：是的，只有到文化落后的地方去（笑）。

上野：此外，还有要建立一个用金钱买不到的人际关系网。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设想呢？

吉广：我有些亲密的老朋友，甚至比亲戚还密切。我们都是工作多年的，所以对老年的经济问题并不忧虑。我们常在一起谈论一个打算在我们60~65岁期间实现的设想——买下一点土地，建上一户挨一户的住宅；也可以每家之间有点距离，但不能妨碍日常间的交往，可以象公寓似的形式，朋友们少则两人，多则4人，在一起生活，在可能的范围内相互照应。不过，有一个问题——如果都在同一年龄同一时期病倒的话，那就惨了。所以我们也议论过是不是应该让年纪稍轻的人也搬来一块儿住。

上野：我可以说不和您年龄相差不多，但并不感到特别不安。因为老了以后人身体状况的差别比任何时期都大，不太可能会发生同龄人同时病倒的情况。这就象喝醉酒的人互相照应着走回家里去一样，谁最先醉倒谁最痛快（笑）。

吉广：醉倒了第二天还会醒来，老人病倒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是很严峻的事情。

上野：所以希望不同年龄人生活在一起也很自

然，并不能说“同龄人一起生活有后顾之忧”的想法是短浅的。但是说得绝对一些的话，如果今后都是不同年龄层的人住在一起，那么等待着年龄小的人的只能是糟糕的后果。当然靠年轻一点的人照顾年老一点的人，一代代传递下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同年龄层的人相互照应，健康者照料病倒者，大家轮流相互帮助，不是更好吗？

吉广：但是，说到底是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要盖房子，等我们死了，房子留给谁呢——必须转让给什么人。到那个时候，要买房子肯定比我们现在难得多，所以如果我们说“将来把房子留给你”，那么“为了得到房子”至少可以成为她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一多半动力。

上野：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肯为了房子而和老人住在一起吗？

吉广：也不能说是“年轻人”了，我们70岁的时候，她们该60岁了。

上野：就具体的设施方案来说，一种是类似集体住宅的建筑；再一种是住宅区，我把它叫作“步行5分钟住宅圈”——相互间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5分钟以内就可以赶到了；最后就是老人福利院式的带有综合性老人服务设施的集体住宅，这当然是针对土地的昂贵而设想出的占地不多的方案。大致上有这么3种方案吧。

吉广：是的。我的一位朋友们现在希望一户和

一户之间能有一点距离。我倒不在乎，住在一户也行，怎么都行。她希望哪怕只有一墙之隔，或者象公寓住宅，不住同一层，而分住不同层。

上野：我做了一个叫“娜拉方舟”的计划。

“娜拉”出自《玩偶之家》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因为我早有老了以后住到海外去的愿望，如果能组成一个链状的海外老人居住区网，是非常理想的。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若有这样的老人住宅地，一年可以有半年，冬天或夏天轮流住。所以，我想尽量和那些集体老人住宅的邻居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于可以时来时去地在各处住住。

吉广：而且，就日本现在的经济水平来说，在外国生活显然要实惠多了。

上野：只要日元一直不跌落。此外还有一个继承问题，这也是我认真考虑过的问题。看来有关继承的法律存在很严重的缺陷。我有侄儿。嫂子常跟我说：“千鹤子，多多地挣钱吧，将来好给我们家的孩子多留一些。”根据法律，我如果没孩子，钱就自动落入兄弟或兄弟的孩子手里了（笑）。

吉广：你的钱要是太多的话，说不定还要算计你呢（笑）。

上野：根据日本家庭主义的法律，财产的自动继承权只限于有血缘关系的人。这就不好办了，这就是说我们投资的老人住宅区无法连续办下去。

我做了多方面考察，要想在现今法律范围内将

财产留给老人集体住宅，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共同组成法人机构。也就是说，要创办一个超越年代、超越个人寿命的保全财产的共同组织。每个人，包括总经理，从这个法人组织得到的收入都很少，其目的在于集体将财产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象日本这样遗产继承的限制极其严格的国家，有钱人照样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保全着自己的财产。那些资本家、法人们巧妙地利用法人组织的权利保护着自己的巨财，而我们老百姓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收入却被分了又分。所以我们的计划无论落实为什么具体方案，都应该办成可以团体继承全部资产的财团法人的机构（笑）。

吉广：这就可以让政府认可了。

上野：或者要求修改法律。如果我们能够拿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么要求加入老人住宅投资的人一定会多起来。实际上，听了我们叫它“娜拉方舟”的计划，那些有孩子的也会凑过来的：“让我们也参加吧！”“现在的孩子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老了和你独身者没什么两样……”但是我基本上不相信那些有孩子的妇女。她们到关键时刻会当叛徒（笑）。即便数目不大的一笔钱，如果让她们选择是留给自己的朋友，还是留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们肯定跑到孩子那边去。

吉广：一点没错。这种可能性很大。

上野：所以要加入这个团体，就等于向这个团

体的法人机构交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就不能被接受为成员。

吉广：这是一种考验。

上野：当然，非常严峻的考验，对家庭意识的测验。这样才能以共同的志向为基础组成一个集体，并能使这个集体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也许是一种理想主义。归根结底，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年轻些的人的援助，使自己能安然走向死亡的一厢情愿的方法。

○独身者与“墓碑”

上野：您给我的今天的谈话提纲中，最后一项是“独身者连自己死后的葬礼和其他后事都非自己考虑不可，所以没有功夫象别的老人那样发呆”

（笑）。说得太对了。独身者不在生前想好后事是不行的。他们总得托人为他们清理死后的帐目和遗物。还有“墓”的问题。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吉广：我还没拿定主意。我的故乡有几代相传的墓地，已经安放了很多人的骨灰。是不是在那里找一个小角落存放在我的骨灰啊，还是参加独身女人的“女碑会”组织，把骨灰存到那里去？还有个办法是在我活着的时候，买一块自己用的墓地，做好墓碑，并预先付笔费用请人日后长期为我扫墓，等我死后将骨灰移进墓里……

上野：我也有不少梦想。我以前喂过一只心爱的小鸟和一只心爱的狗。它们死后，我都把它们埋在京都的大文字山了。您知道这个山上有一个用烧尽的植物带组成的“大”字吧。还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点火烧草保持“大”字的典礼。过去，我们在点火这一天常常开玩笑说：“谁能跑到那个‘大’字的右肩上去点一把火，那就把‘大’变成‘犬’了，那该多有趣啊！”但是谁也没有办到。我把我的小鸟和小狗就埋在了这个“犬”的“、”的地方。我跟我的伙伴们说：“求求你们了，等我死了，把我也埋在那个地方！”（笑）

吉广：和小鸟和小狗一块？

上野：但是当我说完以后，伙伴说：“在那种地方挖个坑埋你？！——开玩笑。”

吉广：无论人活着的时候怎么努力，也不能做到死了以后给自己装棺木。那时候只能随活人的意思去了。有的人要求自己的葬礼绝对要“如何如何”办，可也有的人表示“不要给我举行葬礼”。但是要求“如何办”的，生者未必那样去办；而要求“不要办”的，说不定生者却觉得不办就过意不去。所以这是一件无法预知的事情。今后10年左右，只要活着，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的意见确定下来，委托给后人，至于能不能实现，也就任它去了。

不过，10年间可供选择的范围扩大多了。

上野：是吗？虽说可供选择的方式多了，但是以葬礼的形式来说，还是只限于佛教葬礼、基督教葬礼等等很少几种。相对葬礼来说，倒是结婚典礼的形式变得多样化，丰富多彩多了。

吉广：我想我老了以后如果有时间，自己给自己凿石琢字，刻墓碑。

上野：我觉得要给世上留下什么永远消逝不了的东西，就象是给后人套上一个重负似的；日本人的习惯是摆死者的牌位，美国人的习惯是摆死者的照片。我觉得美国人的习惯比日本人的习惯好多了。他们总是把这些照片放在自己身边，或者挂在墙上。

但是这种挂家族照片的内容也会随时代而发生些微变化。比如，假若我保存祖母的照片，我的孩子就可能不继续保存下去了。一代一代都会稍有变化，记忆的范围不断变动，也就是能记住两、三代人吧。对记不住的人不留存照片更是不言而喻了。

我有一个设想，修建独身妇女集体住宅时可以在里面修一间大厅，把它设计得可以用来举行葬礼，并在墙上悬挂集体住宅的已故住户照片。

吉广：也可以是肖像画。象英国贵族或有钱人家里悬挂的家族成员油画像……

上野：漫画像也可以。看见这些画像就会引出对死者的一些回忆来，“啊，就是他呀！”一个人要保存全部记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集体来保存记

忆，就是记忆内容一点点变少也会相对保存得长久一些。

○独身者的终生事业——上野

最近，日本的独身男女也多起来了。独身者必须只靠自己的双手来处理自己的生和死。特别是生活在只考虑和家族共度老年的日本文化中，要想在家庭以外度过老年就更难了。但是，尽管有一两个孩子，或已搬出去住，或不幸先父母而早逝，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样一来，有孩子的父母和没有孩子的独身者，他们的老年生活也就区别不大了。正如吉广纪代子所说，由于独身者比那些有家庭的人更早地意识到老年生活要靠自己，所以可以以自己的实践给老龄化社会做出一种示范。

吉广纪代子写了《非婚时代》一书。一时间她的书名成了日本的流行语。她认为自己是一位坚定的非婚者，自己的独身者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终生事业是分不开的。象吉广这样的非婚者不久就要老了，并要迎接死亡。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现在将自己终生从事的研究目标投向了独身者的“老”、“死”，以及包括葬礼、墓碑、后事在内的“死后”。

关于独身者的老年问题考虑最早的要属“独身妇女联盟”。参加者多是因为战争中失去过多同龄

男子而不得不独身的妇女。她们一生中勤勤恳恳地工作，辛辛苦苦地照看父母，如今都已年事较高，因为死后没人为自己扫墓，她们联合修建了墓碑，即京都的“女碑”。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将骨灰安放那里，由寺院帮助扫墓，但是仅限于女人。那些独身男人们能不能也联合起来修一座“男碑”呢？至少现在还没有。男独身者和女独身者之间似乎还有不小的差距。

老年婚姻的积极 意义——老年婚 姻革命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

和多田峰一。1926年生。日本日向市老人福利中心主任，老人问题社会活动家。

○得到公众理解的老年婚姻介绍所

上野：您正主办着一个叫“无限之会”的老年婚姻介绍所，对吗？这不仅是一个市民团体，也可以说是“银发产业”，现在这种组织、团体在不断增加吗？

和多田：是的。我们自己称之为“银发事业”。不仅我们“无限之会”，其他接受老人申请，并为男女老人们组织约会、促成老人婚姻的事业或产业现在也都发展得很快。

上野：和以前相比，现在对老人婚姻的社会态度改变了吗？

和多田：有相当大变化。以前，所有老人对老年婚姻都有三个共同的顾虑：“都一把年纪了”，“太丢人了”，“现在还想那个？！”。现在听不到有人这样说了。社会上也都能给以理解了。

这也是电视、报纸不断进行宣传教育的结果。另外，就是80年代以后孩子们照看父母的比率急剧下降。所以老人本人、家里人都认识到：“再婚是一件好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不去努力我们也无能为力”——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多。

上野：真有意思。这就是说，还不是因为对老年婚姻的理解有了很大进步，而主要是因为孩子负担不了长期照料老人的重担。

和多田：这是原因之一，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对老父老母的感情生活的认识。

当然，还有一些会必然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财产和性生活问题。

上野：和财产有关的背景大致有两方面，一个是今天的老人和以前相比都成了“小财主”，另一个是尽量掌握自己的钱财直到最后也不撒手的老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担心过早地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孩子会使自己失去发言权。

和多田：生前就进行财产移交的，以前也不很多。我倒是觉得老人们变得明白了，头脑清醒了，更多地认识到了“从前是我送你上学，又给你媳娶

妇，最后连房子都给你买了……，所以现在剩下来的钱该我自己享用了。”

上野：按照旧的观念，给孩子花这些钱是把孩子当成一笔“存款”，所以存得越多越安心。但是如今孩子变了，都成了个人主义者，无须报答老人养育之恩，不管照料老人。所以老人们明白了孩子是指望不上的，对“存款”发生了很大的疑问和不信任。

和多田：是的。以前的家庭制度，以父母养育子女，子女照料父母为天然义务。而如今已经大不一样了——子女们都觉得好象是靠自己一个人长大成人的，“父亲是父亲，我是我，”所以父母都必须为自己的后半生做好打算。现在这个时代，有些私欲过于氾滥，所以不得不需要有一些“自我防卫”意识。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寿命问题。过去是50岁，最多60岁就道“永别了”，所以有没有钱也是“双目一阖，一了百了”，留下的账目和钱财随儿女去处理。但是今后可不然，还要多活上20年30年。健康长寿的老人一年比一年多，他们需要花钱，出于自己的兴趣花钱。总之，老人们的生活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了。

上野：现在的时代是年轻人生活积极性高，上年纪的人生活积极性也高。

和多田：现在还有一批“老人预备军”，他们

正在迅速地增援“老人部队”，老人问题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切身问题，所以对此也极为关心。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增援“老人预备军”的更年轻的一代人，但是他们现在的想法却相当痛快，“父亲的事情是父亲的事”，“我的事情是我的事”。俨然一副互不相干的面孔。

上野：这批“预备军的预备军”大致是多少岁数的一代？

和多田：因人而异。但大致是40岁以下吧。

上野：这正是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批“高峰代”人。但是这是为什么呢？从子女的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供父母享用的“存款”，是因为子女的数量都很少，承担不起照料父母的沉重负担。我认为用不了多久，围绕着父母的老年财产肯定会有一场两代之争。老人所拥有的、用于自己老年生活的资金很有限，对自己的这笔钱，是“自己的东西就属于自己，在有生之年全花光”，还是“把钱先给孩子用，这样他们就会报答我们，照料我们”？若从子女的角度说，眼盯着父母钱袋的大有人在。

我看现在一心一意只想到孩子，供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车，又为孩子存钱结婚，一切都为孩子安排得妥妥当当，反过来却对孩子说：“我不要求你将来照料我的老年”，这样的老人——有相当经济能力的老人恐怕没有多少。

和多田：很少。

上野：大部分只能是偏重一方，或者偏重孩子，或者偏重自己。这样一来矛盾就难以避免了。所以我推测，随着老人观念的转变，这种围绕老人小笔资产的父子的激烈“攻防战”，今后将在市民阶层里频频爆发。

和多田：我想今天所说的“老人预备军”和“预备军的预备军”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当“预备军的预备军”成了“预备军”的时候，对老人资产的奢望会少得多。

上野：今天的“预备军”以后的一代年轻人是“新人类”。他们是欲望很强的一代，是“老子给什么我都要”的一代。父母就是承担了他们结婚的全部费用他们也不会当回事，甚至一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家以后，都不会把父母送给自己东西当成一种额外的恩惠。

“预备军”以后的就是这样的一代。到那时候，如果父母们说：“我的钱不能再花在你身上了”，“所以我也不要你们将来照料我们”，那样一来，说不定这些子女会恨自己的父母。

和多田：我想还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吧。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很努力的，我认为他们正在形成“父母的东西就是父母的东西”的观念。

无限之会——由老人福利中心主任和多田峰一于1981年在日本京都创办的中老年婚姻介绍所。现在有会员9500名。自开办以来促成863对老人结缘，其中后来又

分开的仅有23对。

他们介绍的办法很多，如“恳谈会”，即组织大家集体聚会，集体见面，当场每人可选3名对象，会后到介绍所申请查阅有关对象的资料，然后从中确定一人。再由介绍所安排双方单独见面约会。这种“恳谈会”每月定期召开一次。此外还有全国大会、地方大会，二日游旅行等等活动。

目前，无限之会本部设在京都，但它的分会组织已经遍布东京、九州、札幌等全国从南到北的10几个县市。

○老年之恋的“纯真”

上野：以前我曾听和多田先生讲过很令我吃惊的话。您说：“尽管老年社会年金制度现在还有很大问题，它还是足以保障一个人生活的老人维持基本生计的。然而，在老年婚姻问题上，那些找男老伴的中老年妇女的基本条件还是强调要有钱的。”这真出我意料之外。

和多田：那是当年的状况，现在已经稍有改变了。

我常常举这么个例子。过去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位靠每月10万日元退休金生活的妇女，在登记卡片上查到男方的退休金也是10万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怎么生活呀？！”“我可不行”。

这种妇女过去很多，就是我过去说的“对男方经济条件特别重视”。她的考虑是“我一个人生活还要10万，两个人怎么靠10万日元生活得下去呢！”

所以我总是问她：“那么你的10万日元呢？你打算用来干什么呢？”

上野：是不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笑）日本女人长期以来就是这么想，这么过来的。

和多田：所以，我这些年来总是对她们说：“假设对方有15万，你有10万，加在一起应该是25万。如果你一个人生活10万就够，那么两个人生活怎么也花不完25万呀”。为此我几乎磨破了嘴皮。

上野：听了您的话，我真感到女人实在是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的。

现在的年轻姑娘也一样，女人把结婚当作就业一样，总要挑选条件最好的。结婚以后，基本上保持“丈夫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所以就是做点临时工，挣点钱也不把它计算在生活费里。这种观念跟了她们一辈子。到了老年，拿到自己的福利年金以后也还是这样的思想方法。

和多田：就算是现在不乏高收入的老年男方，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是男女收入的区别越来越小，所以要完全靠男方的收入生活已不太可能了。

所以今天我想谈谈最可贵的真心，心。现在男方有退休金，女方也有一定数量的退休金，双方相

差不多，如果把两个人的钱合在一起，是最理想的了。

上野：最近日本因为文艺界推出了“纯爱”的概念，一时似乎刮起了“纯真的爱”时尚之风。但我看年轻人之间谈什么“纯真的爱”，其中掺假的成分太多了。要说“纯爱”，我觉得那是到了老年，在老年婚恋中才开始有真正的意义。

和多田：言之有理。正是那样。

上野：要谈得上“纯真的爱”，至少要满足下面几个条件。一个是女人不能把结婚看成是就业，不把主妇当成一种职业。如果自己也有一定收入，那么就不必完全依赖男人的钱包。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前提，那么“纯爱”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纯真”可言。把主妇、把结婚当职业的女人，怎么也改变不了对丈夫钱包的依赖。

年轻人结婚，总有对未来的考虑。要考虑今后生孩子，养孩子，让孩子受什么教育等问题。要是现在的年轻人做这些生活设计的时候，列出1、2、3，每一条都忘不了钱。但是要使“纯爱”确实名副其实，就不能考虑钱。这也是“纯爱”的条件之一。

和多田：可以这样说。老年人在这方面“全部毕业”了，再没有那么多不可避免的“未来设计”了，只有一个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就是爱。所以老人们恋爱起来有时比年轻人还狂热。

上野：比年轻人爱得还强烈。

和多田：那些正如你前面说的曾经以家庭为职业的女人提出的条件，和今天年轻人的条件完全一样——“要找医生”，因为医生最有钱；“要找月退休金30万日元以上的”。其次是“人要英俊”，还要“心眼好，脾气好”等等。我都回答说：“这样的人没有”，“要有也不会到这里来登记申请。”

但是，条件虽高变得却很快。就象现在的年轻人的条件迅速变化，迅速下跌一样——找不到东京大学毕业的就降为私立大学也行；私立大学找不到，高中毕业也行；个子稍稍矮一点也凑合了。到我们“无限之会”来的那些征婚者的条件，也象这样妥协得快极了。当然，因为有自尊心的问题，最初总要提出些条件，但当她们和男人们一起集体介绍见面时，互相谈起话来，常常受到男方的劝诱和吸引，所以很快就改变了态度。

上野：她们总算是过来人了。

和多田：也不见得，主要还是因为她们太寂寞了，希望有一个寄托。

上野：男方的情况怎么样呢？曾经听您说过，中老年男子对征婚对象的条件要求第一条是“越年轻越好”，我当时听了也吃了一惊。

和多田：这一条现在也还是如此，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针对这种情况，关键是需要有人帮助出主意。我们介绍所的办法就是这样，例如，有两位70多岁的老人，A和B，总是一个劲儿地追50多岁

的女人，又总是碰一鼻子灰，两个人都很丧气。我就对他们反反复复地说：“最适宜的男女婚姻年龄差是5到10岁，所以，你们至多只能在相差8到10岁的范围内选择对象。”由于我们的工作，成功的比例相当可观。

上野：金钱也好，年龄也好，把这些可以忽略掉的条件全部忽略不计，最后就只剩下一条——“是不是真心”了。

和多田：把那些可以妥协的条件都取消，剩下的是“心”的问题。

上野：年轻人中对多余的世俗条件和考虑比老人还要多，怎么去也去不掉，所以“真心”也就总显现不出来。不知道在你们介绍所的经验中，以您的眼光来看，什么样的妇女把“心”看得比别的条件都重呢？

和多田：简单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给人“母亲”（或“慈父”）似的感觉的人。“母亲”，“慈父”似的感觉，其实就是“真诚”。

上野：不是“美女”“美男”式的人物？

和多田：美女、美男绝不是重要条件。

我对这一点这样理解——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如果达观到内心对所有人都不存芥蒂，和任何人都没有心理隔阂，他（她）的表情就会时时温柔美好得象菩萨观音一样。脸是心灵之窗。

上野：也就是说神态美，而不是形象美，是

一副有意蕴、有味道的面孔。象这样的人真的受欢迎吗？

和多田：最初并不受欢迎。因为挑长相的老头、老太太还是满多的。第一次，第二次眼睛总紧盯着那些长相出众的，但是一味紧追“美男”“美女”的，差不多到后来都落得一场空。

上野：比较受欢迎的妇女大多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过婚的？

和多田：是丧偶的。也许有些不可思议，和前夫感情越好再结婚越快。

上野：啊，我恰好猜中了。

和多田：离婚者中常有各种不愉快的经历，吵架呀、挨打呀，所以这种离婚者常表示“今后绝不再结婚了”，但是实际上，她们却并不那么顽固，往往再婚并不太晚。反而是那些和和乎平地协议离婚的人反而会很久不再婚。

上野：我非常理解那些曾经有很幸福的婚姻生活、又很快再婚的人。我认识的一位妇女曾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夫妻相亲相爱，人见人羡。但是丈夫去世刚两年，她就再婚了。周围很多人都非常惊愕。但是她却说：“因为我和丈夫的婚姻生活特别幸福，所以我对和男人一起生活的幸福一点不怀疑。因此我选择另一个男人，决定再婚一点也不犹豫。”

和多田：在这一点上，所有同样经历的人的看

法都相同。

上野：独身妇女参加“无限之会”的人多吗？

和多田：有倒是有的，但是大多数并非从未恋过爱的人。

上野：那是些什么情况呢？

和多田：也就是说并不没有真正的“未婚者”或者有过情人，或者有过同居生活但是没有登记结婚。在我们介绍所里，真正的未婚者是最吃不开的，男女都一样。因为对这种人大家都很担心，

“他（她）们能过夫妻生活吗？”“那些独身贵族能够把家管好吗？”“能体贴对方吗？”

上野：难道和处男、处女结婚，不会感到初婚的快乐吗？

和多田：我们这里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反而有人说：“我就讨厌初婚。”大家的想法是“即使是离婚的，也行”，“丧偶的更好”，“总之要有男女一起生活的经验的。”对那些独身者，会被认为“他（她）们什么也不懂”，所以在我们这里没有未婚者成功的例子。

○中老年男人比女人更想结婚

上野：根据对日本老人的性生活方面的调查资料，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70多岁的丧偶男性对“如果现在有人愿意和你结婚，你怎么办”的问

题，回答“那就马上再婚”的占90%。但是，70多岁的女性的情况却不同，对“你们是不是也马上再婚”的问题，2/3以上回答“不”。有的人还说“对那种苦差使我可尝够了。”这里说的“苦差使”大多指的是性生活。从我对日本妇女性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资料来看，日本现在70多岁的妇女中，真正一生的性生活都很和谐美满的并不多。

和多田：我看也不会多。这和日本过去的性教育太落后有关。说的极端一些，有些妇女几十年的性生活都是只顺从男方单方面的要求，而男方只从自己的欲求出发，只求自己满足。现在的医生都开始重视性生活知识的教育，讲夫妇和谐，双方都满足，这一点对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平衡具有很大意义。而过去老一代人却没有这些生理常识。

上野：老年人找老伴的原因中，出于性生活要求的成分占多少呢？

和多田：我看有相当大比重。人的欲求是很微妙的，因人而异的因素很大，而且这种差异随年龄的增长不断加大。有的人一过50岁就没有性行为了，有的人80岁性欲还很旺盛。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不能完全依据统计数字反映人与人的悬殊差别。

上野：一谈到结婚恋爱生活，马上就容易和日

本的住房问题绞在一起。现在的老人如果和子女同居，在什么地方和恋爱对象约会呢？

和多田：最近在日本时兴旅游，老年人常常利用旅游互相交际，加深了解。

上野：这和年轻人的婚前旅游不是一样的吗？

和多田：也不完全一样。我们“无限之会”有种种旅游，起了一个专用名称，叫“分居伴侣的旅游”。

实际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日本的老年人即使情投意合，两厢情愿，也未必都能很顺利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有的迁就儿女要求，有的限于住房条件，等等。所以我们无限之会认可三种终生婚姻方式：入籍同居（结婚登记即户口入籍）、同居、以及分居伴侣。所谓“分居伴侣”是本可以结婚或同居的，但是限于眼前的具体困难还做不到。其中很多是上有老父、老母需要照料，例如自己60岁，需要照顾90岁的老老太太；或者因为孩子已经成人，但还住在一起，家里很窄，不允许再搬入一人。当这种老年人在无限之会里碰上中意的人，自己又不能丢开父母不管，或者张不开口让住房困难的男方住到自己那里，于是一种“分居夫妇”的形式就出现了。

千叶县有一对这样的夫妇，特别令我感动。他们把自己住处周围的朋友都请来，举行了一个宴会，向大家宣布：“我们从今天起就结婚了，但是

暂时不能住在一起，请诸位周知。”

上野：这已经是在社会上成立的婚姻，理应被承认。

例如，当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怎么向熟人做介绍呢？能说“这是我妻子”，“这是我丈夫”吗？

和多田：能。

上野：我以为只有年轻人而且只有其中少数人才会这样做，想不到今天的老年人也能这样做，真了不起。不知道这种分居伴侣是不是得到双方家里人的认可，是不是也可以在彼此家里临时住住？

例如在瑞典，几乎所有高中学生，或者同龄男孩、女孩，如果有了异性朋友，就可以带回家里临时住一天。如果女儿的男朋友到家里来住，母亲还会问：“明天早晨要给你准备早饭吗？”这对日本女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若是父亲的“分居伴侣”住到家里，儿女们能象瑞典人一样对待她吗？

和多田：现在就是这样。

上野：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意识革命。

和多田：也许的确是意识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孩子们也有他们的打算——母亲去世以后，加上退休，父亲整天一个人在家很容易精神恍惚，倒不如找个女朋友，生活有了寄托，精神状态就会

好多了。精神好，健康也好，说不定还能再找个工作做做呢。这样的实际例子也很多。

上野：找到“分居伴侣”后又再次工作的情况相当多吗？

和多田：相当不少。心里有了奔头，所以就有了劲头。这样一来家里的零用钱也会多起来，照料父亲的事情还可以托付给父亲的“伴侣”，所以孩子也放心了。

上野：要是有一方得了病怎么办？

和多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都是互相照料的。

上野：女方生病的时候，男方照料的情况也很多吗？

和多田：是的，都能这样做。因为这种关系已经完全得到孩子的承认和理解，所以他们都到对方那里去照料他们。

上野：让男的照料生病的妇女，是不是只限于精神安慰吧？大概做不到象熬点粥之类特别细致入微的照料吧？也就是闲的时候过去看看，陪着聊聊天，劝她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吧。

那些再婚夫妇中，又有一方先去世，这样的情况有多大比例？

和多田：很不少。

上野：那么这种情况都由什么人为死者送终呢？

和多田：当初家庭关系没有处理好的再婚夫妇，大都等死者一闭眼，另一方（主要是女方）也被从家里赶了出来。

一位再婚老人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去，打电话通知子女后，久久也不见他们到来。我当时还纳闷他们怎么能这么磨磨蹭蹭，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得到消息先赶回父亲家里，翻出存折和图章后才赶到医院。举行葬礼的头一天夜里，子女们对继母说：“你不过是我们家的当家人，不能以妻子身份站在父亲的灵堂旁边！”这位我们无限之会的女会员只好打电话来找我：“他们不让我出席葬礼，我该怎么办？”我告诉她：“你要堂堂正正地坐在你该坐的位子上。”这还是一个正式履行过结婚登记手续的例子。

最后经过法院裁判，还是孩子们输了。

上野：因为已经经过结婚登记，所以受法律保护。

和多田：是的。所以女人要是自己窝窝囊囊的，到头来就只能受欺侮。

上野：那种“分居伴侣”中若是有一方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先去世，剩下的一方该以什么身份参加死者的葬礼呢？

和多田：这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主要还是看他们交往的深浅和时间的长短。

上野：最后他们的骨灰怎么处理呢？存放在哪

方的墓地呢？

和多田：大部分还是保留在子女那里。现在的情况大部分还是男方早走一步。

上野：这一方面是因为男人平均寿命短这个令人遗憾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总要找比自己年轻的女人，所以这种结果难以避免。

这样一来，男方的送终倒好办，女方还在世，总能替他们操办。难办的是剩下女方一人的时候，她的后事该托付谁呢？

和多田：哪里有人结婚的时候就想到这么远的事情呢？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都是只感到眼前特别寂寞、孤独，大部分都只考虑到：“哪怕能再过上三五年的幸福日子也好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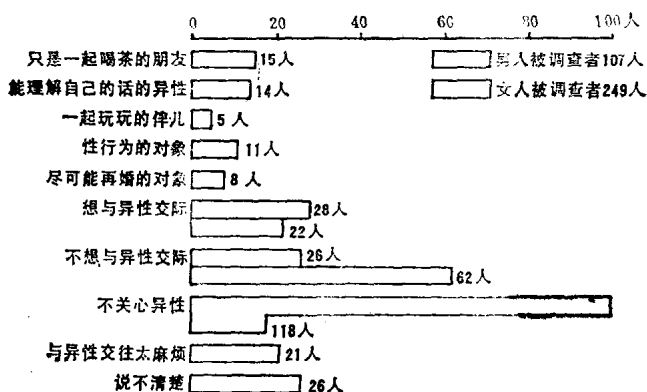
各国的老年婚姻比例 根据1984年《世界人口年鉴》
的“人口动态统计报告”

国名	调查年次	性别	50岁以上申请结婚人数	老人婚姻占婚姻总比例
日本	1984	男	9502	1.42%
		女	5079	0.76%
美国	1981	男	80981*	4.33%
		女	49468*	2.65%
丹麦	1983	男	1580	5.83%
		女	915	3.38%
南朝鲜	1981	男	3281	0.95%
		女	1190	0.34%

※ 55岁以上

老年人与异性交往的愿望

参考大工原秀子著《老年期的性》



○老年婚姻的表面理由与实际背景

上野：到了我这个年龄，对老年问题的关心已经成为很切实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孩子。一个过了40岁没有孩子的人，要切实地考虑自己的老年的话，必须要考虑到除了靠自己为自己处理好老年的一切事务，别无出路。

我对同龄男士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说：“女人总是对未来的事考虑得那么多，真是令人乏味的。”他们对老年的问题故意背过身，不予考虑。他们心里死抱着一个并没有根据的论断：“反正我会死在妻子前面。”

至于剩下妻子一个人怎么过呀——则不须考虑。我接触的多是女朋友，据我所知，她们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结婚生子的妇女也在考虑自己总有一天要成为未亡人，那时怎么办。男人根本不考虑今后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时的老年生活。

和多田：日本人有句话说“寡妇家里里外外一把手”。不过女人从年轻时候就爱考虑将来的事，我们可不是，不想那么多。

上野：不是“寡妇家”喜欢“里里外外一把手”，而是因为她们有很多人结婚的苦头已经尝够了。我也常和中老年妇女们交往，觉得其中有些人即使处于现在“无限之会”会员们的境况，也不会去申请入会。

和多田：不是不想去，而是因为周围没有适当的气氛。我们的那些女会员在我们动员之前也没有勇气来征婚。

上野：是吗？我调查过各种各样的妇女活动团体，问她们怎样考虑自己老年的打算，她们说：

“想和朋友们在一起痛痛快快地说呀笑呀，喝酒呀，这样度过老年，”“我有很多朋友，所以老伴死了也不会寂寞。”似乎是愿意和同性交往的比喜欢和异性交往的妇女显得多一些。

和多田：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想法，但是我不赞成上面那种说法，因为她们自己现在还没有真正处在那种位置上。例如有一位72岁的老太太，是一

个老人俱乐部的副会长，为人相当活跃，什么卡拉OK等等，各种活动她都参加。她老伴卧床不起已经7年了，她每天外出活动回来，都把当天的事情绘声绘色地说给老伴听，而老伴不过只能“嗯，嗯”应答。所以，我想她对这样的老伴大概早已经受够了，说不定心里还想“他能早点死就好了。”

但是当有一天老头真的死了，最后向遗体告别的时候，她痛苦地近乎半疯狂，甚至想钻入丈夫的棺木里。我看她的表现都是出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装假。

上野：看来和多田先生对男女之间的相互追求和相互恋爱抱有很美好的信念啊。我觉得您劝导那些因为第一次婚姻失败而灰心的妇女的说法特别出色——“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丈夫一个是男人，男人是各式各样的。你应该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世上的男人并不都是些让人讨厌的家伙！”

和多田：是的，也许我说的让她们“亲自体验一下”，对老年妇女来说，有些不够慎重，但我还是主张如此。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各种各样；女人有女人的世界，男人有男人的世界。所以我认为“人”字是由“男”“女”两个字合在一起演变成的。哪个字在上面，哪个字在下面，虽然说不清楚，总之是相互间彼此需要而自然地合在一起的。他们只是因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一时争吵，一时辩论，但是归根结底男与女是统一的。我至今仍

持这样的观念，而且也只能持这样的观念。

○老年婚姻革命的倡导者和多田峰一

——上野

人到老年，落叶枯黄——在这传统文化的环境里，老年婚姻是“大逆不道”、“千人耻笑”的“伤风败俗”的事情。人们发明了最尖酸刻薄的语言来唾骂他们——“老风流”、“老轻狂”……。而且最不肯体谅理解的指摘竟来自最亲近的人——老人们的子女。换言之，最不允许父母作为男人或女人的，就是儿女们自己。这些儿女将有一天也要成为老人。和多田先生对这些“老人预备军”这种不近人情的态度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和多田峰一先生是1981年开始首创促进老年婚姻的组织——无限之会的。近10年来，社会风气大有进步，老年婚姻的阻力也很有改观。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经过象和多田先生这样的先驱者、倡导者们的艰苦努力，才逐渐使那些沉溺于误解和偏见的人开了窍，使社会风气在这方面有了新气象。

有一点使我很感动——实际上是老人们勇敢地挑起了这场革命的重担。例如，“分居伴侣”的方式，是针对当前老人的现实状况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婚姻形式。它不须经过日本习惯上的迁移户口、变更女方姓等等手续，甚至连住都不住在一起。但

是，他们常常相互照应，象夫妇一样外出旅游，彼此以夫妻相待，以夫妻名义向外人介绍，并得到朋友们的祝福。当然，他们这种婚姻既省去了死后遗产的矛盾是非，也免去了老人护理阶段所涉及到的功利问题。这种在日本新近出现的老年婚姻形式虽然貌似年轻人所流行的“未婚同居”，但其实质则是“事实婚姻”，而且对有儿女的老人常常是不得已情况下的理所当然的做法。

所以我想到了“纯爱——纯真的爱”这个词，我认为它是为老年伴侣们创造出来的形容词。象“分居伴侣”那样的老年夫妇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维系，也没有为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的困扰，他们之所以愿把双方的命运联在一起，愿意关心对方，仅仅是因为爱情。和多田先生用他倡导的成功事实使我懂得了——男女在人生黄昏来临前的爱情是纯真而美好的。

北欧老人福利社 会——福利事业 的现场报道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

大熊一夫。1937年生。东京大学教育学科、科学史、科学哲学专业毕业。朝日新闻社记者。对北欧老人社会深有研究，并发表过多种关于老人社会的著作。

○丹麦的老人福利事业

上野：大熊先生曾经写过《精神病院采访记》和《老人病院采访记》等书，所以被称为“朝日新闻社的内部撰稿人”，对吗？听说您现在将采访目标定为老年问题，为此制定了许多新计划。1988年秋天，您曾把丹麦的福利大臣请来召开专题讨论会，并由自己亲自出马担任会议主持人，您为推动日本的老人问题研究运动花费了很大精力。

我想日本人对瑞典和丹麦的老人状况是不大了

解的，所以今天就从北欧的老人问题特别是丹麦的实际状况谈起，您看如何？

现在大家公认世界上最理想的老人福利状况非瑞典莫属，但是瑞典国内却正在对自己的国策中的“唯设施主义”展开深刻的反思。通过大熊先生所推行的“老人问题研究运动”，我第一次了解到原来丹麦的老人福利事业比瑞典还要先进一步。

大熊：我关心老人问题缘于对精神病问题的兴趣。日本是对精神病人采取严格隔离收容政策的国家。而欧洲自二次大战以后就逐步实行取消精神病收容所的措施。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这方面的大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并且特意制定了取消旧式精神病院，“禁止对精神病人施行旧式的住院处理”的法律。为此我曾两次赴意大利采访。第二次去意大利时，我开始注意到北欧。

当时我听说丹麦和荷兰也是极少强迫精神病人住院治疗的 国家。如果精神病人被强迫住院，总有一定特殊情况，例如和他人发生非常严重的磨擦，或者和父母之间发生武力争斗、无法排解的争吵，等等。我之所以说亲身感受到被强迫住院的情况很少，主要是因为我见到的那些患心理疾病的人都住在非常优雅的环境里。我那次访问丹麦是1987年秋天。

我当时的感觉是“果然名不虚传”，“真了不起”。从精神病医疗设施水平来说，在整个欧洲中

北欧还算不上是第一流的，但是对全体存在着某些身体障碍的不正常的医疗福利措施却相当不错。社会福利事业搞得相当出色。

另外，日本的《朝日周刊》杂志比较早地意识到老人问题的重要，连续3年开辟了老人问题专栏报道。其中特别是日本的痴呆老人被关在医院或老人施設中的情况，我感到特别值得关注和报道。

为了报道这一事实，我潜入到现场拍摄受束缚不能行动的老人照片，颇费了一番周折。

上野：您是把自已装成痴呆者亲自入院，而不是做为一个得到批准的采访记者，所以才了解到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大熊：是的，那时拍的几张照片相当不容易。都是些医院绝不准公布于社会的照片。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并非仅此一个医院如此对待痴呆老人。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满不在乎地把老人绑缚在椅子或床上。我不知道象丹麦那样的国家的医院或老人设施，是不是也捆绑老人。所以当我为《朝日周刊》写完关于日本痴呆老人境遇的连续报道以后，就赶到丹麦，象老鹰觅食似地，到处寻找着被绑缚的老人的踪迹。结果，我一个也没有发现。真是一个也没有。

上野：那么说您本来是关心精神病人，想不到发现了两个副产品——残疾人和老人的各种境遇。我向来只阅读英文资料，知道最近有一种让残疾人

和老年人都过上普通人正常生活的主张，这在英文中叫“正常人化”。我刚知道这个词原来在北欧早就有了。

大熊：我原来也并不清楚。第一次访问丹麦时，我知道了“正常人化”这个词儿出自这个国家。这种提法始于50年代。当时正值把精神病人——俗称精神薄弱，或者有智力缺陷、智力障碍的人——收容到大型设施(医院或精神病收容所)的办法大都失败的时期，社会上开始批判这种做法。

上野：您说丹麦的做法非常出色，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大熊：首先是绝没有捆绑现象，这令我大吃一惊。

其次是护理方法也完全不同，这也是没有捆绑现象的背景原因。只要亲眼一看，就明白和日本完全不一样。现在日本有一种叫“特别护理老人之家”的设施，丹麦也有类似的老人设施。但是，在丹麦同类设施中工作的护理人员数量高达日本的3倍。我想也许正因为有3倍的人手，所以才没有必要把老人绑起来。也正因为不限制老人活动的自由，才不会造成老人失去行动能力而大批卧床不起。

上野：3倍的人手意味着3倍以上的成本，丹麦为什么能投入这么大的力量呢？

大熊：在不惜使用大量人手的水平上，丹麦和瑞典大体相同。究其原因，大概就要追溯到欧洲的“团结精神”了，也就是与“弱肉强食”正相反的精神。这种精神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影响着欧洲。

上野：是不是说，这种精神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就以集体的互助精神形式存在了？

大熊：似乎是这样。

上野：丹麦是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存在那样的集体互助精神呢？

大熊：这可能和他们的历史有关——丹麦这个国家一直到19世纪前后都很穷，而且所有人都是穷人。

上野：这么说，瑞典也是同样的历史状况。瑞典人说：“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富足，就是因为我们曾经都是同样的穷人。”

大熊：瑞典在这方面显得更突出。在当时最贫穷的时代，瑞典全国曾有1/4的人移居到美国。所以瑞典人说：我们对日本的古代传说“弃老妪（传说古代日本有个地方的儿子长大后就把辛辛苦苦将自己养大的衰老的母亲背到深山老林里丢弃——译者注）”非常能够理解。他们把19世纪那1/4被迫移居美国的瑞典人理解为日本被遗弃的“老妪”。

现在，一提起北欧，人们想到的都是富裕国度。其实100多年前，这些国家是欧洲最穷的，而且那里穷人比比皆是，富人可谓凤毛麟角。也许正因为

他们从最穷的基点起步，又没有以剥削、榨取为生的强权富翁，所以才有今天的北欧。换句话说，在那里，弱者和一无所有的人也同样有发言权。可以说那里是最进步的民主主义国家。

上野：在日本，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旧共同体被渐渐破坏，但同时近代共同体的伦理却被原封不动地带到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中来，于是就形成了日本所特有的“家庭式经营”或称“日本式经营”方式的企业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中，一方面“枪打出头鸟”，一方面又“提携后进”，结果大家都“半斤八两”“难见高下。”所以在表面上，日本的共同体伦理和北欧是很相似的，这种伦理已经维持了一个多世纪。

大熊：但是现在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很落后，即使不和北欧比，和欧洲其他国家比也是落后的。

从横向来看各国的情况，体制上最明显地落后于各国的还是美国。美国有两亿人口，但是只有接近4000万人参加了健康保险。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些人可以享受非常富裕的老年生活，但是同时还有相当多的人必须在肮脏的老人看护院里度过晚年。存上一大笔钱，上了年纪搬到佛罗里达州去，当必要的时候，就高价雇上一位专职护士每天照顾自己——这样的老年生活当然是再理想不过了。但是真正办得到的人很有限。总之，在美国所见到的老人福利事业都是靠民间集资，靠民间自助。日本

的现政府领导人也想向美国学习，模仿美国的办法，号召发挥“民间的积极性。”这是违背福利事业的基本精神的，是与北欧的发展背道而驰的。

上野：政府的政策显然与北欧的情况大相径庭。但是在日本，社会的性质和作用常常体现在共同体上，对此您怎么看呢？

譬如：在日本，具有一定集团成员资格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平等互助的关系……。

大熊：所以有一句最适于日本现状的说法，那就是日本的福利事业存在于公司之中，特别是第一流的企业之中。

上野：也就是企业福利了。

大熊：是的。企业负担着福利的责任，所以越是在经营完善的大企业、大公司里，越是能享受到大型完善系统中的温暖和舒适，这就是日本的福利。还是把日本的福利事业看成是公司的事业比较准确。

上野：不错，日本是“企业社会主义”国家嘛。

**各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中社会保障金
负担率*一览表 (1986年)**

1. 瑞典	53.5	9. 爱尔兰	40.2	17 瑞士	32.6
2. 丹麦	50.6	10. 英国	39.0	18. 葡萄牙	32.4
3. 挪威	49.3	11. 芬兰	38.4	19. 澳大利亚	31.4
4. 荷兰	45.5	12. 西德	37.5	20. 西班牙	30.4
5. 比利时	45.4	13. 希腊	36.7	21. 美国	28.9
6. 法国	44.2	14. 意大利	36.2	22. 日本	28.8
7. 奥地利	42.6	15. 加拿大	33.2	23. 土耳其	22.7
8. 卢森堡	42.4	16. 新西兰	32.9		

* 社会保障金负担率是指国家从国民税金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目的的金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老人护理与家庭纽带

上野：还是回到我们关于丹麦的话题上来吧。总而言之，丹麦比瑞典更先进之处就在于其老人设施中众多的护理人员，以及对那些在家里养老的老人也可以完全达到的妥善护理。是这样吗？

大熊：是的。就保证完善护理家里养老的人这一点来说，瑞典曾经走了一点弯路——有一段时间把老人都集中到长期老人疗养院，后来证明这种方法并不成功，现在他们正在检讨这种唯设施主义的政策。

上野：1989年春天朝日新闻社的《AERA》杂志曾介绍了瑞典的老人护理情况。文中曾经提到

一位瑞典有关人士的话：“希望你们不要走我们走过的弯路，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如果能把过去我们花在建设集中老人设施上的巨额投资用在现在的家庭护理或住宅近地老人设施上，那么我们现在的老人护理条件还要好得多。”

日本也有“家庭护理”这个词儿，但是读了大熊先生对日本家庭护理状况的报道后，我几乎气得浑身发抖。虽然同样都叫“家庭护理”，但是实际内容竟有如此天壤之别。日本的家庭护理基本依靠家里的人手，所以是以家里有护理老人的人手为前提的一种“自助”方式；而丹麦的家庭护理基本上针对单身老人，所以，就必须保证相当充足的护理人手。因为老人与子女不同居的现象很普遍，那么独居老人的看护人员就得来自当地居民区。上一个世纪的欧洲农村社会一般还是大家庭社会形态。

大熊：是的。

上野：而现在，老人，特别是单身老人，独居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这之间的变化过程也是非常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照顾老人不是靠家里人，而是靠同一居住区的邻居们”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大熊：历史上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产生了这种新观念，我也说不清，我没很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注意到了这样一点：从很早开始，丹麦人就把18岁应该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当做理所当然的事

情。

从那以后就与父母分居了。听听那些上年纪的人的话是十分有趣的，他们非常自豪地谈到如何强迫儿女用高价买下自己的财产——他们吓唬儿子说：“你要不用这个价钱买下来，我就要卖给毫不相干的人了！”可以说父子关系里已经渗透了非常彻底的个人主义。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不知始于何时。

但是，据丹麦的前福利大臣说扶植这样的独居老人生活的社会体制是从80年代才开始摆脱落后状态的。另外，妇女进出社会，家庭护理的崩溃则始自二三十年前。其实，这些问题在同期欧洲所有国家里都在发生，而其中北欧国家采取了妥善的对策。据说，在一些旧基督教势力较强的国家，例如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被抛弃在恶劣简陋老人福利院里的老人仍然非常之多，而这些国家受教会的影响恰恰是更强调家庭关系的维系的。

上野：个人主义与父子关系之间也有一定的相对关系。按日本的家庭主义文化理想来说，如果达到能够下决心把老人送入老人福利设施的地步，那么家庭感情的纽带也就扯断了。日本人的观念是父母总要给子女留点什么，而丹麦的父母的想法却正相反。

我也很想去瑞典看看。我想财产制度是支持家庭制度的基础之一。那里的财产制度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即以家产的形式出现的财产已经不属于家庭全体成员，而只属于某个人了。所以今天的瑞典人在选择个人财产的方式上，宁愿将自己的资产全部提供给公共基金也不再象过去一样靠个人积蓄家产。换言之，他们选择了交纳高额税金的办法取代个人存款的方式。这种选择使他们的个人财产，或者说家产减少到最低限。这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好像是自己在破坏家庭存在的基础。

大熊：的确如此。

上野：所以按一般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来说，虽然瑞典的老人福利事业可以说不错，但是那种和家里亲人隔离开，彼此形同路人的老年生活还是不符合日本人的心愿的。

大熊：所以日本的那些讨厌社会福利事业的人，说起北欧福利的缺点时，总忘不了指责这一点——“北欧的老人太孤独”，“他们把父子间的纽带全扯断了”，“孩子根本不管老年父母”，“北欧的老人真可怜。”

上野：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呢？

大熊：老年孤独的问题哪个国家都有。如果问你：“那些被抛在日本各医院和老人设施里的几十万老人，他们难道不孤独吗？”你能给以否定的回答吗？所以仅仅指责北欧有老人孤独问题并没有切中要害。至于父子间的纽带也没有完全割断，例如那些老人设施里的房间墙壁上，都挂着自己亲人的

照片。电话号码簿上用醒目的大字首先记录着儿子、女儿和其他亲人的号码。此外，每星期到儿女家去一次的人也很多。特别是电话联系，我觉得比日本人要密切得多，他们经常长时间用电话谈话。让人觉得那不是出于履行义务，而完全是出自父子之情的轻松谈话。若是在日本，一旦把父母送入老人设施，儿女就从此甩手不管了。

但是，在北欧人心目中，日本的家庭习惯都还是美好。他们认为东方国家都是有悠久传统的美好国家，在那里，家庭亲人们都自动看护老人。

上野：他们对日本的印象怎样？感到值得他们羡慕吗？

大熊：他们很羡慕。我想这可能和他们家庭关系的割裂状态过于严重有关。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回到原来的家庭关系溯源上去，为此，瑞典在1987年曾经制定了一项政策，——如果家里人肯担负护理老人的工作，当地政府机关可以提供补贴金额相当于雇佣一位专职护理人员所需的费用。这是一种奖励政策。

上野：我也知道这种情况。我在给学生们讲课时曾经提到“在瑞典，女儿看护自己的母亲，或者儿媳照料婆婆，都会得到国家的报酬”，想不到学生们都大叫：“不可能！”接着，又一个个叹起气来。

大熊：我想，恐怕即使有这样的政策，肯这样

做的人仍然为数不多。

上野：如果承认请他人照料老人是一种护理劳动——这已经成为社会常识，那么只有请人干才付钱，而自己亲人干却一无所获——这就太不公平了。

大熊：是的。在北欧，正因为人们的观念中没有毫无报酬地白把儿媳妇当劳动力使的道理，所以才会想出那样的补贴办法。

上野：这样一来，亲人之间的接触就完全取决于彼此的感情和兴趣了。

大熊：完全如此。所以非常简单爽快，倒让人觉得亲人间接接触不接触不受任何因素制约，只决定于感情纽带的深浅。日本的家庭关系很密切。家庭里凡有密切关系的人都必须互相照料。这反而在父母与子女间的来往中加入了不自然的因素。例如，有的家庭主妇因为害怕将来需要照料丈夫的父母，就找个工作逃避出去。据说现在的日本妇女都对照顾老年的婆婆视若畏途。因为日本有长媳照顾婆婆的习惯，甚至也成了一般姑娘不愿嫁给长子的原因之一。

○看护人员的社会地位

上野：北欧的看护人员体制是什么样的呢？

大熊：从日本人的眼光看，实在不得不赞叹不

已。它的人数大约相当于日本的30倍。

上野：都是市政府的职员吗？

大熊：是的，相当于日本地方政府职员，我参观了叫奥汀塞的城市，人口是17.5万。那里的家庭看护人员如果按24小时全昼夜工作计算，平均可达1000人之多。

上野：那些要求帮助的人需要办些什么手续呢？

大熊：只要和地方政府的福利科打个招呼就行了。需要自己负担的服务费和个人的收入是相应的，所以相当便宜。费用最贵的城市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也只不过相当于每月不到1万日元（1990年10月1万日元约等于77美元——译者注）。而那些低收入的老人则可以得到免费服务。所以政府几乎要完全以国民税金来支付这笔费用。

上野：税金大致占个人收入的百分之几？

大熊：用一种最容易理解的说法，我想可以这么说——目前瑞典和日本的个人平均收入大体上相等，但是，如果实际上看看瑞典人的钱包，恐怕钱还不及日本人的一半。也就是说，瑞典人缴纳的所得税差不多是日本的两倍。瑞典人的饮食和服装都是相当质朴的。

上野：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全社会都对大家共同享受同等程度的富裕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于这样的社会，日本金融界似乎颇有微词，说这种高

税金高负担所带来的平均主义会损害经济活力。对此您怎么想呢？

大熊：对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回答的时候。瑞典企业里的职员也好，学者也好，显然都比日本人善于使用时间。他们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劳动密度却相当高。如果说那里也有懒散现象，多是比较乏味的劳动场所，或者报酬不好的地方。这种情况日本也有，所以也不能简单类比。总之，不能认为高福利社会把所有瑞典人都惯成了懒虫。如果那样的话，倒应该是美国的低负担、低福利的作法更有成效了；但事实上美国的犯罪率、毒品泛滥反而是世界闻名的，

在瑞典，不仅每个人负担很重，企业的负担也相当重——各企业承担着社会保障事业和福利基金的相当大的部分，比起日本来，它们确实好象背负着一块重石，艰苦地行进。

上野：日本的那些重视经济效率的企业，讨厌租税负担，为此还特地把公司本部搬到某个外国去。

大熊：所以我说对瑞典和日本的政策谁是谁非的问题还要再花些时间才能下结论。的确可以说，日本的高度发展是在减轻企业的负担以后才有了可能。如果以现在的状态让日本和瑞典的同等企业进行竞争的话，瑞典企业必败无疑。

但是瑞典的产业与日本的产业性质不同。日本

都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型企业。电气产品，汽车产品都是这种性质。而瑞典可以用附加价值高的产品与日本抗衡。瑞典人口只有日本的1/10左右。如果他们坚持长期发展低成本高价值的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那么很可能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

上野：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即所谓的老年资本主义经济，所以我觉得应该已经有条件实行瑞典的政策。

大熊：是的。如果大家都亲眼看到那些为日本的发展洒尽汗水，辛劳一生的老人们不能在晚年过上好日子，就会明白必须在这方面付出相当的资金了。

上野：但是，对日本来说，当发现辛劳一生却过不上幸福晚年的时候，是老百姓抱怨国家，还是企业抱怨国家，哪一个在先呢？说不定是企业会先抱怨国家呢（笑）。

瑞典的看护人员都从什么人中征募呢？

大熊：和日本一样，大致是在主妇中间招募。

上野：那就是说，这种工作本身都是在个人的近邻处进行。我所知道的瑞典这类工作人员，除了主妇就是外国移民，多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的人。如果说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需求就高达日本近30倍的话，整个社会的失业率应该因此而很低了。所以这对瑞典的社会安定也有贡献。

大熊：是的，现在瑞典的失业率全世界最低，

只有1.4%左右。

上野：那么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日本将来的情况。譬如，瑞典涌入了相当多的外国移民劳动力——因为看护工作和其他工作相比，条件和报酬都较差，所以大量就业人员来自外国劳动力的可能性很大。

大熊：很有可能。这正是瑞典的弱点。

上野：日本现在正在为是否容许引入外国劳动力，对外国劳动力是“开国”还是“锁国”争论不休。我听说日本一些社会福利设施里已经开始使用外国劳动力了，在这种场合下，还是选择那些与日本人比较接近的外国人可以避免生疏感，所以据说现在对引进已入巴西籍的日本人呼声特别高，甚至有些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代理工作，以两年合同的方式输送劳动力到日本来。

大熊：这真是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现在常可以在老人医院里看到外国劳动者。

上野：对看护人员这门职业的社会评价怎么样呢？

大熊：在丹麦我没有感到这门工作特别被人看不起，但在瑞典就稍有问题了。

上野：做这些工作的人都很自尊吗？

大熊：是啊，那些专职人员的自尊心都比较高。

上野：年轻人也能志愿参加吗？

大熊：也有年轻有志愿者，并不都是些孩子已经长大了的家庭主妇们。但是以我亲身感受而言，经济状况并不景气的丹麦在这方面显得成熟和稳定，经济状况很景气的瑞典反而不够稳定，年轻人不太安心于护理工作。这是从总的印象说。

上野：日本的看护工作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职业，那些地方机构虽然都理直气壮地声称，“我们有看护制度”，但是实际上登记做看护工作的人极少。

从今天日本的家庭妇女的实际状况来看，如果看护人员的低下社会地位一直不能得以提高的话，她们绝对不会自觉地来要求做看护工作。所以，从根本上提高看护劳动的社会地位，改变看护方式，改善看护劳动者的形象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否则象现在这样的状况——虽然有一定空余时间，又不愿无偿劳动，虽然想为社会做点贡献，又没有受到鼓励和认可的动力——就还会继续下去。

今后日本说不定要求雇佣廉价外国劳动力做家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些事关“养老送终”的劳动，恐怕永远都会处于这么低下的地位。

大熊：怎样才能提高这些人的地位呢？提高工资行吗？

上野：我想这个问题与妇女地位有关。只要关于养老送终的劳动地位不提高，就谈不上妇女地位的提高。

大熊：你说的很有道理，

○家庭内部福利的局限性

上野：听了关于丹麦和瑞典情况的介绍，感到那些实例都是可信的，只要肯做也都是可行的。应大熊先生的邀请，丹麦的福利大臣和有关人士访问了日本，他们参观了日本各种设施，在回国前异口同声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能做到的，你们当然也能做到；如果说到钱的问题，你们是财力充足的国家。所以主要还是一个想不想做的问题。只要想做就一定能行，

这些令人感到十分体贴温暖、是鼓励又是批评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归根结底，日本不是办不到而是不打算办。

大熊：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假设日本也这样做，几乎可以肯定，每个人都必须缴纳高额税金。如果不这样，而是让大家用自己的存款去支付护理服务费用，就会有支付得起与支付不起之分。而大家都缴纳税金，用税金来支付这笔费用的话，也还存在税金剧增和如何合理地再分配税金使用的问题。总之，这两个问题必须处理好。

另一方面，即使实行高税金制度，也要首先拿出一个福利系统的完整计划蓝本来，这样人们才能放心地缴纳税金，而且还需要民众支持的政治家来

推行这个系统工程。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和政治相关的重大问题。

上野：从日本人储蓄的增长情况来看，支付保险、储蓄加上税金的总和，与北欧人的税金负担不相上下。

大熊：我想也是这样，瑞典人的存款率几乎是零，甚至是负数。日本是世界第一储蓄大国，而且税金又比瑞典低。所以低税金再加上个人储蓄，应该和瑞典的高税金相当。

上野：其实区别就在于从哪里支付社会福利这笔费用，是从公共口袋里出，还是从自己口袋里出。要让大家都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存放在“公共口袋”里，那么首先必须让人们相信政府能够管理、维护和经营好这个口袋。日本人从来对政府就没有这么信任过。

大熊：日本人一方面不相信政治，另一方面也没尝过福利的滋味。但是北欧福利事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乎100年前了，它现在的福利政策从本世纪初就开始起步了。大约60年前主张福利政策的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也就是说从世界经济大混乱的时候开始，北欧就一直在积累着社会福利事业的各方面经验。

上野：我读了您写的关于日本老人的报道非常气愤。日本对这么无理的事情也能毫不理会吗？我非常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对这种事日本人竟然不感

到气愤。我看老人举行武装起义也是情有可缘的。

人们对地价高涨满腹牢骚，对领薪者的苛税也愤愤不已，为什么偏偏对老人问题就没有人真正感到气愤？！大概只有大熊先生一个人真心感到气愤了（笑）。

大熊：这也不是那么简单，肯定有一股势力会说：“这家伙在夸大其辞”，“无中生有”（笑）。

不仅是老人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呢。我20年前，也就是研究老人问题之前一直研究精神病治疗问题。日本的精神病院里侵犯人权的事例相当之多，就是把这类实况都采访报道出来，也绝不可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

至少是政府的厚生省应该就精神病院是否有虐待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吧——20年来一次也没有。和这个问题同样道理，如果不先承认现有老人问题的严重事实，那么下一步的改革就绝提不到日程上。

上野：医疗行政问题的确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还抱有期望，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服务受益者有权选择淘汰服务提供者。

例如对老人病院，一张绑缚老人的照片在报上一发表，那个医院的形象就会大大动摇，入院者就应锐减。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却令人无法理解：那些住在医院里的老人并没有全部因此而退院，也没有听到更多的舆论表示为老年感到担忧和恐怖。

如果不是老人病院而是妇产科医院，稍微出一点医疗差错，早就闹得不亦乐乎，又是医疗诉讼，又是新闻报道了。

大熊：的确如此，

上野：为什么关于老人病院的报道却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呢？我对这个谜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老人病院的服务受益者并不是老人本人，而是老人的家属。老人本身并不处于自己决定、自己选择服务提供者的地位或状态。

大熊：言之有理。

上野：从服务受益者的家属一方来看，他们的益处在于摆脱了麻烦。所以这个问题的根子是家庭主义，是家庭主义的严重消极性的反映。

大熊：是的。世界上都传说日本的家庭有照料身体不便的亲人的传统美德，但实际上这所谓“美德”早已经破绽百出，渐渐被丢得差不多了。在日本全国，不仅老人病院，还有些其他叫作“病院”的地方，被扔进医院撒手不管6个月以上的老人超过25万人。象这样在医院里住上6个月的老人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住处了。对这种现象，专家们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名词——“社会性住院”。

虽然日本的家庭护理已经徒有虚名，但是大部分人对这个必须承认的事实不以为然。

上野：当初他们因嫌麻烦才送老人去医院，如

果现在让老人出院，他们仍无接受老人的余地。

大熊：的确是这样。他们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让老人住院的，就连住院的老人自己也表示不愿意出院。所以，日本人从前“弃老嫗”的作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过去，儿子把老母背到深山里丢弃以后，头也不回就下山了；如今我们身边发生现象比从前还多得多，

上野：但是家庭之所以已经没有能力收容老人，这和日本社会一直要求家庭承担100%的老人看护责任是分不开的。

大熊：是的，对这一点日本人有一定误解，或说错误观念。认为“对家里的病人或者残疾人，必须由家庭内部进行护理”，也就是说护理的责任全在家庭，那种“护理应由社会来做”的想法是不对的。

上野：您刚才曾说日本老人的状况大约处于美国形式与北欧形式的中间。美国讲“自助”、“自我帮助”，那么日本的“自助”基本上就是家庭内部的福利事业了？

大熊：是的，这里面还会有财产问题。在西欧社会，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而在日本，即使名义上还是老人的财产，但是自己一糊涂，孩子们就随意动用起来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违背了老人的愿望。

上野：我还是40多岁的人，所以在被看护者和

看护者之间，我正处于偏向看护者的地位。从这个立场出发设想一下，我看我也只有选择“弃老姬”的办法而没有其他更好的主意。这也是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时唯一的出路，否则老人倒下，我也倒下，双双去住院。

大熊：人到了疲乏之极的时候，就是对自己从心里爱着的骨肉亲人也会陡起杀心的。趁着自己还没被逼得失去人性要杀死亲生母亲，把老母背到自己看不见的深山里扔掉——象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大量发生。

上野：面临这样的现状，还那么厚颜无耻地高谈什么“家庭福利”，我一听到什么“家庭看护”之类的话就感到恶心。

大熊：说这话的人从没有真正站在老年人立场上。如果不是自己亲身落到那样严重困难的地步，一般人不会设身处地地去设想他人的困难。瑞典人是年龄越大，越重视支持社会福利事业的革新政党；日本人却是年龄越大越支持那些讨厌发展福利事业的政党，真让人无可奈何。

上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真不愧是所谓的“得过且过的逍遥民族”啊！

○福利事业的现场报道——上野

将北欧老人福利社会的各种信息带到日本来

的丰功伟绩应归于大熊一夫先生。通过他的一系列现场报道，我们大开眼界，深受启发，目光明亮了许多。原只是人云亦云地把欧美国家一概而论，现在知道实际上北欧和欧美在社会福利事业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尽管统称“北欧”，但是瑞典和丹麦的老人福利政策，又不尽相同。我们原以为瑞典是世界上的福利事业最先进的国家，而他们却正在开始深刻地批判自己国家在福利事业上的唯设施主义了。

宣传媒介的力量真够大的。大熊先生是一位杂志撰稿人，他利用这一身份将精神病院和老人病院里非人道的虐待现象在报纸杂志上揭露出来，连载发表。报道中的资料都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为了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亲自住进医院，经受种种可怕遭遇，拍摄了相当珍贵的现场照片。这些采访报道并不仅仅为了揭发现实中的阴暗现象，还向我们揭示出选择福利社会的必要和可能。为此，大熊先生写文章、演讲、主持讨论会，甚至还特地请来丹麦的福利大臣参观日本的福利设施。

“我们的社会办得到的事情，你们这么富裕的日本怎么会办不到呢？”北欧福利工作者们的问题使我们如坐针毡——这句话清楚地意味着福利也是一种政治的选择。

如果没有大熊一夫，会不会有别人来写老人特

集，来报道日本的老人现状？如果说新闻媒介支持着每一位撰稿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那么大熊先生的工作是其中出类拔萃的。

老人之家的生活——跑 在老年生活前面的人

对话者：上野千鹤子。

清水好子。1921年生。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系毕业，关西大学教授。现在生活在京都的老人之家。

○“京都老人之家”的生活

上野：清水好子教授是日本研究《源氏物语》最权威的学者，向您请教有关专业问题似乎才更有趣，但今天想以日常生活为中心话题听听您的想法。

我这次请了几位专家漫谈老龄化社会的各种问题，您是最年长的一位。听说您现在住在京都西部的收费老人之家，我想听您介绍一下那里的生活情况。您为什么要住到那里去呢？

“京都老人之家”是什么时候开办的？

清水：4年前（1986年）11月底开始营业，我是12月初搬进去的。

上野：那么是刚开业就搬进去了。您当时出于什么动机呢？

清水：最早是银行劝我住进去，只给我看了一个宣传材料，凭那么一点材料无法想象整个情况，所以我对他们说：“那种魔窟似的地方，我才不去呢。”

但是后来因为我本人的健康状况出了些问题，工作负担又重；而当时我住的房子有上千平米，我和丈夫每天都要上班，顾不上对家的维护管理，为了整理家里的房子院子我们也累够了。

上野：最近，我认识的几位50多岁、60多岁的夫妇，因为孩子大了都离开了家，独门独院的房子显得过大，收拾不过来，只好都卖掉搬到公寓式住宅去了。您是不是也因此而决定搬到老人之家去的呢？

清水：是这样。在没有下决心以前，我曾经请人到家里来帮忙。结果不是到了规定时间还不到，就是突然要求请假，常常弄得我们措手不及。而且从我们这些在对面工作的人来看，觉得家务劳动，家庭主妇的劳动比别的工作更累。

上野：有工作的清水老师做家务劳动的水平、能力一定比普通家庭主妇高、更讲要领吧（笑）？

清水：不仅我，我的那些朋友们也都水平很高。也许是因为做家务的年头长了，我做起饭来可麻利了；四五种菜，再加上酒，不一会儿就得了，而且饭菜端上桌时，厨房的调理台也随手收拾得干干净净。所以我这个人是不能看着别人干自己不动

手的。

上野：而且象你们这样夫妇都工作的家庭总是收入比较丰裕，吃得也会很讲究。

清水：是的。我们家一是买书，二是吃饭，用钱是不受限制的。

上野：是啊，象一方工作的节俭家庭中那些精打细算的主妇们，绝不可能有你们那么高的口味。

清水：不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食品，就不会有好身体。而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更需要营养。

上野：因为夫妇两人工作，钱很富裕却缺少时间，所以能用钱办得到的事情，就宁可花钱而不想自己费力了。与其花功夫自己从头准备，就不如买些半成品，经尽可能简便的加工也能做出美味的饭菜来。

清水：是的，只要用好原料，好调味品，就一定能做出好味道来——我这样做了几十年了。而且越做越有经验，什么地方卖的东西好，心里都有数。

上野：这是长年积累的日常生活购物经验。

清水：是的，我买东西只限于几个中意的铺子。比如买漆器，不是所有漆器店的漆器我都买，而是只去一个设计非常入时、样式特别中我意的漆器店。

上野：常年工作的女人很需要生活上的帮手，您在这方面掌握了很多好办法，这也是过日子的窍门。

您什么时候决定把房子处理掉的？

清水：当我决定搬到老人之家后，立即就下决心卖房子。当时还有人劝我“有两处房子不也很好吗。”但是没有人住的房子出了小偷或者火灾什么的，会给邻居添很大麻烦。我这个人除了学习、读书，是最讨厌动脑筋的，所以一下子就决定全部处理掉，一点也不留恋。

上野：您在那里住了多少年了？

清水：二十五六年，可以说1/4世纪了。我眼看着邻居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家、飞走了。

上野：我最佩服清水老师的是您并没有把自己的老年生活安排成消消闲闲的，而是要做的事情许许多多。为了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合理，您毅然决定搬到老人之家。

清水：是的。我们这些吃笔杆子这碗饭的，现在正是最有干头儿的时候。一旦老糊涂了，就什么也干不了了，趁我还不糊涂，必须抓紧工作。

京都老人之家——由日本“京都创造生活事业团”创办，共有77种住宅样式，从1户1室到1户6室不等，可居住228户。

老人之家的院内设有医院（有床位666个，医师100名，其他工作人员500名），所以住户可以不必顾忌大病小灾。乘公共汽车到京都车站只需30分钟。

公用面积约占整个设施的1/3，可以供老人们下围棋、练气功、做茶道，以及打网球、台球等等。另外，为了使老

人们多年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仍然可以服务于社会，设施内还有“熟练技术人材中心”，向社会上需要劳动力的部门开放。

此外，设施还备有一般家务劳动专职人员为各户提供有偿服务，例如清扫、倒垃圾、浇花等。

在医疗方面还有内部诊所和看护设施，专业护士昼夜值班。对一般健康老人则提供定期体检，住院全面体检，以及饮食指导等等。

○终生研究《源氏物语》

上野：前不久我在女性史综合研究会听了您关于《源氏物语》的讲话，大有顿开茅塞之感。您说《伊势物语》是恋爱小说，《源氏物语》则是婚姻小说。所谓“婚姻小说”其实是指以“婚姻”为名的“政治”小说。我一直搞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运用婚姻手段营造裙带势力的事情太熟悉了。但是我仅仅限于了解这种事情的表面现象，而清水老师却是深入其内，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原著，才研究到了如此精辟的地步，真令我钦佩。

这部小说之所以能超越时代，一直流传到今天，是因为书中不仅记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出于政治目的而缔结婚姻的现实，也有对一反这种常规的情节的真实描写。您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同时具有“循规蹈矩”和“打破规矩”的两方面的特

征，它就不可能流传下去。

清水：是这样的。

上野：我对此非常理解。

从结构主义的图式来看，婚姻即政治本毫不足怪。文学是历史发展中的产物，所以具有真实地表现当时时代面目的特征。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抓住了文学必然遵照历史法则的这一特征，但是文学还有社会科学的研究忽略掉的一面，就是它还反映了人们要冲破法则束缚的普遍心愿。

清水：是的，这是个人的心愿、热情，燃在心里。火。社会科学无法将这些东西作为研究课题。

上野：清水老师阅读《源氏物语》的方法是合理主义的，极端理性的。

清水：如果不这样就不能论证。

上野：这样读透了以后，作品的结构就自然显而易见了。

清水：是的。边读边思考，这还不够，还要去向各种人请教。需要学际间的交流。

上野：真羡慕您找到了一本值得您这么钻进去一生也读不完的书。

清水：这靠一种第六感官，也可以说是因为我的确非常喜欢这本书。

我在京都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源氏物语》的，那时我才二十五六岁，可参考的研究资料一份也没有。为了恰当评价这部小说的文体，我经常

在校园附近边思考边散步，好不容易才写出来。

现在常听到男学者们说，“这是冷门，就研究这个吧……”

上野：是的，现在男学者们多去钻“冷门”，这样容易出名。

清水：在研究“冷门”上，女人更顽强。因为她们不了解社会，想得少。

总而言之，我现在还想再把《源氏物语》研究一遍。

上野：您对您喜欢的研究课题，真是一生锲而不舍。

《源氏物语》——日本11世纪初最有影响的小说。作者紫式部。这部长达54卷的巨著共描写了4代人的70多年间的人生史。——译者注

《伊势物语》——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故事集，诞生于8—9世纪，作者不明。内容主要描写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的生活和感情纠葛。——译者注

○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上野：您在移居老人之家以前，有没有找过其他地方，进行过比较？

清水：没有，没有可选择的余地，象这样的老人之家，这是独此一家。

而且，我们还在工作，有时还要上班，还要出

席一些研讨会，这个地方交通很方便，“地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上野：在离东京较近的地方，例如伊豆、草津一带，也有带温泉的兼疗养院性质的老人公寓。不过，那里给人的感觉完全与世隔绝，类似隐居一般。

清水：是这样。我搬家并不是完全从老年生活来考虑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一定意义上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考虑问题总是反复权衡事物的轻重。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又想去旅行，又想去看电影，但是那样一来就没有时间学习了。

上野：我对工作和娱乐都不想丢。

清水：我也想二者兼顾，但是，那样会累垮的。

上野：我也有点觉得随着年龄增长，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我现在很明白年龄一大，想干的也渐渐不想干了的心情。

清水：是的。但是还有些事情就是不想干了也不能不干。需要你去研讨会上发言，就没有办法不干。

上野：怎样排列事情的轻重缓急，自己也有了经验。

清水：不错。所以老年生活也还是很轻松的。当然孤独感随之而来了。但是我倒也不怕，今后肯定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以经常往来。

上野：是的。如果说您是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学问才搬到老人之家来，人们或许会觉得您是位只用

心于学问的特殊人物；但是，从我们刚刚读及的意义上说，是为了省去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清水老师的决定更具有普遍意义，是很多人都可能做出来的。

我非常不喜欢对老年生活只是一味苦思冥想：“退休还是不退休啊”。

清水：那最没意义了。如果一直留心观察各种事物，到了老年也就不难分辨各种事物的意义。这样做出的老年生活的决断和“引退”、“退休”并不是一回事。

上野：最近在伊豆和长野的风景区都为老人修建了设备很好的出租公寓，对这些……

清水：我认为那是经营者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产物。

上野：我也有同感。那些每天上班的人，嫌麻烦都愿意住在离市内近、交通方便的地方。根据这点判断住进老人之家的人的选择才是合理的。

清水：是的，这是很重要的。

上野：这么说“京都老人之家”是最合乎您的各方面条件的了？

清水：是这样。

上野：现在您每天的3顿饭在哪里吃？

清水：基本上是自己做，几乎不去食堂。

上野：食堂饭菜不合口味吗？

清水：营养不够。你知道作家大都是美食家，

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身体和大脑的营养都必须充足。

上野：听说有的作家早餐都吃牛排。

清水：没错，我自己有体会。有的女作家也是从一早开始就吃牛排。

上野：但是，从一般消费者权利来说，如果买的商品不满意可以找厂家退换，而“老人之家”这种商品可不是能退换的。象你们食堂的问题，住户没有必要向老人之家经营者提出意见吗？

清水：应该提意见。但是一般妇女都愿意自己做，反正附近就有商店。

上野：如果附近还有别的食堂能形成竞争，情况可能就不同了。能住230多家的住宅区，附近街上应该有一些餐厅之类。

清水：有一位食堂经理还说：“到老人之家食堂吃饭的人真幸运，想吃什么可以预约，真不错啊”——他还挺羡慕呢。

上野：这种食堂太好办了。

清水：因为有些顾客是跑不掉的。不过，能跑的还是都跑了（笑）。

上野：就象学生食堂一样。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吗？比如施加点压力……

清水：顾客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是赤字了。

上野：是吗？还是得来一点资本主义的竞争，那样就会改善了。

清水：是的。现在只有自己选择——自己做着

吃可以不生气，精神上解放。其实和别人斗气是最辛苦的。

但是渐渐身体会越来越不灵便，有一天可能自己做不了饭了，或者懒得做了，那时候有个食堂还是方便，就该感谢老人之家了。

〔○老人之家的适合规模

上野：您住进老人之家后，有“这下可轻松了”、“搬家是对的”之类的感觉吗？

清水：第一感觉是“太窄了”。生活上虽然非常不能适应，但是确实正因为太窄了感到轻松极了。

上野：这下子变得一切都简单明快了吧？(笑)
是不是有许多舍不得丢掉的东西？

清水：是啊，特别喜爱的作品啊，珍贵的书籍文物啊……搬家的时候只保留了1/10左右。

搬过来还有一件感到开心的，就是只有一个出入的门。进出一把锁就够了，非常省时间，这样就多出了学习和治疗的时间。治疗是挺费时间的事。

上野：您现在身体有什么地方需要治疗吗？

清水：我有腰疼的毛病，每天针灸。另外我还参加瑜伽功的训练。等退休以后就不用讲课了，不用声音了，那时我打算到合唱团去练习唱歌。总之我要把现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都用在这些事情

上。

上野：可以问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吗？您的房租怎么付，是分期付款购买方式，还是只付相当于购买终身使用权的金额？

清水：只购买终身使用权。所以不能成为个人财产。

上野：也就是说没有所有权，对吗？您是否满意这种购买方式呢？

清水：卖房子的时候，我心情糟透了，什么税金之类的，讨厌极了。这种事绝不再干第二次！我的父母住在大阪，他们去世的时候，房子也必须处理掉。但是幸运的是母亲差不多把卖房的事都处理好了，所以对那些手续我知之甚少。我没有儿女，只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这些事情都先安顿好。

上野：如果您有儿女，您会考虑留一些财产给他们吗？

清水：恐怕会的。

上野：您对现在住的住宅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是不是就是说不能转卖呀？

清水：不能转卖。现在是夫妇居住，以后丈夫去世的话，妻子可以继续居住。为了照顾一人在世的老太太，儿女们是不是可以搬进来住呢？反正根据现在的规定，儿女的家庭不能搬进来住，只限于个人或同一代人居住。

上野：日本生活科学研究所的高桥英与先生正

在创办“老人宿舍”。根据他的观点，老年人不能独立生活的时候，可以让能够相互扶助的人们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互助关系的规模应大小适当，他主张最适合的应该是十五六户为一个单位。这样可以每天都互相见面，结成便于相互照应的邻居关系。当初我非常赞赏他的想法，后来渐渐发生了动摇。因为老年阶段一般都很长，要是在这期间发生了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在只有十五六户的邻里之间，谁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搬过来是为了常久住下去的，为了维持好的人际关系，活起来一定很费劲。

而听清水老师说“京都老人之家”有230户人家。这些人家当然都可以有来往。万一同住者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想这样大的规模迴避起来也比较容易。

清水：是的，可以迴避。

上野：看来清水老师决定住到老人之家来实在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清水：也有100户左右的老人公寓，但是还是搬到我们这里来住的人多一些，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200户左右规模的集中居住地的人际关系相对要淡薄一些，这一点很重要。

上野：就是在这样的“老人之家”，人们在其中开展各种小型活动，不仅如此，还能投入外边的社会生活——他们可以有两方面活动天地。

上野：这样，大家就可以不局限于“老人之家”住宅内生活的范围了。

清水：大家现在都到外面去，很少留在家里不动。每天早晨9点半从老人之家发车的公共汽车都坐得满满的。到街上刚10点多，正是百货公司开店时间。

上野：这么说来还是应该创办开放式的老人居住区。

清水：离城市近一些是很必要的，不能建在农村一类僻远的地方。最近在风光明媚的地方修了不少老人住宅区。据说因为那里的风景太好了，住在那里的人都想死了。

上野：大概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京都老人之家的大小是最适当的。

清水：京都还是一个好地方。可以在周围散步。而且离大阪又近，这也很重要。

上野：大阪比京都更繁华。

清水：周围还有些更小的乡镇，想引退也可以。

上野：看来京都老人之家有地利又有人和，是个最佳选择。

○公寓生活与公寓共同管理

上野：听说您搬入京都老人之家时，生活能自

理是当时的一个条件。如今经过4年了，情况有不少变化，出现了痴呆老人，有的就在走廊上呆呆地走来走去……

清水：有这样的人。

上野：这些老人可能有的原来是出钱让儿子夫妇照料自己的，但是他们中途变了卦，中途把老人丢弃到这里来了。

清水：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细想一下，儿子可能也60来岁了，看护老人这种工作仅靠一个人的善意往往是不能胜任的，太累人了。所以应该由年轻的专业看护人员、看护护士用更合理的方式照看老人。到我们这儿来住的老人很多是有孩子的，他们自己决定搬来住。

上野：那么京都老人之家的看护体制怎么样呢？完成得很好吗？

清水：还不很完善，但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上野：听说这里有不少附属设施有特殊护理服务，同地区还有医院。生了病或者失去行动能力可以住到医院或医疗设施里，难道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清水：还是有。住到老人之家的附属设施需要经济条件，我们倒顾虑不大。但是要想住进医院，得有医生诊断后的住院决定，这就让我们担心了。

上野：就是说，到了卧床不起的状态也可能还得住在自己家里。

清水：可能的，也可以住到老人之家的看护室里。如果想住在自己房间里，就必须雇人照顾自己。

上野：我参观过你们的看护室，床位很少，而且都是大房间，没有单间。

清水：是的，这也是问题。

上野：好容易有自己的房间，为什么要住到看护室去呢？

清水：看护人员不能随时到家里来。如果要在自己房间里，那就必须另雇人。象这样的护理人员虽然也有几位，但是费用特别高。

上野：是很贵，一天最低也要1万日元。

我们一些朋友之间议论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大家也想住老人宿舍，但是谈到请人照料，一个人并没有那么多事情要人做，如果能三个人合请一个人，就好多了。

清水：这办法不错。我熟识的一家人，夫人是画画儿的，先生是大学老师。他们和其他两家联合请了一位帮工。但是怎么样合理地为这三家服务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上野：这种事情本应是老人之家的基本职责之一。如果自己的居室可以放置看护病床，或者方便地使用轮椅，看护人员又能上门护理，那么自己家就可以象个病房了。能在家里住院，那该多好啊。

清水：那可实在是太好了。这也就是说说而已，哪有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就是想那么做，又

到哪里去找看护人员呢？

上野：还是有的。现在的家庭主妇，不少人孩子大了重新出来工作，但大多是些按小时计算的临时性低级工作。而看护工作既可以得到很好的评价，又有相应报酬，还能用上她们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经验，已经有些妇女开始做了，都是些四五十岁、精力充沛的妇女。

清水：如果稍稍认真考虑一下，会有很多好办法。

上野：是的。现在适于中老年妇女就业的都是些非常低级的工作。所以看护工作的劳动预备大军是很庞大的队伍。关键在于需要有人来组织。

另外，住在老人之家的都是特定年龄的人，对这一点您感觉如何？

清水：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我将来可能碰到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一面镜子。现在，我已看到过许许多多老年生活的特有现象：有辛酸的、有痛苦的、有无可奈何的，都将成为我的借鉴。我经常可以在老人之家看到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人、痴呆老人、把房间的浴室弄得乱七八糟的人……。

上野：那您不想转过身去不去看这些现象吗？如果不住在那里，您不就看不见了吗？

清水：我不那么认为。现实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我10年后，我说不定也会变成那样。我现在已经是老年前期了嘛。

上野：现在美国有两种说法：“青年老年”和“老年老年”。65岁开始为老年，65岁到75岁为“青年老年”75岁以上为“老年老年”。

清水：75岁以后才能叫真正的老年吧。八十五六岁以后，各种机能都衰退了，刚才说的那些老年衰弱现象就该出现了，那时候才真叫成问题呢。

上野：您不觉得在同一个居住空间里还是既有老人，又有青年人和孩子更好吗？

清水：我不那么想。孩子太吵闹，还是象现在这样安静一些好，从走廊上经过也是脚步轻轻的。安静是很重要的。洗衣机转得轰轰响，妈妈对孩子大声发脾气，我可不想听这些。

上野：您搬进老人之家以后，通过住户们的努力，有什么条件改善了吗？

听说清水老师的丈夫为了成立住户管理联合组织曾经到处奔走。

清水：那没成功，没有人响应。再不去做那么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上野：是吗？前不久我拜访您夫妇的时候还听您丈夫谈要组织财产合作社的想法呢。

清水：我们都是老年人，精力有限，而且还有妇女的视野的局限性的问题。合作管理是个理想，不那么容易变成现实。恐怕还需要再年轻一点的人到了老年再进行计划和尝试。我们和比我们更老的人大概完善不了了。

上野：听说所有公寓的自治管理，没有搞得很出色的。虽说是共同居住同一公寓，但要把这个共同性建立起来却那么难。

清水：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上野：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公寓生活就是因为厌烦共同生活的居民区，商品经济社会不需要什么“自治”、“合作管理”，所以它从不培养共同精神，不需要什么集体一致，共同行动的。

清水：我住独门独户的时候就一直反对什么街道委员会、居民自治会的，我反对了20多年(笑)。

上野：现在您怎么看呢？还那么清高吗？

清水：我现在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消费生活，不可没有。不能有“什么都可以满足”“已经不需要什么了”、“怎么样都行”的态度。

上野：那样就等于连生活的欲望也都没有了。

清水：是的。比如五六月间新鲜的小白干鱼上市的时候，趁着季节，又鲜又便宜，赶紧买些存起来。如果有了“买不买都行，何必赶季节”的想法，那就是开始衰老了。有没有生活欲望，态度是大不一样的。

○跑在老年生活前面的清水夫妇——上野

最近，老人宿舍、有偿老人之家等等将老年人集中起来看护的老人住宅建设相当兴隆。人们在老

年之后搬到一起去住，相互依靠、相互作伴，共同在具有护理保障的住宅里悠然度过晚年——这真是相当有诱惑力的计划。但是，这毕竟还是件历史很短的新生事物，经验还很少。大部分出让方式不是分期付款而是只出售终生使用权。如果中间出了麻烦可以转卖吗？如果出现了老年痴呆或卧床不起的情况，老人设施可以给予什么照料呢？这里、那里、所到之处都只有老人，每天只和老人在一起会不会心情不舒畅呢？

我带着这种种问题，抱着亲耳听听入居者心里怎么想的愿望，访问了受人尊敬的学者清水好子教授。她在“京都老人之家”创立之后很快就卖掉了原来独门独户住宅，成了那里第一批住户。这对学者夫妇没有子女，是典型的没有子女的老年家庭的一个选择示范。他们选择老人之家生活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事先处理他们身后的事情，诸如财产、房子等等，免得自己百年之后给朋友和亲属添麻烦。他们的选择也值得那些虽然有子女，但不愿麻烦孩子的老人们参考。

我发现人们选择老人之家的所在地点，都是从合理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思想出发的。比如，为了更好地操持家务，免做自己不愿做的，而可以方便地做自己喜欢的家务；选择离城市中心近的地方，以便外出方便；和四邻保持不远不近的“适当距离”，等等，而不希望躲到偏远的地方与世隔绝。

在这本对话集中出现的最年长的一位对话者就是清水老师。她那令人钦佩的老年生活方式，使人感到她是走在老人时代的先驱者之一。

写在后面

我曾说“人从40岁就开始老了”，引起一阵哄笑：“你也太性急了点。”但是，从我自己说起的话，从20岁就开始老了；而渐渐有了“老了”的真实感觉，是30岁的时候——“啊，我剩下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没有多少了”。还有人曾说过：“对人来说，老的过程就是从呱呱坠地到永远瞑目之前的整个过程。”

我现在之所以对“老”的问题比对任何其他问题兴趣都浓厚，就因为对这个我今后就要进入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太无知了。我们总以为自己理解“老”是什么意思，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出的任何一种“老就是这个意思”的断言都会被事实证明是不全面的。半个世纪前我们祖父母一代的“老”，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老”，恐怕就不一样。而1990年的今天生活在老年时期的“老”，与二三十年后的21世纪的“老”之间的差别大概就会更大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它属于未知的经验领域。最近我常听老人们谈话，觉得他们的话比年轻人的有意思多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会觉得听老人谈话是浪费时间、无聊极了？如果说，今天的时代变了，年轻一代属于“文化背景不同”的一代，那么对于象我们中年一代来说，老年一代不也是“文化背景不

同”的一代吗？况且，对年龄的不同态度，总有些超出想象的内容。我30岁时还只是超出了自己20岁的想象，而一到40岁我简直是背叛了30岁的自我预测。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会觉得眼前看到的景色，似曾相识，即发生所谓的“既视现象”，但是实际上并不曾真看到过。“老”的景色也同样，无刻不在变化。不同的时代，景色都不一样。

我编写这部书，完全出于探讨“老年”问题的角度，来听取各方面的看法。他人的经验不等于是自己的经验，但是可供自己学习。本书中所有参加对老年问题讨论的对话者，都是“老人问题”专家，或者亲身实践者。我认为，首先必须要澄清“老人”的基本形象——。他们绝对不都是“老糊涂了”、“行动不便”、“卧床不起”的，他们仍然可以和普通人一样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应该考虑各种办法，做出各种努力。只简单地把老人问题视作“求医问药、办后事”的问题的大有人在，说明人们从未关注到老年人的“爱”和“夫妇生活”等现实问题。还有些人认为“在家庭里度过晚年”最理现，实际上抱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应该迈向更高一层的台阶——考虑真正实际可行措施。

这本书所访问的人物并不能包括当今所有的老人问题专家。应“三省堂”出版社的要求，各次谈话记录曾在三省堂的杂志上从1989年5月到1990年

5月连载发表，据说读者很欢迎。对所有为这部书的出版贡献过力量的诸位合作者，在此深表衷心的感谢。

上野千鹤子

1990年7月